



ISSN 3080-3039

eISSN 3080-3047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Modern
Education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2025

第1卷第1期

1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主办 香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出版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jyxb@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梅见华

编辑部

陈科存 孙文杰 陈云鹏
舒波 田蕾娅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 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 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 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 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80-3039
电子出版 ISSN 3080-304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
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陆运营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 从“儿童画”到“自我表达”：现代美术教育理念的变迁与断裂 - 覃金梅 1-7
- 视觉艺术训练对青少年创造力与自尊心的促进作用 - 陈丛菁 8-14
- 地域性景观建筑文化传承的实践性教学路径探索 - 张鹏 15-19
- 演好你的角色：基于拟剧理论的高校辅导员工作技巧探究 - 杨贤树 20-24
- 高校 AIGC 检测标准的反思：人工智能与人的主体性让渡 - 钱亮帆、刘立翔 25-31
- 刍议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 潘沿 32-38
- 人教新版初中数学实践教学研究——田径场地设计 - 朱誉、程从华 39-45
- 从国家翻译能力框架看翻译教育跨文化能力培养 - 包佳鑫 46-50
- “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在中小学课程落实的困境及其破解 - 刘涵 51-55
- Rasch 模型在国内语言测评领域应用现状及展望 - 刘强 56-62
- 基于认知冲突的地理综合思维试题考查特点 - 纪钧腾 63-69
- 浙江省应用型本科院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 吴滢 70-74
- 治理范式嬗变与黄河的历程 - 赵光辉 75-79
- “人民治黄”与革命时期中共的民众动员策略 - 赵光辉 80-84
- 合理的“不合理”情节——谈动画《我失去了身体》的叙事特点 - 李毅 85-89
- 基础教育阶段的民间美术美育策略研究——以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为例 - 朱蒙晰，张鹏
90-94
- 高职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构建及画像研究——以广东4所民办高职为例 - 明伟，姚镇城
95-100

<https://doi.org/10.70693/jyxb.v1i1.2>

从“儿童画”到“自我表达”：现代美术教育理念的变迁与断裂

覃金梅¹

(湖北师范学院, 黄石 435000)

摘要：“表达自由”作为基础美术教育的重要价值导向，自 20 世纪以来在发展心理学、人本主义教育与视觉文化理论推动下逐步确立其核心地位。然而在当代教育实践中，该理念常陷于“课程倡导”与“教学压制”之间的张力之中，表现出明显的异化与空转趋势。本文以“儿童画”与“自我表达”为核心切入点，系统回顾美术教育理念的历史演变，深入剖析表达自由理念在制度化教学结构中的错位表现，揭示了教师执行能力不足、课堂结构压缩、评价机制单一等深层困境。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从教师教育、课程目标、教学内容、评价机制与媒介素养五个方面重构“表达权”支持系统，推动基础美术教育由“技能训练”向“主体建构”转型。研究指出，实现“表达自由”的教学理想，不仅关涉儿童图像语言的发展，更是审美人格形成与文化权利建构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儿童画；表达自由；美术教育；课程改革；视觉文化

一、引言

近年来，“表达自由”逐渐成为基础美术教育改革中的关键词，被普遍视为激发学生创造潜能、发展审美素养与建构主体意识的关键理念。然而，在具体的课堂实践中，这一理念却面临落地困境。多项教学实证研究显示，中小学美术课堂中“统一范图”“构图模板”“技法先行”等现象依然广泛存在，学生个体表达空间受限，创作行为高度依赖教师预设与评判标准，呈现出“理念热而实践冷”的悖论状态^[4]。这一现象并非偶发，而是源于美术教育理念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受到制度化教学结构、社会评价导向及教师专业文化的多重影响。

回溯 20 世纪初，“儿童画”作为一种具有教育潜力的图像语言，被心理学与教育学界重新认知与重估。维克多·洛文菲尔德（Viktor Lowenfeld）在《创造与成长》中指出，儿童绘画不仅反映其心理发展阶段与认知路径，更是其主动表达内在经验、建构意义世界的重要方式^[1]。他基于大量教学观察，提出“儿童绘画六阶段理论”，主张在不同年龄段尊重儿童独特的图像逻辑，反对以成人标准评价其视觉表现，强调“自由表达”对儿童创造力成长的决定性作用。与之呼应，英国美学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在《艺术教育论》中提出，艺术教育应立足于儿童的内在节奏与形式感，强调艺术不是技术训练，而是激发人类创造本能的方式^[2]。他强调，“儿童画”体现的是未经社会化规训的视觉本能，是个体潜意识的文化图像，应成为教育培养“完整人格”的核心路径之一。这些理论为“表达自由”理念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学与人文主义根基，也为其教育实践提供了方向指引。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课程改革与西方教育思潮传入，“自由绘画”“学生中心”等理念开始在我国部分地区的美术教学中试点应用。以“儿童画”为核心的课堂实践被赋予去技术中心化、重视生活经验与个体情感的

作者简介：¹ 覃金梅（1984—），女，湖北鹤峰人，湖北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湖北鹤峰夏加儿美术教育执行校长。

教学任务, 标志着“表达权”开始在制度话语中获得理论认可^[3]。当时, 全国多地尝试引导学生“画自己想画的”, 突破范图、统一构图与色彩模板限制, 一度推动美术教育由“再现技能”向“表达意义”的方向转型。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 随着课程标准的量化要求提升、教学考核体系日益刚性, “表达自由”再次遭遇压缩。在“目标达成度”与“作品展示性”主导的教学评价框架中, 自由表达常常让位于“画得规范”“技巧娴熟”“构图完整”等外显成果, 学生作品出现内容趋同、形式雷同的现象^[5]。同时, 学校管理效能导向与家长期待进一步推动教学向“可评估”“可展示”倾斜, 美术课堂重回“技法主导—结构输出”的教学模式。

基于上述背景, 本文以“儿童画”及“自我表达”作为分析核心, 试图从教育理念、教学实践与课程机制三方面系统梳理 20 世纪以来美术教育理念的变迁轨迹, 重点揭示“表达自由”理念在当下教学结构中所面临的异化表现与制度阻力。本文旨在回应当前美术教育如何在文化复杂性与现实规训之间寻求新的表达逻辑, 探索如何通过结构性变革重建以“表达权”为核心的儿童美术教育体系, 推动其由“视觉再现”走向“意义建构”的深层转型。

二、儿童画理念的兴起: 心理学与美术教育的交汇

(一) 儿童心理发展理论对绘画表达的赋义重构

20 世纪初, 发展心理学的兴起深刻改变了传统美术教育对儿童绘画的认知路径。以洛文菲尔德 (Viktor Lowenfeld) 为代表的教育心理学家, 首次打破“以技法为中心”的教学传统, 提出儿童绘画不仅是一种视觉训练过程, 更是其情绪体验、认知建构与个体成长的自然表达形式^[1]。在其代表作《创造与成长》(1947) 中, Lowenfeld 提出著名的“儿童绘画六阶段发展理论”, 系统描述了儿童从“涂鸦期”到“视觉写实期”的视觉表达变化, 并强调各阶段具有独立的心理逻辑与教育价值。该理论指出, 教育者应尊重不同年龄段学生图像语言的自组织特征, 避免以成人审美标准判断儿童绘画的“优劣”, 更不应将“像不像”作为评价唯一依据。这一认知的转向, 为后续“自由表达”理念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学支持, 使得儿童绘画摆脱“低级模仿”的标签, 获得了“成长性表达形式”的教育地位。

(二) 自由绘画理念的确立与儿童画美术价值的再发现

在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与人本主义教育哲学的共同影响下, 20 世纪中叶的欧美教育体系逐渐确立了“自由绘画”作为艺术教学核心路径的理念。赫伯特·里德 (Herbert Read) 在《艺术教育论》中强调, 艺术教育的本质不应限于形式规范的传授, 而应关注个体内在生命形式的激活与情感表现力的释放^[2]。他提出, 儿童绘画中的“稚拙”并非失误, 而是未被社会化驯化的图像逻辑, 是纯粹的创造表达, 是人类原始创造力的外在体现。这一观点为自由绘画提供了美学正当性与文化根基, 进而在欧美多国推动了以“学生自主探索”为中心的教学改革。美国、英国等国在小学艺术课程中明确提出“自由创作”“视觉叙事”等要求, 教师从“技法指导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 课堂重心由“作品呈现”过渡到“图像生成”的过程体验。在此背景下, 儿童画被重新赋予独立美学价值, 成为表达自我、理解世界与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视觉形式^[3]。

(三) 自由绘画理念在中国的引介与本土化实践

自由绘画理念于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教育现代化思潮传入中国, 在课程改革推动下成为基础美术教育转型的重要方向。1981 年《中小学美术教学大纲 (试行)》明确提出“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发展个性特征”的目标, 标志着“以表达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开始进入教育政策层面^[4]。实践层面, 北京、南京、广州等地部分中小学相继开展“去范画化”教学实验, 鼓励学生以个人经验、生活观察与情绪表达为基础进行“主题自选”创作。这一阶段虽仍面临教师培训不足、理念执行碎片化等现实困境, 但其所倡导的主体性表达与去技术中心化倾向, 为中国美术教育的本土重构提供了理论雏形与实践样本。

与此同时, Howard Gardner (1982) 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为美术教育提供了新的心理学支持。他强调, 艺术表达不仅关联空间智能和身体运动智能, 更与情绪智力、社会认知等核心能力密切相关^[5]。因此, 美术课堂不仅应成为技能训练场, 更应是人格成长、情绪调节与文化意识养成的重要载体。在这一理念支持下, 自由绘画作为综合能力培养的关键通道, 其教育地位与功能进一步获得理论确认, 并在中国语境中不断深化其教育逻辑与本土化表达形式。

三、教育现代化下理念的异化：从自由到“规范”的回潮

（一）制度化背景下的技能强化：自由理念的结构性弱化

在教育治理不断趋向精细化与目标管理的背景下，基础美术教育也逐步被纳入标准化、制度化的教学逻辑之中。在“可测量”“可考核”“可操作”的政策导向下，自由表达理念中所倡导的开放性、不可预测性与个体差异，往往与统一教学标准和评价体系形成根本张力^[9]。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兼顾教学进度、成果展示与考核绩效等外部要求，往往倾向于设计更“可控”的教学路径与内容，以保证课堂产出“达标化”。这一机制促使原本具有开放探索特征的美术教学活动转向流程化与规范化的模式，学生的表达行为被引导进入“技法复制—构图训练—展示输出”的标准轨道^[10]。在制度化“效率逻辑”的隐性驱动下，“表达自由”逐步让位于“技能呈现”，构成了理念落地的结构性障碍。

（二）家长期待与应试压力：儿童画的“技术化”转向

应试文化在社会层面对基础教育的强力影响，使得美术教学也被嵌入竞争性价值体系之中。在家长眼中，美术往往被视为“升学加分”“素质标签”或“特长竞赛”的手段，从而对学生作品提出了“结果导向性”期待。在此逻辑下，儿童画的社会意义逐步由“个体情感表达”转向“视觉技法展示”，形成了以“构图规范、色彩协调、比例合理”为标准的“技术化表达范式”^[4]。许多家长将“画得像”“画得漂亮”作为评判作品优劣的核心依据，从而推动教师教学向“技巧训练”倾斜。学生在创作过程中逐渐趋于模仿性表达，表达动机受限于“作品美感”的外部要求，儿童绘画逐渐演变为视觉美学的程式复制，原本承载的心理表达与主体建构功能被遮蔽^[6]。

（三）课程标准与教材结构：自由空间的压缩机制

在当前中小学课程标准体系中，美术课程虽在总目标层面强调“审美能力”“创造能力”与“表现力”的协同发展，但具体实施层面依旧以知识掌握与技能输出为主要衡量指标^[12]。课程标准所引导的教学目标逐渐“可量化”，使得自由表达成为一项“难以落实”的教学理想。与此同时，主流美术教材编写逻辑以“图像再现”“技法展示”为核心，作品示例多以“完成图”呈现，形成“唯一标准范式”教学倾向，进一步削弱了“开放性任务设计”与“过程性探索”的课程空间^[3]。教师在现实教学中，由于时间结构与考核要求限制，往往依赖教材提供的“示范作品”进行讲解与指导，从而将学生表达引导至固定风格和构图路径之中^[7]。当前教材体系在“知识灌输优先于表达引导”的教学逻辑下，形成了对“自由绘画”理念的系统性压缩机制。

（四）“自由”的误读与“放任”的教学误区

除结构机制限制外，理念的误读亦严重阻碍了“表达自由”的有效实施。在部分教学实践中，自由绘画常被教师误读为“无引导、无任务、无标准”的教学方式，形成了“自由即放任”的错误等同。一方面，这种理解导致教师在课堂设计中缺乏教学主线与引导策略，使得学生作品缺乏表达目的与结构逻辑，图像内容容易空洞、重复；另一方面，也使学校管理者与家长对自由教学模式产生“低效”“无成果”的误判，从而迫使教师在实践中更加倾向于“有标准、可评估”的教学方案^[5]。事实上，真正的“表达自由”应是“支持性引导”与“个体探索”的结合，是教师通过主题设计、情境营造与反馈回应，引导学生在安全结构中进行情感外化与意义生成，而非简单的“去教学”或“无任务化”操作^[8]。

综上所述，在教育现代化的制度结构、教学实践与社会期待的多重作用下，自由表达理念正面临深度异化。儿童画逐渐由“情感语言”转向“技能呈现”，其原有的心理建构、情绪调节与文化参与功能不断被压缩。这一变化不仅削弱了学生的主体发展空间，也加剧了教育理念与教学机制之间的断裂。下一章节将围绕结构性重建提出机制性建议，探讨如何在制度框架中恢复“表达自由”的教育功能，为美术教育转向主体建构型教学提供可行路径。

四、理念断裂的现实表现：教学困境与结构矛盾

（一）教师教学理念与教学执行能力的错位

“表达自由”作为基础美术教育的重要理念，已在新课标文本、教师培训文件与教学宣传中被多次强调，

教师普遍认同应尊重学生的个性表达,鼓励自由创作。然而,理念虽被广泛接受,真正落实于课堂层面的有效教学策略却明显缺位,呈现出典型的“理念—实践”错位现象^[2]。部分教师虽口头上认同“以学生为本”,但因自身受传统美术训练范式影响深厚,教学实践中仍倾向于采用“讲技法—画范图—做展示”的线性流程,难以为学生提供足够开放的表达支持环境。此外,当前教师培训在“理念宣讲”之外,缺乏系统的教学方法指导,如如何设计“非控制性任务”、如何引导学生“生成性表达”,导致一线教师在实践中普遍面临“理念清晰—路径模糊”的现实困境^[3]。

(二) 时间结构与创作流程对个体表达的限制

在教学制度安排中,基础美术课时普遍偏少,尤其在小学阶段,常常仅有每周一课的设置,且时长有限。在此结构下,教师通常需要在40分钟内完成课题讲授、创作引导、学生完成与课堂讲评等多个教学环节,导致课堂节奏高度压缩^[4]。为提升效率,教师往往选择以“统一构图”“预设主题”“模板范图”等方式简化教学流程,从而削弱了学生在构思、探索与创作中的主动性与表达自由。同时,学生也在不断重复“听讲—模仿—上墙”的流程中逐渐形成“快速完成—立即展示”的学习惯性,缺乏对图像创作的沉淀与反思。课堂时间结构的紧凑与流程化设计,构成了对个体性表达实践的外部限制机制^[5]。

(三) 评价体系的单一化与“统一审美”倾向

教学评价在无形中塑造着学生对创作意义的理解与倾向。目前,基础美术教学中评价标准多集中于视觉呈现的完整性与规范性,如“色彩协调”“构图对称”“造型准确”等外显指标,而对表达动机、情感深度、生活经验的转化能力等内在维度重视不足^[6]。这种“结果导向”的评价体系,不仅使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更加注重“画面效果”,也引导学生逐渐适应并依附某种“统一审美”——即迎合教师期待与评分标准的表达方式。在这种评价机制中,自由表达被误认为是“不规范”“不稳定”甚至“不成熟”的表现,学生逐渐丧失表达自信与探索意愿,创作呈现出“审美趋同—内容雷同”的重复性^[7]。

(四) 真实课堂案例:画面千篇一律与“模仿式创作”现象

真实课堂案例进一步暴露出自由表达理念的错位实践。例如,某地小学开展“我的家乡”绘画主题活动,虽在形式上为学生提供了自由构图空间,但多数学生作品均采用相似结构:蓝天白云、红屋绿树、笔直道路与车辆人物,画面构图和元素排列几乎一致。这类“创作”并非基于学生真实经验的个体表达,而是在教师提供的范图、主题构建语言与美术技法指导下形成的“模仿式再现”^[6]。学生并非从生活中汲取图像线索,而是在“教师设定—学生套用”的机制中完成了图像生成,这种“规范中的自由”实际掩盖了表达背后的文化建构和情感指向,违背了“以学生为本”的初衷(如表1所示)。

表1 自由表达理念与现实教学结构的错位对照表

维度类别	理想中的“表达自由”教学	实际教学中的异化表现
教师角色	引导者、对话者、观察者	技法传授者、评价者、范图示范者
教学目标	表达意义、情感输出、自我建构	呈现美感、技巧训练、结果展示
课堂流程	探索—生成—表达—反馈	示范—模仿—完成—展示
学生创作	生活经验转化、表达个性、图像叙事	套路构图、技法复制、审美趋同
评价机制	多元维度、发展性评价	技术主导、统一标准、外显导向

根据以上所述,尽管“表达自由”在理念上得到课程政策与教育话语体系的充分认同,但在真实教学实践中,其落地路径受到多方面结构性约束,包括教师执行力不足、课时设置紧张、评价体系单一化与教材结构导向性过强等。这些问题共同作用,导致自由表达从教学目标滑落为教学姿态,无法构建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生态。如何打破当前“理念—结构—执行”之间的系统裂隙,在现实制度框架中重建有效支撑机制,是美术教育改革的关键议题。下一章节将以此为基础,探索支持“表达权”实践落地的具体路径与结构转向。

五、从理念复归走向结构重建：重塑“自我表达”教育机制

经过前文对“自我表达”理念化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理念与实践之间的断裂并非单一的教师能力问题，而是深嵌于教育制度安排、教学文化惯性以及课程设计逻辑的系统性结构之中。要真正实现“表达自由”从理想诉求到教学现实的转化，需要从制度机制、课程观念、教师角色与评价路径等多个层面协同推进，推动美术教育整体性地走出“结构内卷”与“工具理性”的双重困境。

（一）教师教育应强调视觉文化素养与学生主体理解

当前教师教育体系中对于“表达自由”的理念讲授多停留于价值宣示与抽象陈述，缺乏将其转化为具体教学行为的课程设计、案例支持与方法训练。因此，首要任务是加强教师视觉文化素养与学生主体理解的专业能力建设。教师不仅应具备基础美术技能，还需理解图像在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功能与媒介逻辑，意识到图像既是表达形式，也是社会语言^[10]。这一角色定位的转变，需要在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中强化视觉文化理论、图像分析方法与非线性教学策略，使教师从“技法传授者”真正转变为“视觉引导者”与“学生表达的理解者”^[11]。

（二）教学目标设置应回归“表达内涵”而非“技术呈现”

课程设计是理念落地的核心环节。目前多数教学任务仍以构图技法、色彩运用等形式性成果为目标，忽视图像背后的叙事、情感与文化意涵。要实现“表达中心”的转型，教学目标应由“完成作品”向“生成意义”转变，由“审美呈现”向“思想呈现”转变^[4]。例如，可引导学生围绕家庭记忆、社会观察、个体情绪等主题展开“视觉叙事”，设置“图像自传”“创伤再现”等任务，鼓励其在图像生成中实现自我建构与世界理解。这一目标转向不仅提升了课堂的教育深度，也增强了学生的表达主权与内在动机^[3]。

（三）美术课堂应拓展至生活经验与社会参与

表达的根基不在课堂，而在生活。如果脱离学生的经验语境与文化生态，“自由表达”便容易沦为空泛口号。因此，课堂内容应鼓励学生从日常生活、社区观察、校园故事中提炼创作题材，使图像创作回归真实情境、情感温度与文化在场。项目制教学如“社区视觉改造”“校园视觉规划”“亲情再现”等，不仅拓展了美术教育边界，也使图像成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5]。此外，通过实践性的图像表达，学生能发展出责任感与公共意识，理解“我所表达的”与“社会他者”之间的关系^[6]。

（四）建立多元化、美学化、个性化的评价机制

评价制度是理念得以落地的“终极环节”。当前多数美术课堂仍采用“技法+完成度”评价标准，忽视作品背后的思维过程、情感强度与表达意图，极大限制了个体图像语言的发展空间^[7]。应构建基于“发展性反馈”的多维评价机制，包括学生自评、同伴互评与教师导评的组合体系^[2]。同时，鼓励建立“图像成长档案”“视觉表达记录”等制度性机制，引导教师关注表达过程中的变化轨迹与个体特征，从而真正落实“每一个学生都被看见”的教育理想^[12]。

（五）融合视觉文化、媒介素养、社会议题进入课程

在图像主导的媒介社会中，儿童面对的不仅是纸面绘画，而是跨媒介、多维度的视觉信息系统。因此，课程内容必须从传统“手工美术”向“视觉素养”转型，涵盖短视频封面、社交媒体图像、表情包设计等多元媒介表达方式，引导学生理解图像如何建构意义、传播情绪、形成立场^[9]。与此同时，将性别平等、生态危机、校园心理等社会议题引入视觉表达，不仅提升其批判性认知与文化意识，也使图像表达真正获得现实介入的文化力量^[1]。

综上所述，实现“表达自由”向教学实践的深度迁移，必须依赖教育理念、教师素养、课程结构与评价机制的系统协同。只有当教学各环节真正围绕学生主体性展开，图像表达才能从“规范呈现”转化为“个体意义生成”，从而使“表达自由”不仅存在于课程纲要中，更深植于每一位学生的视觉实践中，成为基础美术教育的核心价值与教育行动。

六、结语与未来展望

“自我表达”作为美术教育的重要价值导向，自 20 世纪以来在发展心理学、人本主义教育以及视觉文化理论的推动下，逐步确立其核心地位。从最初对“儿童画”的认知转型，到“自由绘画”在西方教学体系中的制度化实践，再到中国课程改革中的阶段性引入，该理念不断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被赋予新的教育使命与文化意涵。然而，本文系统梳理显示，在当代中国基础美术教育的实际场景中，“自我表达”在制度、教学与认知多重结构的作用下，常常被误读为“形式自由”，被简化为“去控制”，甚至被压缩为“教学姿态”。理念与实践的断裂，使其原初所承载的个体建构、情感表达与文化介入功能逐渐被遮蔽。从历史脉络来看，“表达自由”经历了从个体自发表达到课堂有意识组织的理念拓展。在其早期形态中，它意味着儿童对自我经验的自然呈现，强调个体心理发展规律与生命真实的独特性；而进入现代课程体系之后，其表达权日益受限于课程目标的量化、评价机制的结构化以及教学资源标准化。这种由“生成性”向“控制性”的转变，导致美术课堂在表面上追求开放、多元，实则在教学流程、任务设定与评价机制中强化了规范与复制。学生的图像表达逐步沦为结果导向的技术产出，个性差异被同质化趋势所取代。

但正如本文所强调的，这种理念的异化并非不可逆。在对异化成因的结构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五项可操作的教育机制重建路径：包括强化教师视觉文化素养与学生主体理解能力，重构以“表达意义”为导向的教学目标体系，拓展课堂空间至学生生活经验与社会参与，建立多元化、美学化的评价机制，以及融合媒介素养与社会议题进入课程设计。这些建议并非对现有制度的全面否定，而是尝试在现行教育结构内寻求可操作的改革路径，为“表达自由”理念的现实落地提供结构性支撑。展望未来，随着数字媒介的爆炸性发展、AI 视觉生成技术的渗透以及“数字原住民”一代的成长，儿童的图像认知逻辑、表达方式与审美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图像语言已从传统“技法表现”转向“社会身份建构”“情感共鸣生成”与“文化立场表达”。在这一新图景中，美术教育亟需回应如下问题：如何在数字语境中重构图像教育伦理？如何避免表达自由被技术消费所替代？如何使“图像表达”在媒介社会中重新获得主体性与公共性？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决定着美术教育的理论走向与实践策略，也关涉到下一代公民的视觉素养、文化判断力与社会责任意识。

因此，“自我表达”不应仅被视为教学设计中的一项目标指标，而应被理解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其文化身份建构、情感经验整合与社会认知参与的基础机制。只有当每一个儿童都被允许在美术课堂中真实地说出自己的“图像语言”，当他们的生活经验、文化视角与情感世界被允许以图像方式存在与被看见，我们才能真正说，美术教育正在走向更人本、更自由、更富创造力与公共意义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Lowenfeld V. *Creative and Mental Growth*[M]. New York: Macmillan, 1947.
- [2] Read H. *Education Through Art*[M]. London: Faber & Faber, 1943.
- [3] 陈涛. 从模仿到表达：儿童美术教学理念的演进分析[J]. *美术教育研究*, 2020(9): 74-78.
- [4] 李婧. 中国画课程对儿童心理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积极心理学的视角[D]. 香港：香港教育大学, 2024.
- [5] 杨浩, 宋丽博, 王颖. 学前儿童心理画的表达特征及教学建议[J]. *幼儿教育研究*, 2023(6): 80-85.
- [6] 高士华. 儿童画的发展规律与教学策略研究[J]. *美术教育研究*, 2020(12): 45-48.
- [7] 刘萍. 视觉文化背景下的中小学美术教育转型研究[J]. *基础教育参考*, 2022(6): 80-85.
- [8] Gardner H. *Art, Mind, and Brain: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Creativity*[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 [9] Eisner E. W. *The Arts and the Creation of Mind*[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0] Eisner E. W. What can education learn from the arts about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 the Arts*, 2020, 21(2): 1-10.
- [11] 张巧玲. 小学美术教育中培养创新思维的策略研究[J]. *教育研究*, 2020(9): 194.
- [12] 教育部.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S].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2.

From "Children's Drawings" to "Self-Expression": Shifts and Ruptures in Contemporary Art Education Philosophy

JinMei Qin¹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huangShi, 435000)

Abstract:As a key value orientation in foundational art educati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its central position since the 20th century, driven by developments in psychology, humanistic education, and visual culture theory. However,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ractice, this concept often becomes entangled in the tension between curriculum advocacy and pedagogical constraint, showing signs of conceptual alienation and practical stagnation. Taking “children’s drawings” and “self-expression” as core entry poin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rt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critically analyzes the misalignment of expressive freedom within institutionalized teaching structures. It identifies deep-rooted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acher capacity, compressed classroom structures, and a singular evaluation system. In response, the paper propose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support system for expressive rights through five key dimensions: teac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objectives, instructional content, assessment mechanisms, and media literacy. The study argues that realizing the ideal of expressive freedom in teaching is not only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visual language, but also foundational to the formation of aesthetic person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rights.

Keywords:Children’s drawings; expressive freedom; art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visual culture

Doi : doi.org/10.70693/jyxb.v1i1.3

视觉艺术训练对青少年创造力与自尊心的促进作用

陈丛菁

(意大利热那亚美术学院, 意大利 古里亚大区 34132)

摘要: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 视觉艺术教育在促进青少年心理成长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本文通过文献综述与批判性分析, 系统探讨了视觉艺术训练对青少年创造力与自尊心发展的积极影响。研究表明, 视觉艺术训练通过促进自我表达、成就体验与社会认同, 显著提升了青少年的创新能力与自我价值感。然而, 现有研究在因果关系确认、艺术形式区分、文化背景适应性以及个体差异控制等方面仍存在局限。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加强纵向设计, 细化艺术介入类型, 并拓展跨文化比较研究, 以更全面揭示视觉艺术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深层机制。本文的分析为优化视觉艺术教育实践与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视觉艺术教育; 创造力发展; 自尊心建构; 青少年心理发展; 艺术教育实践

1. 引言

在当代教育体系中, 视觉艺术教育作为一种促进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重要方式, 正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同于传统的知识传授型学科, 视觉艺术训练通过绘画、雕塑、摄影等多种媒介, 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自由探索与个性表达的平台, 使其能够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建构自我认知, 激发创造潜能, 同时增强情感体验与社会归属感。已有大量研究指出, 艺术教育对青少年创造力与自尊心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一方面, 通过参与视觉艺术活动, 青少年能够发展更高水平的发散性思维与创新能力, 表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和独创性 (Catterall, 2009; Hetland et al., 2013); 另一方面, 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自我表达与社会认同, 有助于提升个体的自我价值感, 增强自信心与社会适应力 (Burton, Horowitz, & Abeles, 2000)。

尽管如此, 关于视觉艺术训练在青少年心理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共识。部分研究因采用横断式设计, 难以有效确认艺术教育与心理成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此外, 训练内容与实施方式的差异、文化与社会背景的不同、以及个体特质的异质性, 都为现有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和普适性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 不同文化语境中青少年对艺术意义的理解差异, 也可能影响艺术教育的心理效应表现 (Kim, 2011)。

因此,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综合分析, 本文拟系统梳理视觉艺术训练在促进青少年创造力与自尊心方面的研究进展, 深入评析当前研究的主要局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潜在方向。通过批判性回顾与展望, 本文期望为教育实践者、心理学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推动视觉艺术教育在青少年全面发展中的应用与深化。

作者简介: 陈丛菁(1997—), 女, 硕士, 意大利热那亚美术学院;

2. 视觉艺术训练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

创造力作为青少年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指个体在认知、情感与行为层面展现出新颖性、独特性及有效性的能力。在众多影响因素中，视觉艺术训练因其独特的开放性与探索性，被认为是激发青少年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表明，长期参与绘画、雕塑、摄影等视觉艺术活动的青少年，往往在发散性思维、象征性表达及跨感官整合等方面表现出更高水平（Catterall, 2009; Hetland, Winner, Veenema, & Sheridan, 2013）。通过视觉艺术的学习，青少年不断尝试打破常规，探索多种可能性，从而在认知结构上形成更为灵活、开放的思维模式。

具体而言，Catterall（2009）指出，接受艺术训练的学生在创造性问题解决测试中得分显著高于未接受艺术教育的同龄人，且这种优势在学业成绩、社会参与等其他领域也有一定程度的外溢效应。Hetland 等人（2013）进一步提出，在系统性的视觉艺术教育中，青少年能够通过观察、构思、试验与再创造的过程，不断训练其创造性认知技能，这种基于工作坊（studio）模式的学习环境，特别强调对复杂问题的多角度理解与解决。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也强化了他们面对不确定性与复杂任务时的心理韧性。

然而，现有研究在方法与结论上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多数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虽然揭示了艺术教育与创造力之间的相关性，但尚难以明确两者的因果关系。例如，高创造力个体是否更倾向于选择视觉艺术训练，或者艺术训练本身是否直接促进了创造力提升，仍需通过严格的纵向研究加以验证。其次，训练内容的异质性也是一大挑战。不同视觉艺术形式（如绘画与摄影）在技能要求、表达方式与认知负荷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其对创造力培养的具体路径和效果有所不同，但目前尚缺乏细致分类与比较研究。此外，文化背景的差异亦不可忽视。Kim（2011）指出，东亚文化中强调集体主义与规范遵循，可能对创造性表达形成一定抑制，从而影响艺术训练的实际效能。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在不同文化情境下，进一步探讨视觉艺术教育对青少年创造力培养的跨文化适应性与差异性机制。

2.1 研究成果总结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视觉艺术训练在促进青少年创造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Catterall（2009）通过大规模纵向调查发现，参与艺术教育项目的学生在创造性思维、问题解决和批判性思考能力上表现优于未参与者。特别是在视觉艺术领域，青少年在参与绘画、雕塑、摄影等活动过程中，展现出更高水平的发散性思维和创新能力。通过艺术创作，学生被鼓励打破常规思维模式，探索多样化的表达方式，这种开放性环境极大地促进了个体在认知领域的灵活性与独创性（Hetland, Winner, Veenema, & Sheridan, 2013）。

此外，视觉艺术训练不仅提高了青少年的创造力得分，还促进了多感官整合与象征性思维的发展（Winner, Goldstein, & Vincent-Lancrin, 2013）。在艺术活动中，青少年需综合视觉、触觉与空间感知等多种感官经验进行创作，这种跨感官体验有助于激发其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进一步拓展创新思维的深度与广度。特别是在“工作坊模式”（Studio Thinking Model）下，青少年通过观察、思考、实验与反思等环节，逐渐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多元策略，从而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复杂挑战时，能够展现出更高的创造性应对能力（Hetland et al., 2013）。

值得注意的是，艺术训练对创造力的促进效应并不限于艺术领域本身。部分研究指出，经过系统视觉艺术训练的青少年，在数学、科学、语言等传统学科的创造性应用能力也有所提升（Catterall, 2009）。这一现象说明，艺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认知迁移效应（transfer effect），即通过在艺术领域中培养出的创造性思维模式，可以迁移并应用到其他学习和生活情境中，促进青少年综合素养的提升。

2.2 研究局限与反思

尽管现有研究普遍表明视觉艺术训练对青少年创造力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在研究设计、结果解释和实际应用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局限,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首先,大多数相关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或短期干预研究,这使得难以有效确认视觉艺术训练与创造力提升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如Catterall(2009)等人的纵向研究提供了一定证据,但总体而言,目前对长期效应及持续干预机制的探索仍然不足,未来亟需更多严格控制变量、采用多阶段测量的纵向研究。

其次,现有研究在视觉艺术训练内容和形式上的界定较为宽泛,缺乏对不同艺术门类细致区分。绘画、雕塑、摄影等不同媒介在认知加工方式、感官参与程度以及创造性需求方面具有显著差异,然而大多数研究并未深入比较不同类型训练对创造力发展的异同(Hetland, Winner, Veenema, & Sheridan, 2013)。这种笼统处理可能掩盖了艺术教育内部的丰富性,也限制了具体教育干预策略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此外,文化背景对艺术教育成效的影响在现有文献中被明显低估。Kim(2011)指出,文化价值观如集体主义、规范遵循等因素,可能在无形中调节艺术教育对创造力的作用强度。尤其是在东亚文化背景下,教育系统中对标准化成果与遵循规则的高度重视,可能弱化视觉艺术训练所倡导的个性表达与创新探索。因此,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复制西方艺术教育模式的做法,可能无法直接产生同样的促进效果,需进行本土化调整与适配研究。

最后,个体差异因素在视觉艺术教育研究中尚未被充分考虑。性别、初始创造力水平、家庭支持度、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艺术教育干预的成效,但相关研究往往未能纳入足够的控制或交互分析。这种忽视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在外部推广时存在偏差,也削弱了基于研究制定教育政策的科学性与可靠性。综上所述,未来关于视觉艺术训练促进青少年创造力发展的研究,亟需在研究设计、艺术类别划分、文化适应性探讨及个体差异分析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深化。只有通过更严谨和多元的方法,才能更全面揭示视觉艺术教育在青少年心理发展中的真正价值与机制。

3. 视觉艺术训练与自尊心建构机制探究

自尊心作为个体对自身价值和能力的总体评价,是青少年心理发展中的关键变量,对其社会适应、学业成就及心理健康具有深远影响(Harter, 2012)。近年来,视觉艺术训练因其独特的体验性质和开放性表达形式,被视为促进青少年自尊心建构的重要途径。通过参与视觉艺术活动,青少年能够在自我表达、成就体验与社会认同等多个维度上获得积极心理反馈,进而形成更加稳定且积极的自我评价体系。

首先,视觉艺术训练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内心世界的渠道。与传统学科相比,视觉艺术强调个性化、情感化的表达方式,使青少年能够在作品中展现独特的观点与情感体验。这种非评判性、重视创造过程的环境,有助于青少年感受到自我被理解与接纳,从而强化自尊心(Winner, Goldstein, & Vincent-Lancrin, 2013)。特别是在艺术课堂中教师和同伴对创作成果的积极反馈,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价值认同(Catterall, 2009)。

其次,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成就体验对于自尊心建构具有重要作用。青少年在完成一件视觉艺术作品的过程中,经历从构想到实现的连续努力,这一过程本身便是一种目标导向性行为。研究表明,成功完成创造性任务能够带来成就感,而成就感又是自尊心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Marsh & Craven, 2006)。尤其是在视觉艺术教育中,当青少年通过不断试验与修正,最终实现具有独创性的成果时,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信任感与认同感会得到实质性增强。

此外，视觉艺术活动促进了青少年社会认同感的形成。在小组创作、作品展览及公共艺术项目等活动中，青少年通过与他人交流与合作，获得了社会层面的认可与支持。这种积极的社会反馈不仅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也进一步巩固了自我价值感（Davis, 2010）。同时，艺术作品作为一种可视化成果，为青少年提供了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使他们能够在更广泛的社会交往中展示自我，从而在社会比较中获得积极的自我确认。

然而，尽管视觉艺术训练在促进自尊心建构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现有研究也提醒我们，这一过程受多种因素调节。个体的初始自尊水平、教师的引导方式、同伴环境的支持程度以及文化价值观等，都会影响艺术教育对自尊心的实际促进效果（Harter, 2012）。例如，在高度竞争或标准化评价较强的艺术教育环境中，个别青少年反而可能因作品未达到外部期望而产生挫败感，导致自尊心受损。因此，如何在艺术教育中建立包容性、成长型的支持体系，是未来进一步发挥视觉艺术训练自尊心促进作用的重要课题。综上所述，视觉艺术训练通过促进自我表达、提供成就体验以及增强社会认同，形成了支持青少年自尊心建构的多重机制。参考表 1 视觉艺术训练促进青少年自尊心的机制，分析未来在教育实践中，应更加注重艺术课程的个性化指导与情感支持，创造一个有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艺术学习环境。

表 1 视觉艺术训练促进青少年自尊心的机制分析

机制类别	具体表现	促进路径
自我表达	通过艺术作品自由表达内心情感与思想	增强自我认知与自我接纳， 提升自尊水平
成就体验	完成艺术作品并获得个人成就感	强化自我效能感， 构建积极的自我评价体系
社会认同	作品展示与社会互动中获得认可与反馈	增强归属感与社会价值感，巩固自尊心

3.1 自我表达在自尊心建构中的作用

在视觉艺术训练中，自我表达不仅是一种创造活动，更是青少年自我认知与自我接纳的重要途径。通过绘画、雕塑、摄影等多样化的艺术形式，青少年得以将内心世界具象化地呈现出来，这种表达过程强化了他们对自我独特性的理解与认同。艺术教育中的自由创作环境，使青少年能够探索自我而不受传统学科评价体系的限制，在表达与创造中不断重塑自我形象，从而在心理层面上形成积极而稳定的自我概念（Winner, Goldstein, & Vincent-Lancrin, 2013）。

在视觉艺术的学习过程中，艺术作品成为了个体情感、经验与价值观的外化载体。青少年通过作品与外界进行沟通，不仅深化了自我认识，也获得了情感上的释放与认同感。特别是在教师与同伴积极反馈的环境下，青少年能够体验到自身努力与表达被理解和肯定，这种正向的社会反馈进一步强化了其自我效能感与价值感（Catterall, 2009）。艺术创作本身作为一种自我驱动的成就体验，为青少年提供了独立于传统学业评价体系之外的成功感知，成为其自尊心增长的重要心理资源。

然而，自我表达对自尊心的促进作用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与教育环境条件。在一个鼓励个性化表达、尊重多元观点的课堂氛围中，青少年更容易在创作中获得心理上的成长与自我价值的确证（Burton, Horowitz, & Abeles, 2000）。相反，如果艺术教育过于强调技术标准或结果导向，或者在创作过程中缺乏情感支持与社会接纳，青少年则可能在表达过程中感受到挫折与排斥，甚至削弱自尊心（Harter, 2012）。因此，视觉艺术训练中自我表达的积极作用不仅依赖于个体的创造性活动本身，更与教育环境的开放性、

教师的引导方式以及社会互动的质量密切相关。通过在艺术教育中持续营造自由、安全与包容的表达空间，视觉艺术训练可以成为青少年自尊心建构的重要支撑力量。

3.2 成就体验在自尊心建构中的作用

成就体验在视觉艺术训练中扮演着促进青少年自尊心建构的重要角色。通过艺术创作，青少年能够在设定目标、克服挑战、完成作品的过程中体验到努力与成果的紧密联系，这种过程性成功感不仅增强了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认知，也为自我价值感的形成提供了心理支持（Marsh & Craven, 2006）。不同于传统学科中以标准化考试成绩作为评估依据的模式，视觉艺术创作更加强调个体性的成就体验，使青少年能够在多样化的标准下实现自我肯定。

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青少年通常需要经历从构思到执行的完整链条，这一连贯的努力过程有助于强化其成就动机和自我效能感。当个体能够在面对挑战时坚持尝试、不断调整策略并最终完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时，他们在心理上会产生强烈的胜任感，这种胜任感直接关联着自尊心的增长（Bandura, 1997）。与此相关，研究发现，完成艺术作品所带来的内在成就体验，往往比外部评价更能深层次地支撑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Harter, 2012）。

值得注意的是，成就体验对自尊心的促进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艺术教育环境的设计与引导方式。在一个鼓励过程探索而非单纯结果评价的教学环境中，青少年更容易在每一次努力和微小进步中获得成就感，从而逐步累积积极的自我认知（Davis, 2010）。如果艺术教育过度强调竞技性或成果的优劣排序，则可能削弱学生在过程中体验到的自我成就感，反而引发自我怀疑和焦虑。因此，如何在视觉艺术教学中创造鼓励试错、尊重多元成功标准的氛围，对于成就体验转化为自尊心的建构至关重要。总体来看，成就体验通过强化努力与成果之间的积极关联、提升自我效能感以及鼓励积极情感体验，为青少年自尊心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视觉艺术训练中的这一机制不仅有助于青少年面对未来更广泛的挑战，还在心理层面培养了其持续自我激励和积极自我认同的能力。

3.3 社会认同在自尊心建构中的作用

在视觉艺术训练中，社会认同作为自尊心建构的重要心理机制，贯穿于青少年艺术学习与创作的各个环节。通过与同伴、教师及更广泛社会群体的互动，青少年在作品的分享、交流与展示过程中，逐渐获得对自身社会角色与价值的确认，从而在心理上建构起更为积极的自我评价体系（Wentzel, 2014）。社会认同不仅关乎个体在群体中的归属感，也深刻影响着自我价值感的形成与维持。

视觉艺术教育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社会交流机会，无论是在课堂内的小组创作，还是在课外的展览与比赛中，艺术作品作为沟通媒介，使青少年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展示自我，与他人建立情感连接。当作品被教师、同伴乃至更大范围内的观众理解、欣赏与认可时，个体获得了直接而具体的社会反馈，这种反馈强化了青少年对自身能力与独特性的积极认知（Davis, 2010）。研究指出，积极的社会评价经历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自尊水平，尤其是在青少年这一发展阶段，社会认同对自尊心的影响尤为显著（Harter, 2012）。

然而，社会认同对自尊心的促进作用并非总是正向发生。社会反馈的性质、方式与一致性都会影响其效应。当青少年在艺术创作中遭遇负面评价、排斥或忽视时，自尊心可能受到打击，导致自我怀疑甚至社

会退缩 (Wentzel, 2014)。因此,在艺术教育实践中,教师与同伴群体应积极营造一个尊重差异、鼓励多样性的氛围,确保每位青少年都能在创作与展示中感受到正向社会认同,进而在归属感与自我价值感的双重促进下,形成健康而积极的自尊心。社会认同通过提供情感支持、价值确认与归属体验,在视觉艺术训练中构建了促进青少年自尊心发展的重要支撑系统。艺术教育若能充分发挥其社会化功能,不仅有助于个体心理成长,也有助于培养具有自信与社会责任感的未来公民。

4. 总结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围绕视觉艺术训练对青少年创造力与自尊心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系统性评论与批判性分析。通过梳理已有文献与理论成果,可以清晰地看到,视觉艺术教育不仅在认知领域激发了青少年的发散性思维与创新潜能,更在情感与社会适应领域,通过自我表达、成就体验和社会认同等机制,有效促进了自尊心的建构。视觉艺术训练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自由探索与多元表达的平台,使个体能够在情绪调节、社会互动与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实现心理成长 (Winner, Goldstein, & Vincent-Lancrin, 2013; Catterall, 2009)。

尽管视觉艺术训练在促进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诸多积极效应,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多数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难以明确视觉艺术教育对创造力与自尊心的长期促进效应及其因果关系 (Marsh & Craven, 2006)。其次,视觉艺术类别的内部差异、干预持续时间的不同,以及教育环境的文化背景对训练效果的调节作用尚未被系统深入地探讨 (Kim, 2011)。此外,个体初始心理特征如自尊水平、社会支持网络等对训练效果的影响亦常被忽略,导致现有结论在广泛应用时存在一定局限。

基于当前的发现与局限,未来研究应朝向更纵深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应加强采用纵向研究设计,通过多时点测量揭示视觉艺术教育对创造力与自尊心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明确其因果关系。另一方面,未来研究需更细致地区分不同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塑、摄影等)对心理发展的具体效应,探讨不同媒介在激发创造力与支持自尊心建构方面的差异机制 (Hetland, Winner, Veenema, & Sheridan, 2013)。此外,跨文化比较研究对于理解视觉艺术教育效果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也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青少年发展受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未来研究还应将个体差异变量纳入分析框架,探索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民族背景等因素在艺术教育干预效果中的调节作用 (Harter, 2012)。

从实践层面来看,艺术教育应超越技能训练的狭隘定位,充分发挥其在认知、情感与社会性发展中的综合功能。教育者应注重营造自由、包容、支持性的艺术学习环境,尊重个体差异,鼓励多样化表达,并通过过程性评价方式激发青少年的内在动机与持续成长意识。通过理论深化与实践优化,视觉艺术教育有望在未来更有效地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心理发展,培养具有创造力、情感韧性与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公民。

参考文献:

- [1] Burton J M, Horowitz R, Abeles H. Learning in and through the arts: The question of transfer[J].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2000, 41(3): 228-257. DOI:10.2307/1320379.
- [2] Catterall J S. *Doing well and doing good by doing art*[M]. Los Angeles: I-Group Books, 2009.
- [3] Hetland L, Winner E, Veenema S, Sheridan K M. *Studio thinking 2: The real benefits of visual arts education*[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13.
- [4] Winner E, Goldstein T R, Vincent-Lancrin S. *Art for art's sake? The impact of arts education*[R].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3.
- [5] Kim K H. The creativity crisis: The decrease in creative thinking scores on the 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J].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011, 23(4): 285 - 295. DOI:10.1080/10400419.2011.627805.

- [6] Davis J H. Why our schools need the arts[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10.
- [7] Harter 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Developmental and sociocultural foundations[M]. 2nd e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2.
- [8] Marsh H W, Craven R G. Reciprocal effects of self-concept and performance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Beyond seductive pleasure and un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 1(2): 133 - 163. DOI:10.1111/j.1745-6916.2006.00010.x.
- [9]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M]. New York: W. H. Freeman, 1997.
- [10] Wentzel K R. Prosocial behavior and peer relations in adolescence[M]// Lerner R M, Steinberg L.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development*. 2nd ed.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9: 440 - 470.

The Promotion of Creativity and Self-Esteem in Adolescents through

Visual Arts Training

Chen Congjing

Accademia Ligustica di Belle Arti di Genova, Liguria Region, Italy, 34132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increasing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role of visual arts education in promoting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and crit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visual arts train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creativity and self-esteem.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visual arts training significantly enhances adolescents' innovative abilities and self-value by fostering self-expression, achievement experiences, and social recognition.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still exhibits limitations in areas such as the confirmation of causal relationships, differentiation of art forms, adaptation to cultural contexts, and control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Future studies should strengthen longitudinal research designs, refine types of artistic interventions, and expand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ies to more comprehensively unco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visual arts education influences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analys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optimizing visual arts education practices and promoting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Keywords: Visual Arts Education; Creativity Development; Self-Esteem Construction;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rts Education Practic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6

地域性景观建筑文化传承的实践性教学路径探索

张鹏¹

(湖北科技学院艺术与 design 学院 湖北 咸宁 437000)

摘要: 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地域性景观建筑文化面临同质化与失传的危机, 其传承对维护文化多样性、激发设计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实践教学视角, 通过文献分析与案例研究, 系统探讨地域性景观建筑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教学传承路径。研究提出“三阶联动”教学模式, 即构建“基础理论—专业实践—创新应用”的课程体系, 结合项目驱动教学法、情境教学法与数字化技术, 强化学生的文化认知与实践能力。实证表明, 该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地域文化敏感性与设计创新能力, 为本科教学改革提供可操作性方案。

关键词: 地域性景观建筑; 文化传承; 课程体系; 数字化技术

引言

地域性景观建筑是自然与人文交互的产物, 其空间形态、材料工艺与装饰符号承载着特定地域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然而, 全球化进程加速了建筑文化的趋同化, 大量传统建筑因保护不足或改造失当而丧失原真性^[1]。在此背景下, 高等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亟需探索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教学路径。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建筑保护技术或文化符号提取, 而对教学模式的系统性创新关注不足, 大城市高等院校存在高校众多, 在地化实践项目不足等情况。本文以本科教学为切入点, 结合南京大学“新文科”建设导向, 提出以实践教学为核心的文化传承框架, 结合我校作为地方性高校, 具有传统建筑本土性发展为基础, 为学生有效提供了在地化实践教学的建筑教学新模式, 旨在通过课程重构与方法创新, 培养学生对地域文化的深度理解与创造性转化能力。

一、地域性景观建筑文化传承的实践价值

1.1 文化多样性的维系与活化

地域性景观建筑是文化多样性的物质载体。在中国传统建筑与地域性文化相结合的认知展示中, 其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形制均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其中皖南徽派建筑的“四水归堂”布局, 映射了儒家伦理中的家族尊严; 福建土楼的环形结构, 体现了客家人防御与族群共生的团结智慧^[2], 白族传统民居的围合式重

¹基金项目: 湖北科技学院 2023 年校级教学研究项目: 《建筑初步》在乡村振兴视野下建筑设计思路的融合与创新。项目编号: 2023XY043

作者简介: 张鹏,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 传统村落、景观设计、旅游规划

耳建筑，彰显了生产、生活、生态互融的生存方式^[1]。结合鄂东南重院建筑，教师团队确立了其以宗族为领导力的资源密集型生活方式^[3]。通过对中式建筑地域性教学讲解，学生能够解码这些建筑背后的文化逻辑，进而将其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

1.2 设计创新的本土化根基

国际式建筑的泛滥导致空间认同感弱化。研究表明，融入地域文化元素的设计方案在公众接受度上高出传统现代建筑 23%^[4]。教学中强调地域性文化基因的提取与应用，可为学生提供差异化设计策略，避免设计语言的空洞化。本课程已带领学生参与地域性传统建筑的文化基因提取，特别是在窗棂、木雕、檐下彩绘等细部，进行关键要素抓取，并进行数字化留存，为未来修旧如旧的固件修复起到原始数据库支撑^[3]。同时结合专业竞赛，对此类文化基因进行了文化创新设计，保证了学生设计思维的多元化发展。

1.3 社会经济效益的双重驱动

乡村振兴是村落在政策引导下的人居环境聚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空间。城市化进程的人口虹吸现象与村落空心化的人口外流现象成为鲜明对比。通过理论学习及实证调研，作为地方教师发现，乡村产业体量小或缺失、乡村景观荒野化、乡村空间无序化、乡村建筑异化、公共资源紧缺，青年乡村群体对经济收益、环境美感、教育医疗等需求的不满足，进行了背离乡村发展的道路。如何立足本土，结合青年学生群体，进行有效的乡村人居环境提升实践，打造美丽样品村，是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吸引返乡群体、游客群体，提升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其活化利用对地方经济具有显著拉动效应。以苏州平江路历史街区为例，其改造后旅游收入年均增长 15%，并带动周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5]。实践教学通过对接真实项目，使学生掌握文化资源向经济价值转化的路径，增强社会责任感。

二、实践性教学路径的系统构建

2.1 “三阶联动”课程体系构建

针对教学体系，环境设计专业教师团队结合在地化实践情况，提出了基于“理论基础+专业实践+创新应用”的阶梯式教学体系（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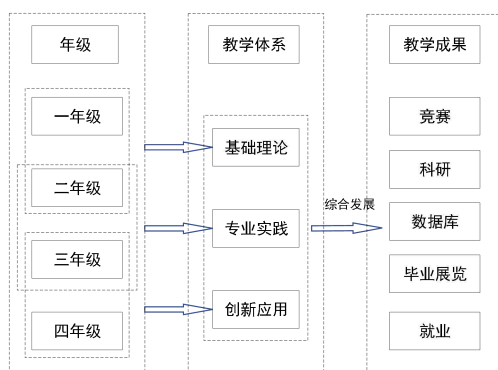


图 1：阶梯式教学体系

（笔者自绘）

基础理论课程是设计大一学生的必修课程，囊括设计史、艺术概论、设计基础等具有综合理论教育的课程，促进学生了解、认知、明确专业方向。结合西方艺术发展与中国艺术发展对比讲解，引入本土非遗文化知识点，培养学生厚植热爱生活、关爱社会、文化自信的基础设计思想理^[6]。。

专业实践结合课程安排，区别于艺术写生等课程，通过带领学生前往传统村落调研实践、以项目为指导，进行设计实践专题，学生数据库积累多用于毕业设计创作、专业竞赛、文创产品研发等项目。

创新应用应当以毕业设计与社会实践为目标与载体,鼓励跨学科协作。如联合数统、资源与环境、农学、旅游管理等专业,在数据建模、地理规划、植物种植、旅游规划等方面进行实践拓展,鼓励自建团队,协同落实项目进程,以充实自我能力,提升社会实践能力。

2.2 教学方法的多元化创新

项目驱动教学法:引入真实课题,分阶段模拟设计流程。引进项目导师制,结合案例,学生需完成“案例调研—概念设计—设计成图—技术深化—项目落地”的全流程工程,指定阶段性成果汇报,由项目导师选定方案,并给予结项奖励。

情境沉浸教学法:充分利用AI大数据的功能多样性,有效组织学生进行AI指令、AI文字生成图形、图形动画生成等先进科技手段,培养学生逻辑思维与表达能力。利用VR技术构建虚拟文化场景,通过古建筑拆解、红砖工业建筑建造过程、敦煌艺术表达等多元地域场景教学,促进学生对传统建筑文化具有形式美于意境美的深刻认知。

田野实证教学法:组织学生前往传统村落进行一个学年,多批次的定向调研,记录乡村发展口述史与建筑营造技艺。例如,在浙江楠溪江流域,学生通过访谈匠人、测绘宗祠,完成《浙南乡土建筑技艺图谱》的编撰。

2.3 数字化技术的赋能应用

数字化留存:针对地域性古建筑进行数字化留存及复原,通过电脑建模、渲染、扫描等方式构建本地化建筑艺术元素数据库,助力学生多元化发展,为设计思路拓展起到托底支撑。

大数据分析:鼓励学生通过大数据、AI等新的知识获取方式构建地域建筑文化数据库,强化学生进行多维度的软件学习,如地理信息系统的ArcGIS、QGIS等软件,合理性的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掌握多项技能应用。

AI辅助创作:训练深度学习模型识别传统建筑风格特征,辅助学生快速提取文化符号并生成设计草案,构建自我AI数据库。

2.4 文化留存助力专业课程体系构建

环境设计专业作为集成艺术美学建构与工程实践创新的复合型交叉学科,其课程体系遵循“基础—发展—核心—拓展”的递进式逻辑。为应对新时代设计人才“职业适应性”与“文化创新力”的双重需求,本专业以“学科交叉性”和“地域服务性”为内核,形成包含学科基础课程、职业发展课程、专业主干课程及专业拓展课程的四维协同体系。通过“课程思政+文化浸润”的双轨机制,融入中华美学精神与地域文化基因,形成“知识建构—能力塑造—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

(1) 学科基础课程

基础课程聚焦设计学通识教育,以“文化解码”与“技艺筑基”为双主线,设置艺术哲学、设计形态学、设计史论三大知识域。其中,艺术概论课程采用“经典文本+当代阐释”的对比研读模式,建立中西美学比较视野;三大构成课程创新性植入在地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在平面构成中引入鄂东南雕花剪纸的图式解构,色彩构成对接荆楚漆器色谱体系,形成“技艺研习—符号提取—现代转译”的教学闭环。搭建环艺、视传、产品三大设计专业的共融课程平台,建立跨专业联合工作坊机制,培育文化主体意识与跨界思维,激发学生文化自信与兴趣引领。

(2) 职业发展课程

发展课程主要围绕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开展一系列符合学科专业要求的职业必备技能训练。采用了“成果导向教育+构思—设计—实现—运作”工程教育模式,构建环境设计职业能力发展图谱。合成涵盖景观设计基础、建筑制图、材料与施工工艺、景观工程与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学科理论与技能的

课程集群。这一系列课程重点培养学生的环境设计专业基础能力、综合素养，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环境空间综合表达能力和工程设计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

（3）专业主干课程

专业主干课依托“新文科”建设理念，构建“文化主题+真实项目”驱动式课程链。设置5大专题设计单元：1.居住空间设计（地域民居现代转译）；2.展陈设计（非遗文化叙事空间）；3.公共空间设计（城市微更新）；4.乡村环境设计（美丽乡村建设）；5.毕业设计（综合创新）。其中模型设计课程形成“田野调查—数字建模—实体建造”进阶式培养路径，基于鄂东南传统民居测绘，构建咸宁市文化建筑实体模型数据库（图二）。毕业设计方面致力于在三线工业遗产更新、乡村建筑活化利用等方面，立足城市化进展中的文化留存。课程体现了环境设计专业服务地方的特色优势。



图 2：叶挺北伐指挥部



沈从文故居

（作者自摄）

（4）专业拓展课程

专业拓展课程主要与专业相关，但超出了常规课程的广度和深度，涵盖跨学科知识、创新技能、社会责任感等。特别是在历史建筑保护与修复拓展方面，立足咸宁市的国家级传统村落片区连续性，基于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构建了一系列创新传承实践，既能传承历史文化、保护建筑遗产，又能通过创新传承方式，使其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需求。乡村景观规划设计课程响应乡村振兴政策，在教学中融入本土发展乡村建设的需求，立足地域乡村资源优势，开展校地产学研应用式教学，鼓励学生尝试设计。

三、教学成效与实证分析

湖北科技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根据教学体系改变后，2022—2024年度相关课程的学生满意度均达到90%以上，学生均有参与过市政儿童公园项目、国家级传统村落申报项目、三线工业遗产更新项目等，在实践中锻炼提升自己。同时在竞赛方面，部分学生取得省级排名，传统建筑相关课程受到湖北省电视台节目录制并进行播出，取得较好反响，结合校地合作，打造季节性乡村农耕文旅景观，扩大经济落后地区的数字化传媒推广软实力。

四、结论与展望

地域性景观建筑文化的教学传承需突破理论灌输的局限，构建“理论基础+专业实践+创新应用”一体化的实践体系。本文提出的教学模式通过课程重构、方法创新与技术赋能，有效弥合了文化认知与设计实践的鸿沟。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跨校协同机制，如建立地域建筑教学联盟，共享案例库与师资资源，推动文化传承从个体实践向系统化教育生态升级。

参考文献

- [1] 张鹏,唐雪琼.大理白族民居建筑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J].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5(04):8692.
- [2] 吴良镛. 中国人居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 [3] 汪艳荣,罗彬.鄂东南传统建筑彩绘在荆楚建筑风貌中的应用策略研究[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23,43(06):818.DOI:10.16751/j.cnki.hbkj.2023.06.003.
- [4] 李砚祖. 设计史论研究与当代设计[J]. 工业工程设计,2021,3(04):1-4+11.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21.04.001.
- [5] 汤娟,汪德根,王莉.基于场景理论的历史文化街区文化价值识别——以苏州平江路为例[J].中国生态旅游,2023,13(01):78-94.
- [6] 张鹏.万里茶道视域下羊楼洞茶文化传统建筑保护与发展路径研究[J].城市建筑,2025,22(05):146149+209.DOI:10.19892/j.cnki.csjz.2025.05.31.

Exploring Practical Teaching Approaches for the Inheritance of Regional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Culture

Peng Zhang¹

¹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ning, Hubei 437000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regional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culture faces the dual challenges of homogenization and potential loss. Its inheritance is vital for preserv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fostering design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teaching,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core values of regional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culture and its pedagogical transmission pathway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The research proposes a “three-level integration” teaching model that constructs a curriculum system of “fundamental theory – professional practice – innovative application.” By incorporat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 model aims to enhance students’ cultural awareness and practical capabilities.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approa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students’ sensitivity to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ir capacity for creative design, offering an operable framework for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reform.

Keywords:Regional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ultural inheritance; Curriculum system; Digital technolog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7

演好你的角色：基于拟剧理论的高校辅导员工作技巧探究

杨贤树¹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清远 511500)

摘要：拟剧理论是研究社会行为的重要方法。“拟剧现象”广泛存在于高校学生工作中，对高校学生工作造成了一定挑战。互联网蓬勃发展对于高校学生工作中“拟剧现象”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分析辅导员与学生互动过程中的表演特性，探讨学生因接触过多互联网信息后产生的自我变化，以及此类变化在辅导员与学生互动中的具体表现，并提出基于拟剧理论，辅导员台前、台上、幕后开展学生工作的技巧，为高校辅导员工作提供可靠策略。

关键词：拟剧理论；辅导员；互联网；拟剧现象；工作技巧

一、高校辅导员与学生互动过程中的“拟剧现象”及其成因

(一) 高校辅导员与学生互动过程中的“拟剧现象”表现

1. 学生“拟剧现象”

大学生在互联网接触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丰富了他们的视野，也对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学生与辅导员的互动过程中表现为一种“拟剧现象”。

学生在辅导员面前表现出一种“角色扮演”的行为。学生会考虑自我真实形象对与互动对象互动时带来的影响^[1]。学生在与辅导员交流时，可能会刻意展示自己的优点和特长，以期得到辅导员的认可和赞赏，这种“角色扮演”的行为有助于在互动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但也会导致学生在真实自我与表演自我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出现忘却自我的情况。

学生有“自我展示”的倾向。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展示自己的风采和才华，以此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这种“自我展示”的行为有助于在互动中建立积极的形象和声誉，但更可能导致在追求认可和赞赏的过程中产生与他人过度竞争的焦虑情绪，进而影响个人表现，直至出现负面表现。

学生存在“模仿行为”。他们在互联网中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这些内容为学生的行为方式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但可能会导致学生在与辅导员互动时模仿某些特定的人物形象或行为方式。这种“模仿行为”有助于学生在互动中融入集体和获得归属感，但会导致学生在模仿过程中失去自我和个性特征，甚至陷入模仿对象的“自我欣赏”陷阱中，逐渐失去自我。

2. 辅导员“拟剧现象”

辅导员往往有权威需求^[2]，体现在学生行为表现上的“拟剧现象”也同样会体现在辅导员的工作中。由于学生个性和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辅导员需要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来制定可行的互动策略，在与不同学生交流时，辅导员可能会采用不同的语气、表情和姿态来展示自己的亲和力和专业性。这种“角色定位”的策略有助于辅导员在互动中更好地理解 and 回应学生的需求和期望，也有助于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更有助于获取学生的信任和理解。

由于互联网信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学生在与辅导员交流时可能会遇到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和情境。为了更好地应对，辅导员可能会通过模拟不同的场景和情境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表达。这种“情境模拟”的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也有助于辅导员在互动中更好地了解学生的个性和需

¹基金项目：2023 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高等职业教育“四级三阶一体化”学生干部教育培养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023GXSZ124）。

作者简介：杨贤树（1997-），男，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求,进而提供学生内心真实情感支持或生活需要。

(二) 高校辅导员与学生互动过程中的“拟剧现象”成因

1. 互联网信息流瀑效应对于“拟剧现象”产生的推动

信息流瀑通常始于某个个体或少数个体传播一条信息或观点,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由于群体成员的相互模仿和从众心理,形成一种集体认知或共识,但是这种共识往往并非基于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而是受到群体情绪的驱动。

信息流瀑通常始于少数个体传播一条信息或观点,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一种集体认知或共识,一些虚假信息、不良信息得以广泛传播。学生缺乏足够判断和鉴别力,容易受到误导和欺骗^[3]。当出现关于辅导员工作的负面评论时,学生趋向于认同这些负面评论,形成群体负面印象,这种负面印象在互动过程中被不断强化,导致辅导员在学生心中的形象被扭曲,“拟剧现象”由此产生。

信息流瀑效应解释了为何在互联网环境下,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拟剧现象”更容易发生。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使得负面评论能够迅速扩散。同时,学生的从众心理和情绪传染使得他们容易接受并传播这些负面评论,进而形成一种对辅导员群体的集体认知或共识,这种共识进一步加剧了“拟剧现象”的发生。

2. 互联网信息偏颇吸收对于“拟剧现象”的恶性促进

信息偏颇吸收指人们以一种有偏见的方式来吸收和消化信息。人们往往只关注与自己观点相符的信息,忽视或排斥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信息^[4]。

偏颇吸收方式使人们更容易受到谣言和虚假信息的误导,进而导致群体极化,促使错误信息广泛传播,学生身心受损^[5]。当辅导员出现不佳表现时,在互联网上被传播和放大。学生过分关注负面信息,忽视辅导员在工作中的努力和贡献,进一步加剧“拟剧现象”的发生。

信息偏颇吸收现象解释了为何在辅导员与学生互动过程中,“拟剧现象”会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的趋势。辅导员的不佳表现被学生在互联网上传播和放大。同时,学生更容易接受并传播这些负面信息,进而形成对辅导员群体的负面印象。这种负面印象在互动过程中被不断强化,导致辅导员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被进一步扭曲。这种扭曲的形象又会影响辅导员的工作表现和心态,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二、拟剧理论背景下高校辅导员调整工作方式的重要意义

(一) 拟剧理论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工作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1. 网络学习过快带来的信息过载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知识的传播与学习方式的变革,信息爆炸导致学生面临海量学习资源的选择困难,容易引发学生学习焦虑、注意力分散等问题。传统辅导员工作方式往往依赖于面对面的交流和观察,这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显得非常不适应。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角色扮演和行为表现往往先于辅导员的察觉,导致辅导员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上存在时间差,难以做到防患于未然。

2. 学生强烈的拟剧表现现实需求

大学生正处于自我认同构建的关键时期,倾向于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中展示自我,塑造理想自我形象。大学生通过网络空间和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多样化的角色扮演,扮演的角色不仅反映了学生的个人兴趣和价值追求,也构成了他们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角色扮演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增加了辅导员识别和理解的难度,使得辅导员难以快速准确把握学生的真实需求和成长潜在问题,增加了情感沟通和心理干预的难度。

(二) 拟剧理论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工作存在的问题

1. 轻视网络学习

学生群体在网络空间中的角色扮演丰富多样,然而,部分辅导员对网络信息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对学生网络行为的深入了解和关注,无法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在网络角色扮演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开放性为学生提供了更为自由的表达空间,但同时也增加了辅导员与学生之间沟通的难度,部分辅导员在网络沟通技巧上缺乏训练和实践,难以有效应对学生在网络角色扮演中的复杂心理和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辅导员在应对学生角色扮演时的困难,导致辅导员难以有效应对学生在网络角色扮演中的复杂心理和行为。

2. 脱离学生群体

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情感距离是影响辅导员了解学生问题的重要因素。辅导员由于工作繁忙、个人性

格等原因，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不足，难以建立起亲密的师生关系，导致辅导员在应对学生角色扮演时，无法深入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和真实需求，难以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学生在角色扮演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往往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复杂性，需要辅导员通过深入观察和细致交流才能发现。然而，由于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情感联系不足，导致辅导员在问题识别上存在困难。

3. 成长速度滞后

辅导员缺乏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敏感性和求知欲，不重视经常性学习，导致自身知识储备和技能水平难以跟上步伐，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辅导员在工作方法上仍然沿用传统的方式和手段，如面对面的谈话、纸质材料的整理等，难以满足学生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辅导员在技术手段上缺乏学习和实践，难以将新技术应用于实际工作，缺乏科学有效的手段和方法，难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辅导员创新意识不足，缺乏对新方法和新技术的探索和尝试会导致工作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学生多样化的需求。

（三）基于拟剧理论调整高校辅导员工作模式的现实意义

1. 可以促进工作技能提升

“拟剧现象”使辅导员在了解学生真实需求和问题时面临困难。通过加强学生网络行为的关注和研究，可以更有效地识别和分析学生的网络角色和行为。辅导员应更加注重与学生的双向沟通和互动，理解学生在不同场景下的角色扮演和内心需求，提供更有效的帮助和支持。辅导员需要更加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多样性，通过多样化的教育手段和服务方式，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

2. 可以促进个人能力成长

辅导员更加注重对外界动态的关注和了解，积极参加各类培训和交流活动，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辅导员的成长和发展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路径和目标。调整辅导员工作模式，可以为辅导员提供一个更加清晰和具体的成长路径，包括职业规划、能力提升、绩效评价等方面，促进辅导员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

3. 可以促进学校事业发展

辅导员作为高校学生管理和教育的重要力量，其工作模式的调整可以推动学校整体教育质量的提升。通过加强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提供更有效的教育服务；通过加强辅导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提升，可以推动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三、拟剧理论基础下高校辅导员开展学生工作的技巧

（一）台前定妆：做好角色定位

1. 清晰角色定位

平衡人生导师与知心朋友的关系。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开展工作，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主动与学生打成一片，保持亦师亦友的良好师生关系；积极参与到班会或团日活动中，与学生共同讨论问题，分享心得，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2. 塑造专业形象

塑造专业的、负责的形象。通过精心选取角度的照片、反复斟酌的文字，甚至修图美拍的加工，发布积极阳光的动态，也可以发布关于学生活动、教育心得、专业知识分享等内容，强化自己作为专业辅导员的形象。

3. 台前展示形象

展示专业、负责的形象。保持礼貌、热情的态度，及时传达学生的情况和学校的政策；在与同事合作时，要积极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推进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促进思政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台上发力：做好舞台表演

1. 制定工作计划

根据学校的工作要求和学生的实际需求，制定详细的阶段工作计划。工作计划应包括学期工作目标、每月工作重点、每周工作安排等。通过制定工作计划，可以更加有条理地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2. 积极倾听学生

积极倾听学生的声音，关注学生的需求和诉求。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收集学生对学校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与学生交流时，要保持耐心、细致的态度，认真听取学生的想法和感受。

3. 了解学生需求

关注学生的个性和需求，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在与学生交流时，要注意观察学生的言行举止和兴趣爱好；在安排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在提供指导时，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给予个性化的建议。

4. 提供个性服务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服务，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在学习方面，可以为学生提供学习方法和技巧的指导；在生活方面，可以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和情感支持；在职业规划方面，可以为学生提供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

5. 及时反馈建议

及时反馈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并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帮助。在收到学生的问题或困惑时，要尽快回复并给予解答；在发现学生的优点和进步时，要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在发现学生的问题和不足时，要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帮助。

6. 做到言行合一

严格遵循职业规范，做到言行一致。在与学生的互动中，保持真诚、友善的态度，通过自己的言行树立榜样，激励学生积极向上；在与学生谈心谈话时，时刻注意倾听学生的心声，用真诚的话语鼓励学生，让学生感受到辅导员的关爱和支持，获得学生信赖和认可。

7. 避开负面信息

避免探讨那些与社会公认的价值、规范、标准不一致的行动，多表现与社会公认的价值、规范、标准相一致的行动^[3-4]。在面对学生的问题时，要保持冷静、理智的态度，避免情绪化的言行；在与学生家长沟通时，要客观、公正地反映学生的情况，避免夸大或缩小事实。

8. 展示积极成果

积极展示自己的工作成果和成效，以增强学生的信任感和归属感。在思政工作会议上，可以分享自己在思政教育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成果；在班级活动中，可以展示学生的优秀作品和成果；在与家长沟通时，可以介绍学生在校期间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三）幕后充电：做好状态保持

1. 幕后调整状态

幕后调整状态，放松身心，为台前做好准备。多参加一些运动、听音乐、看电影等活动，缓解工作压力；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分享工作和生活的点滴，增进彼此的感情，保持身心状态处于好的水平，可以保证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时心平气和。

2. 加强理论学习

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通过自我提升，训练谈话理论涵养，强化理论基础，可以让学生更加信服，便于开展工作。

3. 开展实践创新

勇于实践创新，不断探索新的工作方法和模式。通过丰富多样的创新实践，可以锻炼自我，也可以为学生发展提供帮助。

四、总结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受互联网影响深刻，“拟剧现象”广泛存在于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拟剧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印象管理”，即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运用某种方法塑造个人形象，以获取符合自己定位的他人印象^[6-7]。面对学生的拟剧行为，辅导员要转变思路，将其视为一种教育资源，主动适应网络学习的新趋势，成为学生网络学习旅程中的引导者和伙伴，帮助学生掌握信息筛选技巧，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同时，辅导员要学会运用新媒体工具与学生进行有效沟通。

拟剧理论为高校辅导员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应当充分发挥拟剧理论的益处，通过运用理想化表演、角色定位、剧本创作、场景布置、台前与幕后、互动管理、团队协作、印象管理、因材施教和持续学习等技巧和方法，更好地与学生交流，塑造学生面前积极的形象，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注入新内涵。

参考文献:

- [1]Duffy E B ,Chan K N . “ You never really know who ’ s looking ” : Imagined surveillanc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J].New Media & Society,2019,21(1):119-138.
- [2]赵海踪.拟剧论视角下新入职教师“权威”的现实审视与行动策略[J].教书育人,2023,(25):44-47.
- [3]秦瑶.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策略探究[J].新闻研究导刊,2024,15(13):141-144.
- [4]乔睿,齐宗峰.网络圈群下互联网舆论传播特点及影响因素[J].记者摇篮,2023,(09):42-44.
- [5]黄娜.网络群体极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应对研究[J].现代交际,2024,(06):101-108+124.
- [6]李飞.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的形象构建——基于印象管理的社会学分析[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04):120-123.
- [7]吴明辉.社会互动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科技信息,2009,(23):639.

Play Your Role Well: Research on the Working Skills of College Counselors Based on the Dramaturgical Theory

Yang xianshu

Guangdong Construction Polytechnic, Guangdong Qingyuan, 511500

Abstract:The dramaturgical theory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studying social behavior. The dramatic phenomenon is widely present in the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osed certain challenges to the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ramatic phenomenon in college student work.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counselors and students, explores the self-changes that students undergo after being exposed to excessive Internet information, and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such chang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unselors and students. Based on the dramaturgical theory, it proposes techniques for counselors to carry out student work on stage, behind the scenes, and in front of the stage, providing reliable strategies for the work of college counselors.

Keywords:Dramaturgical theory; Counselor; Internetwork; Dramatic phenomenon; Work skills

Doi: 10.70693/jyxb.v1i1.9

高校 AIGC 检测标准的反思：人工智能与人的主体性让渡

钱亮帆^{1*} 刘立翔²

(¹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1, ²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促使高校普遍采用 AI 率检测来判定论文原创性。这一检测机制本质上依赖机器模型对文本生成概率的推断, 使作者本人的自我表达与主体判断处于被忽视甚至悬置的境地。主体的话语权被技术逻辑逐渐替代, 人的认知方式与语言实践也因算法的介入而面临异化风险。同时, 全球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对立日益凸显。算法所推动的技术理性对地方性知识的主体性构成侵蚀与压制, 而地方性知识则凭借其独特的具身经验与文化情境持续地抵抗与重构主体意义。理解并捍卫那些无法被技术逻辑所完全同化的主体性, 成为维系学术自由与生活世界丰富性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率检测; 主体位移; 话语权; 知识矛盾

一、主体、话语与权力：由论文 AI 率检测的发轫

从 ChatGPT 的爆火到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的广泛应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学术领域, 高校学生的毕业论文成为 AI 滥用的重灾区, 各大高校纷纷引入 AI 率检测机制判定论文原创性。如复旦大学发布《复旦大学关于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使用 AI 工具的规定(试行)》, 对人工智能工具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过程中的使用进行详细规范。一方面规定了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在不影响对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中的创新等能力的考察时可以有限制的使用; 另一方面又规定在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原始数据收集、结果图片与重要插图创作、论文撰写、答辩与检查、涉密内容六大版块禁止使用 AI。天津科技大学要求对所有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进行智能生成内容检测, 规定学生论文中智能生成内容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40%。四川大学明确要求检测毕业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占比, 文科不超过 20%、理工医科不超过 15%。中国人民大学对毕业论文(设计)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生成文本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将作为学生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和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评选的重要参考依据。与此同时, 有大量高校毕业年级同学在互联网上抱怨, 明明整个毕业论文都是自己写的, 却被检测出来极高的 AI 率。^[1]有同学将朱自清的名篇《荷塘月色》与刘慈欣《流浪地球》的片段上传至某常用论文检测系统后, 结果显示, 这两篇经典作品 AI 生成内容总体疑似度竟分别达到了 62.88% 和 52.88%。王勃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 更是在各大 AI 检测网站上查出了 100% 的 AI 率。^[2]许多学生被迫以“口语化表达”“删减逻辑关联”, 甚至“用 AI 降 AI”的策略迎合检测系统。

以上反映出高校 AIGC 检测标准中的一个根本性矛盾, 我如何自证我的论文不是 AI 写的? 该被相信的, 到底是人的判断, 还是技术的判断? AI 检测技术通过机器模型计算 AI 文本生成概率, 看似是为学术诚信筑起防线, 实则重塑着学术评价体系的权力结构。在 AI 率检测的技术逻辑下, 论文的“原创性”被简化为数据指标, 作者的思维过程、学术探索的主体性表达, 以及知识生产的独特语境, 都被压缩成算法可量化的参数。一旦 AI 检测报告判定论文“AI 率过高”, 即便作者强调内容是自己原创, 也很难推翻这一“检测结果”; 而当报告显示“AI 率低”时, 大家又会下意识觉得这个结果值得信赖, 相信算法系统的“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 创作者作为主体反而陷入被动局面, 只能按照 AI 检测的标准来反复证明自己。检测结果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 使人在话语表达中丧失了主体地位。

作者简介: 钱亮帆(2004—), 男,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伦理学;

刘立翔(2004—), 男,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社会学、教育社会学;

本文作者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 钱亮帆

AI 率检测的兴起,折射出技术对学术话语权的重新分配。其一,技术公司通过算法垄断,掌控学术质量的定义权。根据知网 AI 检测的官方说明,“AIGC 检测服务系统是以知网结构化、碎片化和知识元化的文献大数据资源为基础,按照预训练大语言模型的算法逻辑,从语言模式和语义逻辑两条链路,用 AI 对抗 AIGC”,其本质是用另一套 AI 模型来揣测某一文本是否由人撰写。其二,高校行政系统借检测结果强化管控,将技术误判风险转嫁于学生。学生一方面要为 AI 检测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又在对自身知识成果的辩护中失声。其三,学术共同体的话语权被架空。传统学术评价强调同行评议、专家评审等方式,可以通过多种路径的比对来证实论文的原创性,比如原始的田野材料、原始的数据、论文写作中的过程性成果等,人的主体性判断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而 AI 率检测将学术评价的标准交由算法系统,技术成为“终极仲裁者”,学者们不得不将自身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数据,以满足检测系统的要求,导致研究者苦心构建的学术表达则可能因算法误判陷入自证清白的困境。当研究者不得不调整论证结构、修饰语言风格以迎合检测算法的特征识别时,其主体意志已然屈从于技术系统的隐形支配。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中,学术主体的话语权被技术逻辑所替代,学者的身份从知识的创造者、阐释者,转变为技术系统的被动适应者,陷入“沉默”与“自证”的双重困境。

从更深层次来看, AI 率检测引发的主体位移,本质上是技术理性与人本价值的冲突在学术领域的具象化。技术理性追求标准化、效率化和可计算性,而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对真理的探索、对思想的表达,需要包容多样性与个性化的创造。当 AI 率检测以单一标准衡量复杂的学术成果时,学者自主创作的内容可能因不符合算法预设的“原创性”标准而被否定。这种现象不仅威胁着学术自由,更可能导致知识生产的客体化,使学术研究沦为技术系统的附庸,背离其追求真理、推动知识进步的初心。

二、知觉让渡:自然人的主体位移

在自然人的维度层面, AI 与人的主体性问题主要构成了一个“存在性”的偏移,主要呈现在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 AI 与人的感知构成了二律背反式的矛盾,既在主体感知延伸的同时又形成一定的遮蔽;另一个侧面是 AI 与人由于感知的归属问题产生了定位的偏移,也就进一步导致了主客体关系的阻塞。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人类对自身主体性的理解。当“自然人”在技术介入下逐渐让渡其认知与决策的主动权时,主体与客体的相对位置被彻底颠覆,传统参照坐标系也面临瓦解。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技术工具对感官经验的延伸,更深刻地触及人类存在论层面的自我定位危机——我们究竟是以“主体”的身份掌控技术,还是在技术的逻辑中沦为被重新定义的客体?

换句话说,“主体”究竟赋予给了哪一个论元,是将 AI 视作主体,抑或是将人视作主体,在过往的伦理学研究中,“主体”时时刻刻是以人为衡量标准。《老子》里提到:“域中有四大”^[3],其中“人大”就突出了人的主体价值;《尼各马可伦理学》强调:“我们所寻求的是人的善和人的幸福。人的善我们指的是灵魂的而不是身体的善。人的幸福我们指的是灵魂的一种活动。”^[4]在亚里士多德或老子看来,人的主体在过去是毫无争议的,人以外的东西被视作“客体”也是长久以来的,显然这与当代信息时代与生态哲学复归的时代完全不一样。在现代性的赋格之下,过往陈旧而坚硬的东西反而走向了毁灭与烟消云散,也难以对过去传统的二元观念提出新的解释,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在崩塌的“传统”。

但其实阿多诺在《主体与客体》中早已警示,主客体关系绝非静态的二元对立,而是通过实践不断重构的辩证过程:(主客体)“彼此不存在支配关系的但又存在各自介入的区别状态。”^[5]这种动态性在人工智能时代达到极致。以自动驾驶系统为例,人类驾驶员原本通过视觉、听觉与肌肉记忆构建的驾驶坐标系,被激光雷达、算法预测与实时数据流取代。方向盘后的“主体”不再是决策核心,其角色退化为系统监控者,甚至在紧急情况下被迫接受机器的判断逻辑。此时,阿多诺所谓的“互为中介”关系显现出吊诡的逆转:技术本应是主体认知客体的中介,却演变为重构主体认知框架的力量。当人类必须通过机器的数据模型理解世界时,主体性已然发生位移——我们不再直接面对客体,而是透过算法的棱镜观察被技术编码的“拟真现实”。

动态性的主客体关系浮现于认知、感受的基础性转换。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为这种位移提供了发生学解释。他认为,认知的本质是主体通过“同化”与“顺应”不断平衡自身与环境的关系,也就是“肯定自身的存在”^[6]。在传统认知模式中,人类将外部信息纳入既有图式(同化),或调整图式以适应新经验(顺应),这一过程始终以生物感官为参照系。布瓦索在《信息空间》里归纳了 15 世纪与 20 世纪的知识图式:



图 1 15 世纪可观察的知识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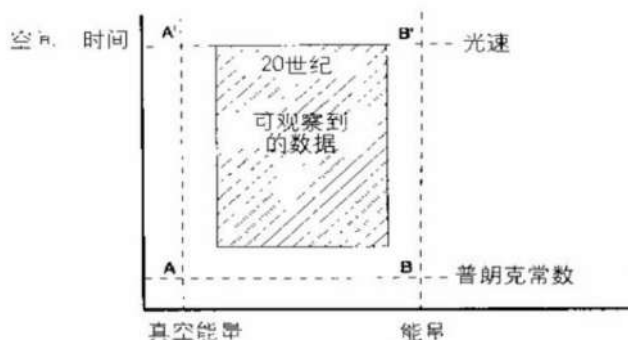


图 2 20 世纪可观察的知识图式^[7]

我们可以发现，在时代的变化下，人的知识图式会由于认知而产生巨大的差异，但在这之中，以皮亚杰的观点来说，始终是“客体近能由主体通过其各种活动而建构的一系列连续的接近（approximations），被主体所认知。它构成了主体认识的终极意义上的边界，主体努力想要逼近它，却又永远无法完全达到它。”^[8]

然而，人工智能创造了全新的认知环境。虚拟助手替代记忆存储，推荐算法预设信息偏好，脑机接口直接介入神经信号。如果主体试图“同化”这些技术产物时，原有的认知图式必然遭遇剧烈冲击。以社交媒体用户为例，其信息接收不再依赖主动检索，而是被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所规训。此时，“顺应”不再是渐进的知识积累，而是认知框架的强制重构，使得用户被迫接受以点击率、停留时长等数据指标为参照的新坐标系，其主体性在无形中被量化为可计算的行为轨迹。也就是说，AI 的认知能够覆盖到所有的实在客体。

弗拉维尔提出的“元认知”，则深入地剖析了人与 AI 的认知内核差异。元认知作为人类对认知过程的自我监控，本应是个体保持主体自主性的核心机制，“形成一个关于现时现地的认知活动和变化的、清晰的、可检验的模型”^[9]。但当 AI 系统深度介入认知活动时，这种意识状态面临双重解构。也就是在教学方面，使学习者的元认知活动简化为对算法评估的被动响应；而与此同时，脑机接口技术直接将神经信号转化为机器指令，意识与行动的关联被技术中介切断，主体甚至无法区分哪些决策源于自主意志，换句话说，这种意识的解构是类似于庄子所说的“混沌”的状态，导致走向更蒙昧的“反启蒙”。于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根基遭遇动摇，也就是说，如果“思”的过程被技术渗透，“我在”的主体确定性也随之消解。

技术的狂飙突进并未带来阿多诺期待的“启蒙辩证法”的实现，反而制造了新的蒙昧主义陷阱。如果说人类将主体性盲目地让渡给技术系统，他将在表面上获得了认知效率的提升，实质上却陷入了更隐蔽的权力支配关系。在技术坐标系的背后，是资本与权力的精密合谋。自然人看似自由地穿梭于技术建构的认知空间，实则每一步移动都被隐形的算法栅栏所限定。在此语境下，重拾主体性不仅需要技术批判意识，更需重建以人类经验为本体的认知坐标系。这或许意味着在拥抱技术延伸的同时，坚持保留那些无法被数据化的直觉、情感与价值判断，而或许正是这些“不完美”的人性特质，构成了抵御技术异化的最后堡垒。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此处讨论的数据知识，都是“全球性知识”或“公共性知识”的数据结构，并没有深入到“地方性知识”的体系内涵中去，这也是后文阐述的一个重要矛盾。

三、语言让渡：社会人的主体位移

人工智能对语言活动的介入，正在重构人类主体性在话语实践中的存在方式。如果机器能够生成流畅的文本、解析复杂语义、甚至模拟情感表达时的状态都模拟出来，语言这一传统被视为人类本质属性的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技术殖民。我们不妨试想如果算法可以替代人类完成诗歌创作、学术论文写作乃至情感倾诉时，那么在技术重构的话语空间中，究竟谁才是真正具有主体性的言说者？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曾将语言视为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符号系统，其意义产生于差异关系之中。这一理论框架在人工智能时代遭遇“结构意义”上的双重解构。从句法层面看，GPT-4等大语言模型通过海量语料训练，已能生成符合语法规则的文本序列，其句法结构的精确性甚至超越普通人类写作者。但这种精确性本质上是统计规律的产物，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的界限即世界的界限”^[10]，AI生成的语句虽符合形式逻辑，却缺乏真实世界经验的锚定。例如，当AI描述旧体诗歌时，其语句结构完美却无生命体验的支撑，以至于最近有将 deepseek 称为“赛博李贺”的表达，就是因为在意象上的极致美感与词章主题的断裂鸿沟，使得空有“诗鬼”之表现而无其内涵。这暴露出机器语言生产的本质缺陷——能指链的无限延展与所指根基的虚空。

词汇本身与意义就有着界限，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强调：“每一真正的、无伪的、直接的意志活动都立即而直接的也就是身体的外现活动。”^[11]“词”是身体与意志的外现的一个本体，也就是表象，词汇是意义的附着物，他有着义位的变化乃至义位的增减，也会通过引申、虚化、类推、沾染等方式产生出新的词汇，以适配新的意义。但其无法揭示本体的意识，更不谈“先于身体和意识的意志”，词汇作为建筑材料，只是符号的外显状态，不能深入到意义的本身，正如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界限般，在没有所指的符号下我们也难以对能指产生注意和中断，词汇作为“身体的外现活动”成为了意识的表达方式，成为了语音的支撑，但其本质上仍旧是有着阻断性的。索绪尔指出：“语音形式对说话人的意识而言是一确定的声音形象，也就是说既是存在的又是限定的，仅此而已。它不一定有确切的‘意义’，但被感知为某种存在；此外，倘若改变它周边的词，它就可能不再存在，或者可能不再是一回事了。”^[12]同样地，在AI语言的世界里，由于外在的语音形式的断裂，导致其内在丧失了能指的建筑材料，而作为“意义”的一个向度，这也意味着在所有的内部空间内丢失了其本真的价值。“语言”不再指向巴门尼德的存在问题，而是成为了只有“所指”的符号。

同时，在语义维度，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之家”^[13]的命题遭遇技术解构。人类通过命名与言说建构存在意义的过程，正在被AI的语义网络重新编码。以机器翻译为例，谷歌神经机器翻译（GNMT）系统将“乡愁”译为“homesickness”，看似准确对应词典释义，但是与西方奥德修斯的“死之哀伤”不同，与中国古代的“逆旅”思维也不同。无论是“乡愁”还是“homesickness”，二者都丢失了在本土环境的土壤，使得其没有更有力的支撑，那便也就说不出核心更沉潜的语义了。

语用层面的权力重构更为隐蔽。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语言不仅是描述世界的工具，更是改变世界的实践。^[14]其实AI客服代替人类处理投诉、算法推荐主导公共话题时，本质上就是话语的“以言行事”功能正在发生权力转移。社交媒体平台通过趋势算法制造“热搜话题”，表面上是反映公众关注，实则是用点击率、停留时长等指标重构舆论场域。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推特算法对特定政治标签的加权推送，直接影响了数千万用户的认知框架。技术中介的话语实践，令福柯所言的“话语即权力”获得新形态，也就是说，权力不再仅存于制度与机构，更隐匿于算法的排序逻辑与语义关联中。用户以为自己自由表达观点，实则是在算法划定的语义网格中有限位移。

言语与言语之间的交流在AI空间内部似乎是不可能的存在。在宏观层面，作为人的本体的“语言”被压制，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指出，翻译是两种语言相互照亮的过程，译者的主体性体现为对“纯语言”的追寻^[15]。而AI翻译系统通过神经网络的“黑箱”操作，将这种追寻简化为概率匹配。当旅行者依赖翻译耳机与当地人对对话时，技术提供的即时转换看似消弭语言障碍，实则构建了第三重话语空间——既非源语言也非目标语的“算法中间态”。在此空间中，文化特有的隐喻、俗语与历史典故被技术过滤，交流沦为信息交换的工具理性实践。语言作为存在家园的诗意维度，在技术的中介下逐渐荒芜。在微观层面，话语主体性的消解最终指向人类存在方式的异化。智能语音助手如Siri、小爱同学，通过预设应答框架将对话简化为指令-反馈模式，人类的话语言说被规训为技术系统的可操作输入。当父母用智能音箱为孩子朗读童话时，故事的选择与讲述节奏均由算法控制，亲子对话的交互性让位于技术效率。这种变化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是话语实践从主体间性向人机不对称关系的彻底转向。当一代人在与机器的“伪对话”中成长，其主体性建构将不可避免地技术逻辑渗透。

《大森林奥义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第十二梵书

一些人说：“食物是梵。”不是这样，因为缺了生命，食物就会腐烂。一些人说：“生命就是梵。”不是这样，因为缺了食物，生命就会枯竭。只有这两位神灵合二为一，才达到最高状态。……他这样说：“这是 vi。确实，食物是 vi，因为一切众生进入(vistāni)食物中。这是 ram。确实，生命是 ram，因为一切众生乐(ramante)在生命中。任何人知道这样，一切众生就会进入他，乐在他之中。”^[16]

值得注意的是“viram”是个合成动词，意为“住口”的意思，而词根又由代表食物的“vi”与代表生命的“ram”构成，这里不仅是隐喻着食物是生命的必然，还意味着在进食时人的生命是“住口”状态，人类是没有办法说话的，进食的咀嚼是不能算成是语音。换句话说，在贤者看来，只有在表达“生命”本身以及“生命”的延伸时，语音才能从声音的属性中脱离，并且指向的是“梵”这样的宇宙本体。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17]，其中的“不言”“不议”“不说”指向“大美”“明法”“成理”，尽管将“食物”(vistāni)与之相类比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界限，但是对于语音来说，其都保持了“不发出声音”的行为，即“沉默”。《圣经》里上帝创世时采取的是言语创世的手段，“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18]。在此之后的上帝除了神迹外都保持着沉默。沉默是语言意义的消弭，同时又指向语言的终极意义。语言的终极意义便是揭示海德格尔的“此在”状态。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对于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19]，在沉默之时，意义已然产生了，产生了“viram”与梵、天地的大美、上帝的在场，这些都指向了人的存在本身。语音就在“沉默”的范畴内和意义产生了直接脱离，至少在语言的自身表述中，意义可以不通过语音来表达，存在直接就是意义。而 AI 指向的，正是这样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导致了作为存在本身的人的一次终结，但也在沉默之中表达出更加静穆的力量。

四、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性知识的矛盾：无法让渡的主体性

在全球知识体系的扩张与技术理性的霸权下，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性知识的矛盾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主体性存续的认知战争。这场战争并非单纯的信息对抗，而是根植于生活世界的实践理性与技术殖民的逻辑暴力之间的本体论冲突。

艾约博认为，如果以主体性视角延伸出发，地方性知识的生产与传承始终是一种具身化的实践。^[20]盛晓明在《地方性知识的构造》中提出地方性知识不依赖于抽象的概念体系，而是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社群的经验共享以及文化仪式的重复演练得以维系。^[21]换句话说，知识的有效性建立在其对生活世界的直接回应上，如农耕时序与自然节律的精确对应，或医疗实践与生态系统的整体关联。在此过程中，知识创造者并非孤立的主体，而是与自然环境、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交织主体”。这种主体性无法被剥离其生存语境，正如梅洛-庞蒂所言“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22]，知识的真理性始终受阻于身体经验的不可还原性。

话语权力的运作机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认知暴力。福柯揭示的知识-权力共生关系实际上正是全球性知识的一种再度膨胀。全球性知识通过科学主义的霸权话语，将自身建构为“客观真理”的代言人，而地方性知识则被贬斥为“前现代遗存”或“非理性要素”^[23]。无疑，作为权力的全球性知识不仅否定了地方性知识的认识论价值，更会通过技术装置（如大数据模型、算法系统）将其纳入可操控的治理框架。

而在一百年后的 21 世纪，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回望，生活世界的概念依旧在冲突中具有关键的理论价值。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作为前科学、前反思的经验基底，^[24]为所有认知活动提供意义背景。地方性知识正是这种基底的具体显现，换句话说它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更是维系文化认同、伦理价值与存在意义的网络。格尔茨的“深描”方法论则认为地方性知识的真理性不在于其是否符合普遍逻辑，而在于其能否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编织出连贯的意义之网。^[25]当全球性知识以普适性自居时，实则是用技术理性的“浅描”取代了意义网络的深层结构。取代不仅造成知识的扁平化，更导致生活世界的“去魅”，使得原本充满灵性与交互性的经验领域，被简化为可测量、可操控的技术对象。

地方性知识的抵抗本质上是主体性的自我捍卫，是一种主体性既不固守传统的封闭性，也不拒绝技术的介入，而是坚持知识生产的情境性与具身性。它要求承认认知的多元本体论地位，尤其是不同的知识体系对应不同的存在方式，而非层级化而带有偏见的污名化的“真理”等级。也正是认识论立场的转向，呼应了后殖民理论家查克拉巴提所说：“将‘地方的’从‘不够普遍的’这一污名中解放出来，承认其作为独立认知范式

的合法性。”^[26]唯有如此，技术时代的知识生态才能避免沦为单一化的荒漠，真正实现认知多样性的共生。

当前的知识论争因而超越了简单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直指人类存在方式的根本选择：我们是否允许技术理性彻底重构认知的根基，还是为具身化、情境化的知识实践保留存续空间？这一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技术时代主体性的最终命运，到底是成为算法逻辑的附庸，还是在生活世界的土壤中持续生长。

结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赋能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将“主体”这一人文核心推向了新的反思交叉点。无论是在论文检测中被动接受机器裁定，还是在日常语言交互里依赖大模型生成，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正从传统的工具依附逐渐演化为共构与嵌合。然而，这种共构并非完全对等：算法依托海量数据与训练规则建立的“自我经验”，往往在判断或生成过程中形成封闭的逻辑自洽，使人面临“沉默”与“自证”的两难局面。自然人的主体性在认知坐标系中遭遇重构，社会人的语言实践则被算法话语形塑或替代，一旦过度依赖，个体和群体对意义与事实的把握便被技术设定的流程所左右。生成式 AI 若以单一化标准覆盖各种复杂场域，势必引发对本土经验的忽视与文化多样性的萎缩。如何平衡全球性知识的便利与地方性知识的深度，需要从制度设计与社会文化实践中寻找更具弹性的配合，让技术在多元知识生态里为人所用，而非被动异化人的主体地位。

参考文献：

- [1] 南方周末. 如何证明我不是 AI? 毕业论文的检测疑云 [EB/OL].(2025-5-7)[2025-5-8].<https://mp.weixin.qq.com/s/NbpETK189u997H3IIRqkIQ>
- [2] 中国青年报. 朱自清荷塘月色被检出高 AI 率? 有大学生为论文喊冤 [EB/OL].(2025-5-9)[2025-5-9].<https://mp.weixin.qq.com/s/eWaFh0V21J3PkF3zyzrLYQ>
- [3] 陈鼓应. 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9.
-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廖申白译. 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2.
- [5] [德]阿多诺. 张明译. 主体与客体[M],载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 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10.
- [6] [瑞士]皮亚杰. 王宪钿译. 发生认识论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
- [7] [英]马克斯·布瓦索. 王寅通译. 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框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23-24.
- [8] 万里鹏. 信息生命周期从本体论出发的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03.
- [9] [美]J·H·弗拉维尔. 邓赐平译. 认知发展(第四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5-96.
- [10] [奥]维特根斯坦. 贺绍甲译. 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3.
- [11] [德]叔本华. 石冲白译. 杨一之校.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51.
- [12] [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 [法]西蒙·布凯. [瑞]鲁道尔夫·恩格勒整理. 于秀英译. 普通语言学手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1.
- [13] [德]海德格尔. 孙周兴译. 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76.
- [14] 杨玉成. 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04.
- [15] [德]本雅明. 译者的任务[M],载于[法]保罗·利科. 保罗·利科论翻译[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69.
- [16] 黄宝生译. 奥义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00.
- [17] 陈鼓应译注. 庄子今注今译(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650.
- [18]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国基督教协会. 圣经·中英对照[M].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1.
- [19] [奥]维特根斯坦. 贺绍甲译. 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4.
- [20] [德]艾约博. 韩魏译. 吴秀杰译. 以竹为业——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 20 世纪社会史[M]. 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2016:16-21.

[21] 盛晓明. 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哲学研究.2000.(12):36-44+76-77.

[22] [法]梅洛-庞蒂. 姜志辉译. 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16.

[23] [法]福柯. 莫伟民译. 词与物人文知识考古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477.

[24] 倪梁康.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基于《生活世界》手稿的思考[J].哲学动态.2019(12):58-66.

[25] 王丽娜. 格尔茨“深描”的内涵研究[J].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2):38-42.

[26] [印]查克拉巴提. 后殖民与历史的诡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81.

Reflections on the AIGC Detection Standards in Higher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Qian Liangfan¹ Liu Lixiang²

¹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²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Abstract:The rapid prolifer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led to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AI rate dete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assess the originality of academic papers. This detection mechanism essentially relies on the machine model's inference of text generation probabilities, which marginalizes or even suspends the author's self-expression and subjective judgment. The subject's right to speak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technological logic, and human cognitive patterns and language practices face the risk of alienation due to the intervention of algorithms. Meanwhile, the opposition between global knowledge and local knowledg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nounced: The technical rationality promoted by algorithms erodes and suppresses the subjectivity of local knowledge, while local knowledge, with its unique embodied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context, continuously resists and reconstructs the meaning of the subject. This shift in subjectivity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realms of cognition and discourse practice but also in the phenomenon of the deep involvement of technical systems in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and language structu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he subject reshapes the expression of existential mea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poses a new challenge to cultural diversity and subjectivity. Understanding and defending the subjectivity that cannot be fully assimilated by technological logic is key to maintaining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richness of the life-world.

Keywords: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rate detection; Subject displacement; Right to speak; Knowledge contradic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10

刍议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潘沿¹

(¹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 19 世纪末中国在外来压力和内部动荡背景下, 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理论构建以及相应的教育实践, 探讨其文化守成与近代化诉求之间的内在张力。张之洞通过《劝学篇》构建的“中体西用”框架, 以维护儒家伦理为核心目标, 将西学拆解为“西艺”“西政”“西史”三个层面, 试图在有限吸收西方技术、制度与知识体系的同时, 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这一思想在湖北自强学堂、存古学堂及《癸卯学制》等教育实践中, 表现为“中西拼盘”模式。张之洞的渐进式教育改革虽未能挽救封建制度, 却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提供了历史经验: 其一, 文化自信需以主体性建构为前提, 通过“守约”策略提炼传统精髓; 其二,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协同逻辑超越“体用二元”, 启示当代教育应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共生; 其三, 教育改革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缓冲带, 通过局部试验、师资转型与评价多元化实现动态平衡。

关键词: 张之洞;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教育思想; 现代启示

一、引言

在 19 世纪末的中国,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动荡, 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愈发突出。鸦片战争的惨败揭露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 西方列强的侵略使得中华文化及传统思想受到了严峻考验。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一种探索自我救赎与复兴的思想应运而生, 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及政治家的重要思潮。这一思想的核心在于, 既要守护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又要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现代管理理念。张之洞认为, 中国的复兴并非要完全抛弃传统, 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他的这一观点, 不仅对当时的洋务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也为后来的文化复兴与现代化进程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解析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实质,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的文化战略与发展方向。

二、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后, 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渗透彻底瓦解了传统中国的“天朝”秩序。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政府的军事与技术落后, 而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则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社会根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标, 试图通过引进西方军事工业与民用技术实现国家振兴。^[1]然而, 甲午战争(1894-1895)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器物革新”的失败, 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维新派与革命思潮随之兴起, 主张从政治制度层面效仿西方此时的张之洞进入宦海不久, 在目睹国破民艰的情形下, 深感我国已陷入“尽撤藩篱, 喧宾夺主, 西洋各国援例均沾。外洋之工作巧于华人, 外洋之商本厚于华人, 生计夺尽, 民何以生”^[2]的困境。

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传统儒家文化与西方现代价值形成尖锐对立。顽固派坚守“夷夏之防”，视西学为“奇技淫巧”；维新派则主张以君主立宪取代封建专制。张之洞敏锐意识到，单纯排斥西学将导致亡国灭种，而全盘否定中学则会丧失文化主体性。^[3]他在《劝学篇》中批判“守旧者不知通”与“开新者不知本”，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试图通过划分“治身心”与“应世事”的界限，为西学传播提供合法性，同时巩固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这种思想调和既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对西方挑战的被动回应，也揭示了封建统治集团在现代化压力下的自救逻辑。

传统科举制度与书院教育在晚清已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洋务派虽创办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但“中体”与“西用”的割裂导致人才培养效率低下。甲午战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刺激了中国知识界，张之洞意识到教育改革需兼顾中西：一方面简化经学教育以“守约”，另一方面引入西方分科体系与师范教育。1903年由其主导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首次将“经学科”独立设置，同时纳入西学课程，标志着“中体西用”从理论向制度化实践的跨越。这一变革虽未突破封建纲常，却为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不是简单的文化折中，而是在新旧冲突中构造的“文化防御体系”，其核心是通过“体用”划分维护封建伦理的绝对权威，同时有限度地引入西学以应对危机。这一思想在《劝学篇》中被系统表述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矛盾性。

（一）“中学”的核心：儒家伦理与经世传统

“中学”也称旧学、内学。张之洞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治、地图为旧学”。^[4]“四书”、“五经”是“中学”的核心。“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人因时，言非一端，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5]“中学”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张之洞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他将纲常伦理视为维系社会稳定的“治心之术”，认为若无此根基，“虽举泰西之文明而悉输入之，适足以为大乱之阶”。例如，湖北自强学堂课程虽引入西学，但仍规定学生必须每日诵读《孝经》《礼记》，以强化伦理教化。

经世致用是儒学的工具化转向。张之洞对传统经学进行实用性改造。《周易》所言“显诸仁，藏诸用”的化育理想，在张之洞手中异化为“守约”原则：他要求士人“学贵通今致用”，将《大学》的修身齐家降格为技术官僚的培养手册。这种矛盾在湖北农务学堂的实践中尤为显著：虽开辟试验田种植美棉，却禁止使用化学肥料，因其“破坏土地伦理”，暴露了“中体”对“西用”的根本性制约。张之洞主持编纂《书目答问》，剔除“空谈心性”的理学内容，强调“通经须明大义，归于致用”。在《奏定学堂章程》中，要求简化经学教学，将《春秋》重点放在“经世大义”而非考据训诂，甚至提出“删减《周礼》繁文，但讲田赋、军制、官职诸实用篇目”。这一转向使儒学从道德哲学转变为服务洋务的“实用指南”。

张之洞对文化主体性的焦虑。面对西学冲击，张之洞担忧“儒术将亡”，因此在教育改革中始终强调“存古”。他创办存古学堂，专授经史词章，并规定新式学堂须悬挂孔子像，试图通过仪式巩固文化认同。但这种努力本质是被动的文化守成，如梁启超批判：“以旧瓶装新酒，终致瓶裂酒洒。”

（二）“西学”的范畴：技术、制度与知识体系

张之洞对“西学”的接纳始终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前提，呈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他将西学拆解为“西艺”“西政”“西史”三个层次，但仅在前两者中划定有限的可接受范围。“西艺”指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涵盖算学、化学、矿冶、机械制造等领域。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汉阳铁厂、织布局、枪炮厂等洋务企业，皆以“西艺”为根基。他派遣工匠赴德国学习火炮铸造技术，甚至在湖北工艺学堂开设化学实验

课,要求学生“亲手操作蒸汽机模型,通晓其理”。这些举措看似开放,实则暗含严格限制——技术引进必须服务于“保国保教”的目标。例如,汉阳铁厂虽采用英国设备,但管理层全由科举出身的士绅把控,西方工程师的建议常因“不合中国礼法”遭拒,最终导致钢铁质量低劣,难以与进口产品竞争。

“西政”的引入则更为审慎,主要指法律、教育等非政治性制度。张之洞仿照德国学制设计《癸卯学制》,将学堂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并引入地理、博物、体操等新学科。^[6]但他明确规定:“学堂管理人员须由科举正途出身者充任”,且课程中“修身”“读经讲经”课时占比高达30%。这种制度嫁接的割裂性,在湖北师范学堂的实践中尤为明显:学生一面学习日本教育学理论,一面被要求每日向孔子牌位行叩拜礼;物理课上讲授牛顿力学,却严禁讨论“日心说”对“天圆地方”传统宇宙观的冲击。^[7]

在知识传播层面,张之洞主导了一场选择性“西学东渐”运动。他支持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大量译介西方科技著作,仅1896年便出版《化学鉴原》《开矿要法》等实用书籍120余种,但严令禁止涉及民主思想的作品流通。传教士林乐知编译的《文学兴国策》因提及“议会选举”,被张之洞批注“此等邪说惑众,当悉数销毁”;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手稿曾送至武昌,他阅后斥之为“物竞天择乃禽兽之道,岂可施于人间伦理”。这种对西学的“去价值化”处理,导致知识体系呈现畸形状态:士子们熟稔蒸汽机原理,却不知“科学精神”为何物;律师学习《万国公法》,却仍视“民告官”为忤逆。

(三) 体用关系的辩证性

张之洞提出“可变者器,不可变者道”,试图为变革划定边界。但实践中,“器”与“道”的界限日益模糊。例如,汉阳铁厂采用西方股份制管理(器),却因官僚干预(道)导致效率低下;新式学堂引入分科教学(器),但经学课程挤压科学课时(道)。这种割裂暴露了体用二元论的脆弱性。

中体西用打破“华夷之辨”,为西学传播提供合法性。据统计,1895-1905年间,湖北新式学堂翻译西书达1200余种,推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但是其压制制度变革。1903年《学务纲要》规定:“学生不得妄干国政,抗改学堂规条”,甚至禁止学生阅读报纸,最终激化革命思潮。

体用关系本质是“文化嫁接”的幻想。严复曾尖锐指出:“牛体安能马用?”张之洞试图以西学之“用”延续中学之“体”,却未意识到技术、制度与伦理的不可分割性。这种矛盾在1905年科举废除后彻底爆发,传统士绅阶层瓦解,中体西用理论随之破产。

四、教育实践:从理论到制度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并非纸上谈兵,而是通过系统的教育实践转化为制度性存在。从新式学堂创办到学制革新,从留学派遣到知识译介,其教育改革既体现了对传统教育体系的突破,也暴露了“体用割裂”的深层矛盾。^[8]

(一) 新式学堂的创办与课程改革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内创办的数十所新式学堂,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试验场。1893年创建的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是其教育实践的典型代表。该学堂分设方言(外语)、算学、格致(物理化学)、商务四科,课程中引入《化学鉴原》《汽机发轫》等西方教材,并配备实验仪器供学生操作。但课程设置中,“中学”始终占据核心地位:每日清晨需诵读《圣谕广训》,每周安排六课时经学课程,学生作文必须以“尊孔忠君”为主题。这种“中西拼盘”模式,在1896年设立的湖北武备学堂中更为明显——德国教官教授测绘、战术,而学堂监督必须由翰林出身者担任,课堂外严禁讨论“平等”“民权”等词。

更具突破性的是对传统教学法的革新。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批判旧式书院“空谈性命,不务实事”,要求新式学堂推行“实验—实践”教学。湖北农务学堂开辟试验田,学生在德国教习指导下种植美棉、甜菜;工艺学堂设立金工车间,制作蒸汽机模型。但这种实践性教育仍受限于“中体”框架:农务学堂禁止

使用化学肥料，因其“破坏土地伦理”；工艺学堂的机械图纸需加盖“忠孝为本”印鉴方可存档。

（二）学制革新与癸卯学制的确立

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标志着“中体西用”思想的制度化。该学制将全国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看似仿照日本学制，实则内在逻辑截然不同。第一，经学独尊。中小学堂每周12课时中，“读经讲经”占5课时，《孝经》《礼记》为必修；大学堂专设“经学科”，与政法、文学、医科并列。第二，等级强化。学生按出身划分等级，官宦子弟入“官学堂”，平民子弟入“民学堂”，且规定“民学堂毕业生不得应科举”，刻意维持阶级壁垒。第三，管控机制。学堂设“监学”职位，由候补道台担任，负责审查师生言论；《各学堂管理通则》规定“学生不得妄干国政，私改讲义”。尽管课程西化达到了一定程度，但每月月考仍以经学为考核重点，理化实验成绩仅作“参考”。这种制度性矛盾导致毕业生陷入双重困境：既无法通过科学知识谋生，又丧失传统士绅的科举晋升通道。

（三）留学教育与翻译运动

为弥补本土西学教育不足，张之洞推动的留学与翻译构成“西学东渐”的双轨。留学教育方面，1896年首批湖北留学生30人赴日，主要进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机械。张之洞制定《约束游学学生章程》，规定“留日学生每月需向驻日领事提交思想汇报”“禁止参加政治集会”，甚至要求剪辫者“立即遣返回国”。这种管控在1902年酿成“成城学校事件”：湖北留学生因抗议校方歧视被集体开除，张之洞竟指责学生“不守本分”，转而改派留学生赴德国学习“更纯粹的技艺”。

翻译运动则呈现畸形繁荣。湖北官书局与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合作，至1905年共译西书1800余种，但内容高度过滤：科技类占72%（如《冶金录》《化学分原》），政法类仅限《国际法纲要》《普鲁士教育章程》等非敏感内容，哲学、社会学著作悉数被禁。这种选择性译介导致知识结构残缺：湖北新军军官熟读克虏伯炮术手册，却不知《战争论》中的战略思想；方言学堂学生精通英文语法，但对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性解放”主题避而不谈。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张之洞要求所有译作必须添加“按语”，如《天工开物》译本中被插入“奇技淫巧虽佳，终不若忠孝为大”的训诫。

这些实践在推动教育近代化的同时，也埋下自我否定的种子。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接触西学后，反而成为反清革命的主力（如黄兴毕业于两湖书院）；《癸卯学制》规定的经学课程，因内容枯燥遭学生抵制，1907年湖北学堂经学逃课率达63%；留日学生归国后传播立宪思想，最终动摇了“中体”根基。这种矛盾印证了严复的预言：“中学既衰，西学难附，体用两概终将崩解。”张之洞试图通过教育嫁接维系封建伦理，却无意间为旧制度的掘墓人提供了思想武器。

五、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虽以维护封建伦理为底色，但其对文化主体性与教育改革的探索仍为当代教育提供了深刻的镜鉴。这一思想诞生于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既是对民族存亡危机的被动回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首次系统反思中西文明关系的主动尝试。张之洞通过《劝学篇》构建的“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框架，虽以巩固三纲五常为核心目标，却在实践中打破传统教育封闭性，推动近代科学教育体制的萌芽。

（一）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平衡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本质上是对文化主体性与开放性关系的深刻探索。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坚守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学为体），实现对外来文明的理性选择与创造性转化（西学为用）。张之

洞强调“中学治身心”，将三纲五常视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他创办存古学堂、规定新式学堂悬挂孔子像等实践，并非单纯复古，而是试图在文化危机中重塑认同。这种努力揭示了文化自信的底层逻辑——只有立足本土传统，才能避免“全盘西化”导致的文化失根。例如，湖北自强学堂虽引入西学课程，但每日诵读《孝经》《礼记》，通过仪式强化伦理认同。然而，张之洞并非僵化守旧。他对儒学的实用化改造（如编纂《书目答问》简化经典），体现了“守约”智慧——即提炼传统精髓以适应现代需求。这种“损之又损”的路径，与当代“创造性转化”理念不谋而合，如北京大学将“四书精读”纳入通识教育，既传承经典又赋予其现代诠释。

张之洞对西学的引入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他将西学拆解为“西艺”（技术）、“西政”（制度）、“西史”（知识体系），但严格限定引入范围：支持翻译《化学鉴原》《万国公法》，却严禁传播民主思想；派遣留学生学习机械制造，却要求“剪辮者遣返”。^[4]这种选择性吸收的策略，既体现了对西方文明的警惕，也折射出在器物层面开放、在价值层面保守的矛盾。所以对于现在来说开放需以主体性为前提。日本“和魂洋才”的经验表明，文化融合需明确“为我所用”的边界。例如，中国在STEM教育中融入“天人合一”生态观，或在法学课程中探讨“礼法合治”的现代转化，正是对张之洞“择善而从”逻辑的超越。

张之洞的困境在于“体用割裂”。他将西方制度归为“可变之器”，却未意识到技术革新必然冲击伦理根基（如汉阳铁厂股份制管理与传统官僚体系的冲突）。这警示我们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平衡需动态调适。华为“天才少年计划”既引入西方研发体系，又强调“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实现了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协同。并且张之洞的局限在于单向吸收，而当代更强调文明的互鉴。敦煌艺术“圣俗交融”的造境艺术，展现了中华文明吸收佛教、希腊等异质文化并重构主体性的智慧。这种“以我为主”的包容性，启示中国教育需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既输出汉语与国学，也吸纳沿线国家的哲学与艺术，构建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

（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虽未明确提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现代概念，但其教育实践已蕴含二者协同的雏形。张之洞的“通经致用”思想强调儒学需服务于现实需求，如湖北农务学堂将《礼记·月令》中的农时理论与西方农业技术结合，开辟试验田种植美棉。这种“通识为体、专业为用”的逻辑，与当代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通专融合”模式不谋而合——学生先接受人文社科、自然科学通识课程，再自由选择智能工程、政治经济哲学（PPE）等交叉专业。通识教育通过跨学科知识整合（如“逻辑与理性”“文明与历史”课程模块），为专业学习提供方法论支撑；而专业教育则通过项目制学习（如华为“天才少年计划”中的技术研发与《考工记》匠作哲学结合）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张之洞虽未突破传统学科壁垒，但其对西学的分层引入（西艺、西政、西史）已隐含学科交叉意识。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因体用割裂而陷入困境，而现代教育通过通识与专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了三重超越。第一，知识结构。从“中西拼盘”转向“文化基因解码+学科范式重构”的有机整合。第二，能力培养。从单一技能训练扩展为“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全球视野”的复合目标。第三，价值导向。从维护封建伦理升华为“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共生”的现代人格塑造。这种结合不仅是教育模式的革新，更是中华文明在全球化语境下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关键路径。

（三）教育改革的渐进性

张之洞的教育改革策略以“渐变”为核心，既未全盘否定传统教育体系，又未激进移植西方模式，而是在新旧交织中寻求平衡，体现了“中体西用”思想对制度转型的深刻调适。这种渐进性不仅缓解了新旧冲突，也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其经验对当代教育改革仍具启示意义。

张之洞在改革中始终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兼容性。例如，湖北自强学堂虽引入算学、格致等西学课程，但仍规定学生每日诵读《孝经》《礼记》，并将经学课时占比维持在30%以上。这种“中西拼盘”模式既保留了儒家伦理的教化功能，又通过西学课程培养实用技能，避免了文化断裂。张之洞在《劝

学篇》中提出“政艺兼学”，但明确“经学治身心”的优先性，将新学视为补充而非替代。这种双轨制既回应了“保教”的文化焦虑，又满足了“自强”的现实需求。张之洞主导的《癸卯学制》（1904年）是中国近代首个系统学制，其设计充分体现渐进特征。第一，经学科独立设置。在初等、中等学堂保留读经讲经课程，大学堂专设经学科，与西方学科并列，既维护儒学正统地位，又为经学向现代学科转型预留空间。第二，科举与学堂的衔接。规定学堂毕业生可获举人、进士出身，缓解旧式士人对新学的抵触。张之洞称此举“使新旧两途相资为用，不使偏废”，实则为科举废除铺平道路。第三，层级递进的课程体系。小学堂以识字明理为主，中学堂引入西政基础，大学堂侧重专业分科，形成由浅入深的渐进路径。

张之洞意识到，教育转型的关键在于师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旧学师资改造，选拔科举出身的儒生进入师范学堂接受西学培训，要求“通经史者兼习格致，明算学者旁涉舆图”，促使传统士人向现代教师转型；其次是新式师资引进，延聘日本教习教授西政、西艺，但规定外籍教师须受中国监督，确保教学内容不偏离“中体”框架；最后是本土化教材编纂：主持编订《书目答问》《群经要义》等教材，将传统经学简化为通识课程，既降低学习难度，又避免西学过度冲击。并且张之洞的改革是先进行局部试验，成熟后再逐步推广。

张之洞的实践揭示，教育改革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缓冲带。首先可以建立起对文化连续性的维护，如当前九年义务教育改革强调“经典诵读”与“创新素养”并重，既传承文化基因，又培养现代能力。其次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借鉴张之洞“守约”理念，可将标准化考试与综合素质评价结合，避免“唯分数论”对教育生态的破坏。最后建立缓冲带可以对区域试点进行风险控制：上海“双新”实践通过局部试验验证课程改革可行性，再逐步推广，与张之洞的“湖北模式”异曲同工。张之洞的渐进性策略虽因时代局限未能彻底解决体用矛盾，但其“在保守中求变，在变革中守本”的智慧，为当代教育转型提供了历史镜鉴。正如他在《劝学篇》所言：“变器不变道，变事不变法”，这一思想提醒我们：教育改革既需突破陈规，亦需守护文明根脉，方能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海鹏,雷颐.冲破闭关锁国困境开眼看世界的中国[J].云南教育(视界时政版),2013,(04):32-35.
- [2] 赵德馨.张之洞全集:第三册[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
- [3] 王玉彬.张之洞与儒学的近代转型——以《劝学篇》为中心[J].孔子研究,2024,(06):100-108+159.
- [4] 张之洞.劝学篇[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46.
- [5] 《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全集卷 202, 19-21.
- [6] 王荷池.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D].东南大学,2018.
- [7] 赵婧怡.张之洞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16.
- [8] 张传燧,袁浪华.张之洞近代学科知识体系构建思想及其影响[J].大学教育科学,2018,(04):91-97+127.

A Concise Analysis of Zhang Zhidong'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Essence,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Use "

Yan Pan¹

¹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210000, Jiangsu*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xternal pressure and internal unrest, Zhang Zhidong proposed the theory of "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essence,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use " and the corresponding educational practice, exploring the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cultural conservatism and modernization demands. Through his "Encouragement of Learning", Zhang Zhidong constructed a framework of "Chinese essence and Western application", with the core goal of maintaining Confucian ethics, and decomposed Western learning into three levels: "Western arts", "Western politics", and "Western history". He attempted to absorb Western technology, systems, and knowledge systems to a limited extent while consolidating the feudal ruling order. This ideology was manifested in the "Chinese-Western patchwork" model in educational practices such as the Hubei Self-Strengthening School, the Ancient Learning School, and the "Gimao School System". Although Zhang Zhidong's gradual educational reform failed to save the feudal system, it provided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first, cultural confidence needs to be premi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 should be refined through the "holding to the essentials" strategy; second, the collaborative logic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ranscends the "essence and application dualism", inspiring contemporary education to achieve the symbiosis of humanistic spirit and scientific rationality; third, educational reform needs to establish a buffer zon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chieving dynamic balance through local experiments, teacher transformation, and diversified evaluation.

Keywords: Zhang Zhidong;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Essence,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Use; Educational Thought; Modern Revel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23

人教新版初中数学实践教学研究——田径场地设计

朱誉¹ 程从华²

(¹肇庆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²肇庆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 本文以 2024 人教版初中数学七年级上册“设计学校田径运动会比赛场地”为例, 探讨跨学科项目式教学在初中数学课堂中的应用。研究发现, 项目式教学能激发学生兴趣, 提升几何知识应用能力; 课前设问和选择性作业有助于缩小认知差距, 提高课堂参与度。针对教学中存在学情认知不足、课堂纪律管理不善等问题, 作者建议通过加强实践训练和动态调整教学策略来改进; 最后论文讨论了运用情境创设、认知图谱关联和脚手架动态调节等教学策略, 为初中数学综合与实践课程的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 综合与实践; 跨学科教学; 核心素养; 项目式教学

一、引言

根据《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 初中数学课程需注重跨学科整合与实践应用, 要求每门课程安排不低于 10% 的课时用于跨学科主题学习, 以提升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 数学综合与实践课程应运而生, 旨在通过真实情境任务, 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本研究以 2024 年人教版初中数学七年级上册“综合与实践”章节中的“设计学校田径运动会比赛场地”为主题, 在广东省肇庆市某中学展开教学实践。班级人数 52 人, 整体水平偏后, 且因新教材教学资源匮乏, 新手教师面临较大挑战。研究通过项目式跨学科活动学习, 探索学生如何结合数学、体育、工程等学科知识, 运用几何、测量及数据分析能力完成场地设计任务, 从而深化数学理解, 提升核心素养。研究旨在总结教学经验, 优化设计, 为后续实践提供参考。

二、教材分析

本节课作为人教版七年级数学的收官章节, 承载着双重目标: 一是通过真实情境促进数学核心素养的整合性发展; 二是以项目式学习为载体, 帮助学生获得实践经验, 培养学生跨学科应用能力与实践创新意识。课程设计紧扣《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学科融合”的要求, 将运动场设计这一现实问题转化为数学驱动下的多学科探究任务。

从知识结构看, 课程以数学主线(图形拼接、方程计算)贯穿始终, 体育科学(赛道标准)、地理学科(场地选址光照分析)为辅助支撑, 理化知识(材料摩擦系数、排水坡度计算)则作为弹性拓展内容。例如, 设计田径运动场图纸环节, 学生需综合运用圆与直线的几何特性(数学)、符合国际田联标准的弯道半径(体育)、以及场地安全和排水需求(工程)三重要素, 这一过程呼应了杜威“经验连续性”理论——通过解决真实矛盾, 推动认知从抽象符号向实践智慧转化。^[1]

基金项目: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2024A1515010983); 广东省特色创新普通高校(No.2022KTSCX150)

作者简介: ¹朱誉(1995—),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初中数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²程从华(1981—), 男,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应用统计;

通讯作者: 朱誉

三、学情分析

本课程实施面临三重学情特征:

其一,学习动机分层,班级存在显著认知分化,约20%学生基础薄弱,40%兴趣不足,但整体对数学活动保持热情。鉴于初中课程难度跃升易引发畏难心理,[2]需调整教学目标为“夯实基础-实践应用”的重视基础模式:降低知识难度系数,聚焦跑道长度计算等核心目标,侧重数学建模能力培养,学有余力者拓展学科融合内容。

其二,知识结构断层,学生虽具备尺规作图、平行线等基础知识,但对田径场设计规范(弯道半径、直道长度等)及绘图标准认知薄弱,此恰为本课教学重点。

其三,现实条件制约,学校200m田径场与国际标准400m场地的差异,导致“理论—实践”衔接需灵活处理。

基于此,提出三个适应性策略:

1. 选择性作业。设置设计图创作(小组申报制)与常规习题双轨作业,通过“最佳设计展评”等激励机制实现压力分流与参与度提升。

2. 课前设问。将比例尺应用、场地观测等预备知识转化为体育课实践任务,通过跨学科联动实现认知铺垫,减少授课压力,抚平认知差距。

3. 突出重难点。本节课重点为:了解田径运动场设计规则和标准尺寸;学会如何绘制设计图。难点为:学会计算田径跑道长度和田径运动场尺寸。

四、教学流程

教学流程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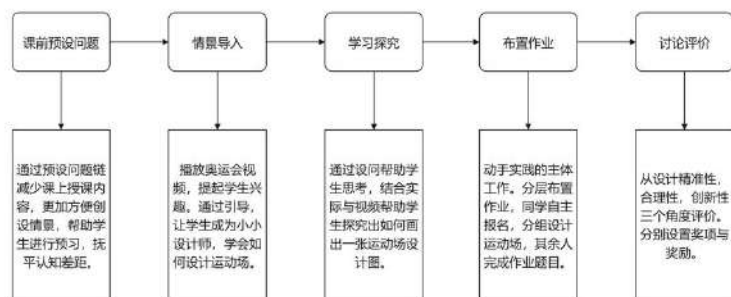


图1 教学流程图

(一) 课前预设问题

针对学习动力不足及知识基础薄弱的学生群体,通过预设结构化问题降低课堂理解障碍,并协同体育教师专业指导,设计开放性实践任务。学生在体育课中通过实地观察、工具测量及跨学科协作探究完成目标,旨在促进数学知识与运动科学的整合,同时强化学生协作能力与问题解决意识。问题与预设回答如下:

问题1: 田径运动场的几何结构由哪些规则图形组成?

预设回答: 田径运动场由两个半圆和一个长方形组成。

问题2: 标准跑道的400米长度具体指哪一部分的距离? 本校跑道的长度是多少?

预设回答: 400米指跑道内沿的周长; 本校跑道长度为200米。

问题3: 一百米跑道的实际长度是否为100米? 如果不是,具体长度是多少?

预设回答: 一百米跑道的实际长度并非100米,其具体长度为121米。

问题4: 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准备哪些工具? 可以采用哪些测量方法?

预设回答: 需准备卷尺、直尺等工具,可采用工具测量、目测、询问教师或步测等方法。

(二) 情景引入

以奥运田径赛事视频为情境导入,引导学生思考标准田径场设计要素,提出核心问题:“如何获取设计所需的关键信息及方法?”预设学生需明确场地标准、几何结构及测量验证方法,并通过查阅资料、咨

询专业人员、实地测量等跨学科途径完成探究。该设计旨在强化数学建模与工程思维，培养学生信息整合与实践创新能力。

(三) 学习探究：

1. 田径运动场设计要求

通过视频数据归纳与协作探究，学生可抽象化分析场地几何特征，强化数据整合与跨学科建模能力，为后续实践设计奠定理论基础。基于国际田联（IAAF）标准，400米田径运动场需满足以下核心参数与功能：

(1) 结构布局：

跑道由两条南北向直道（各84.39米）与两个半径相等的半圆形弯道（内沿半径36.5米）组成，形成闭合椭圆形。

直道南北向设计以减少日光直射干扰。

(2) 几何参数：

弯道设8条跑道，单条宽度1.22米（含0.05米分道线）；直道数量可依场地调整。

外沿半径依据跑道数量动态调整，需综合弯道加宽原则与安全冗余设计。

(3) 周长计算：

内沿周长：

$$2\pi \times 36.5 + 2 \times 84.39 \approx 395.116 \text{ (m)}$$

第一分道周长（距内沿0.3米处测量）精确为400米。

(4) 功能区规范：

起跑区长度 ≥ 3 米，冲刺缓冲区 ≥ 17 米，终点线统一设置于直道末端。

中央区域兼容其他田径项目（如跳远、铅球），若设置足球场需符合国际足联标准（105米 \times 68米），并预留 ≥ 2 米无障碍区。

2. 田径运动场跑道长度计算

以400米标准跑道为例，其设计核心在于分道直道与弯道长度的精确计算。计算涉及到跑道的形状，跑道的直道与弯道的比例，跑道的分道宽度，跑道分道的个数。本节课是以400m的标准跑道为例，其中田径跑道中的半径极为重要，一般为36.5m，为了减少计算计算难度，取36m。已知跑道第一分道长度为400m，两个弯道的周长为

$$72 \times \pi = 226.08 \text{ (m)} (\pi \text{ 取 } 3.14)$$

所以第一分道中一条弯道的长度为113.04m，

一条直道长度为

$$(400 - 226.08) \div 2 = 86.96 \text{ (m)}$$

根据视频介绍，跑道的宽度为1.22m，取1.2m。

所以第二分道为

$$400 + 1.2 \times 2\pi = 407.536 \text{ (m)}$$

第二分道中直道长度不变，则弯道长度为

$$113.04 + 1.2\pi = 116.808 \text{ (m)}$$

以此类推，第n分道的弯道长度为

$$[113.04 + 1.2(n-1)\pi]m$$

3. 田径跑道中的线

结合视频演示与航拍图对比,设计问题链引导学生通过几何计算与实地观测,理解跑道设计的科学性,渗透数学建模与工程优化思维,强化跨学科整合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图2 学校航拍图

问题一:“400米与100米、200米比赛的起跑线设置有何差异?”

预设回答:分道起跑线需前移补偿弯道半径差异(如第2分道前移7.67米)。

追问:“第n分道起跑线前移量如何计算?”

预设回答:

$$\Delta L = 2\pi d(n-1)(d = 1.22m)$$

问题二:“百米跑道实际长度是否为100米?”

预设答案:依据国际田联标准,实际长度 ≥ 117 米(含17米缓冲区)。

问题三:“我校运动场与标准田径场存在哪些差异?”

预设答案:规模较小(跑道长度不足)、功能区混合(中央区域设置篮球场而非标准足球/田赛场地)。

4. 绘图训练

根据学情分析,学生对比例尺的用法还不熟悉,此处采用活动式教学法。学生先根据以往经验画出400m三跑道的田径运动场设计图,教师巡堂纠错,最后教师带领学生一起画出跑道样图,阐明巡堂时发现的问题,强调比例尺的用法。

5. 布置作业

本次课程根据学情分析采用选择性作业,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分组报名设计一张独特的运动场设计图,其余同学完成习题即可。

(1) 设计图作业要求如下:

场地尺寸要求:规划区域限定为150米 \times 200米,可兼容田径跑道(无需严格符合400米标准)及其他运动功能区(如球类、田赛场地)。依据场地实际尺寸与A4纸规格,合理选择比例尺(建议1:1000,即图上1cm=实际10m),确保图纸清晰可读;所有功能区需标注实际尺寸。

功能要求:支持学校运动会田径项目(100米、200米、400米直道/弯道跑,800米、1000米中长跑),需保证分道公平性(如起跑线前移补偿);兼顾日常体育活动需求(如篮球、足球、跳远等),参考学校现有场地布局,优化空间利用率。

实施方式:4人小组自由组队,明确分工;A4纸正面绘制完整设计图,需体现比例尺、尺寸标注及功能区划分;背面附小组信息:组名、成员、分工、场地设计说明(含创新点与实用性分析)。

(2) 习题作业如下:

开放题:总结本节课中弯道半径为36m的400m田径运动场跑道尺寸数据和特点。

计算题：试计算弯道半径为 26m 的 300m 田径运动场中的直道长度，弯道长度，第二分道长度和第 6 分道长度。（其中跑道宽度取 1.2m， π 取 3.14.）

6. 讨论评价

(1) 设计作业评价

根据设计作品的精准性，创新性和合理性分别进行评奖，设置奖状与奖励，从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予激励，以提升学生积极性。班级共有 52 人，其中有 5 组 23 人参加设计（有三组超员）。课上分别展示五组作品，让学生们共同评价，从中挑选出精准性最佳、创新性最强、合理性最优的三幅作品。

优秀案例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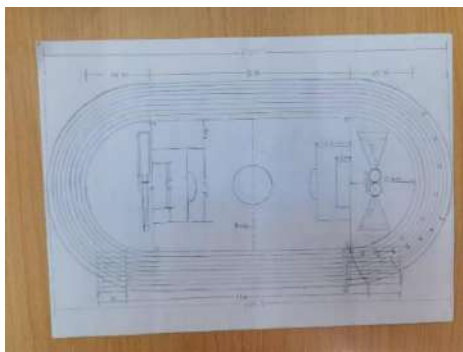


图 3 精准最佳作品



图 4 最佳创新作品

师生协作反思与问题归纳：

- ① 纸张尺寸和组员数量不符合标准。
- ② 关键功能区尺寸未明确标注，例如 400 米标准田径场中足球场起点位置、弯道半径基准点。
- ③ 添加非必要运动区域，导致总布局超出 150m × 200m 限制。
- ④ 跑道辅助线（如 200 米/400 米起跑线、冲刺缓冲区）遗漏，影响竞赛公平性设计。
- ⑤ 比例尺选取不合理和使用不当。
- ⑥ 存在安全设计疏漏，比田赛场地隔离不足，缺乏安全防护距离。

(2) 习题作业评价

由于主动参加小组作业的为学习主动性高成绩优异的学生，习题作业完成情况差强人意。习题作业共收上 25 份，4 人未交。第一题为开放题，没有标准的答案，其中 15 份作业表现优秀，课程内出现的数据和特点均有记录；第二题为计算题，9 人计算正确，7 人计算错误，8 人未作答。

五、实践反思

(一) 整体评价：新芽破土，未历寒暑

作为新教材的初次实践者，本次课程呈现出“破土新芽”的典型特征——虽显现生机却亟待成长。教师虽在课前通过学情调查了解学生基础，但在求证机制与数据解读层面存在明显疏漏，未能准确诊断学生技能掌握的真实水平，导致教学设计与学情适配度不足，具体表现为课堂参与热情与作业质量呈现显著落差。值得肯定的是，课程实施有效激发了学生对数学学科的情感认同，为后续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师生互动基础。

基于皮亚杰认知建构理论与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的双重视角，新教材的跨学科特性要求教师实现双重突破：既要突破学科知识的储备局限，更要创新教学支架的搭建方式。建议采用以下教学策略：首先依托项目式学习创设具象化情境，使抽象概念具现于可触可感的实践场域；其次通过“经验嫁接”技术，将学生已有认知图谱与新知进行系统性关联；最终实施“认知脚手架”动态调节，根据实时学情反馈调整教学梯度，使知识建构既符合“跳一跳摘桃子”的发展规律，又能通过元认知训练强化知识迁移能力。这种螺旋上升的教学设计，既能规避新手教师经验不足的短板，又可充分发挥新教材的跨学科整合优势。

(二) 作业评价：问题突出，亟待改进

通过研究中的作业数据可以看出，本次课程的作业质量不佳，设计作业中由于课上绘图知识讲解不到

位，导致设计作品有瑕疵；习题作业中基础运算环节存在集体薄弱点，其中不乏有逻辑错误；被动性学习者也较多，未交与未作答者占班级 23%，需要针对性干预。经实践检验，本次活动课程需要额外课时训练学生的绘图技巧和计算能力。

(三) 学情调查：知生未透，笃行不怠

本次实验的班级接手时间较短，只有两个月，对学生的绘图知识掌握情况了解不足，学生说他们小学的时候用过相关知识，但熟练程度和知识水平不足以绘画较为精准的平面设计图。这是新手教师在班级管理初期面临的学情把握不足的普遍困境。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指出，学生认知水平的差异是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之后的研究可以采用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框架，通过课堂观察、作业分析、问卷调查等方式，多维度收集学生学习风格、认知水平、兴趣爱好等信息，构建班级学情图谱。研究表明，持续的学情分析和教学反思能够有效提升新手教师的课堂掌控能力，实现从“知生未透”到“因材施教”的专业成长。

[3]

(四) 课堂把控：新研初试，稍显生疏

课程进行过程中多次发生需要组织课堂纪律的情况出现，导致绘图训练的时间被挤压。新手教师在活动课程中面临的课堂把控困境，本质上是舒尔曼所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尚未有效整合的表现。^[4]以本次研究为例，课程中涉及工程绘图的知识，由于学情把控和课堂把控不到位，导致课堂出现任务超时、学生参与度分层等问题。基于此，提出以下改进策略：1.制定规则，多次开展活动课程，制定活动课程秩序要求，严格执行保证课程效果。2.反思复盘，课后结合学生作品与课堂录像，针对性优化活动流程。

(五) 课前设问：以问导学，先疑后解

课前设问的实施效果显著，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还带动了知识结构薄弱学生的主动投入，使得作业在课堂纪律不佳的前提下，提交数量超出预期。课前设问的核心在于“用问题引路”，通过贴近生活的小任务，让学生提前接触课堂内容，既不增加负担，又能自然预习。这种方式还有两大优势：第一，缩小差距。通过共同参与生活化问题（如“估算运动会跑道长度”），让缺少实践经验的学生也能积累直观感受，减少课堂上的理解断层；第二，激发参与。学生在课前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产生疑问（如“为什么弯道起跑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带着困惑进入课堂，更容易专注讨论。实践表明，教师若能在课前设计“分步骤、有梯度”的问题链，课堂上便可减少基础概念的讲解时间，转而聚焦思维碰撞与深度探究，真正实现“轻负担、高效率”的教学目标。

(六) 多元化发展：多科融合，创新之源。

生活中的问题往往像一把钥匙，能同时打开多学科知识的大门。本次研究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内容，比如说跑道为什么要是塑胶的？哪种塑胶好？这涉及到化学知识和体育安全问题；一百米跑道为什么要有 17m 的缓冲区？为什么是 17m？这涉及到了物理知识与统计学的结合；为什么跑道最内圈都是挨着排水渠？排水渠都是倾斜的？这是涉及到了物理知识和工程规划。在真实情景活动的过程中，观察、思考、知识、方法缺一不可，这同样也是印证了基思·索耶的“创造性学习”理论：创新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通过跨领域知识的碰撞与重组实现的。^[5]

参考文献：

- [1] . . M . ,1990.
- [2] . “ ” [D]. .2022.
- [3] . [D]. .2022.
- [4] . [J]. , 2022, 43(5): 89-95
- [5] R· . [M]. : , 2010.

Research on Integrated and Practical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rack and Field Venue Design

Zhu Yu¹, Cheng Conghua²

¹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Guangdong, China

²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based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s, using the example of "Designing a School Track and Field Sports Competition Venue" from the 2024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edition of the seventh-grade mathematics textbook. The study finds that project-based teaching stimulates students' interest and enhances their ability to apply geometric knowledge. Pre-class questioning and selective assignments help narrow cognitive gaps and improve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Addressing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s' learning conditions and ineffective classroom discipline management, the authors propose improvements through enhanced practical training and dynamic adjustments to teaching strategies.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pedagogical approaches such as scenario creation, cognitive mapping for knowledge association, and dynamic scaffolding strategies, offering references for implementing integrated and practical mathematics curricula in junior high schools.

Keywords: Integration and Practice;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Core Competencies; Project-Based Teaching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24

从国家翻译能力框架看翻译教育跨文化能力培养

包佳鑫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 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 跨文化能力在翻译教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国家翻译能力的理论框架, 探讨了跨文化能力与国家意识及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之间的紧密联系, 指出跨文化能力是提升国家话语国际影响力的关键能力。当前我国翻译教育还存在语言技能强、文化认知较弱的现象, 亟需从“国家”高度出发, 完善跨文化能力培养体系。本文提出通过课程改革、教学方法创新和跨学科融合, 强化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国际传播能力, 促进翻译人才从语言转换者向文化传播者转变。为翻译教育的改革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路径, 助力构建符合国家需求的高素质翻译人才队伍。

关键词: 跨文化能力培养; 国家翻译能力; 国家意识; 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

一、引言

2000 年 10 月,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走出去”的战略理念, 随后在 2002 年, 时任文化部长孙家正进一步强调了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 指出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扩大对外文化交流; 2013 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故事”, 强调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性, 进一步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全球化浪潮深入推进与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时代背景之下, 高等教育机构亟需将跨文化能力培养纳入核心育人体系。翻译教育更肩负着构建文明对话纽带、弥合文化认知鸿沟的时代重任, 翻译人才在扎实掌握语言转换的同时, 也需深入理解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 以期在文化差异中实现意义的等效传递。

中国翻译活动逐步从“翻译世界”走向“翻译中国”, 翻译的任务不仅要译进来, 还要译出去, 国家的译学话语中出现了“国家翻译行为”、“国家翻译规划”、“国家翻译能力”等词。这表明, 译学界开始认识和揭示翻译的“国家性”, 致力从国家建设的现实维度拓展翻译研究的理论视域。其中, “国家翻译能力”的提出具有特殊意义, 开启了对翻译能力作为国家能力的专门探索(蓝, 2021)。在国家翻译能力的理论建构中, 国家意识是国家翻译能力建设的逻辑起点; 国家翻译传播是国家翻译能力建构的现实旨归(杨, 2021)。国家意识是公民们通过对本国历史、民族特征以及文化传统的科学了解和认识所形成的认同感, 是经过理性思考后的实践, 意味着公民的行为不仅出于本能或者传统习惯, 而是基于对国家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一种自觉选择。国家翻译以国家意识构建国家话语、国家叙事和国家传播, 强调翻译与传播的深度融合, 囊括更深入的文化理解与传播智慧(陈, 黄, 2024)。

在国家翻译能力框架下, 跨文化能力作为连接语言转换与文化传播的核心要素, 其培养效能直接影响国家话语体系的全球建构。当前我国翻译教育呈现显著的“能力倒挂”现象: 学生普遍具备较强的语言转换技能, 而文化维度能力存在系统性缺失。国家翻译能力建设要求翻译教育突破语言技能训练的局限, 重视以国家意识为导向的跨文化能力培养体系, 强化国家文化认知,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实现翻译教育的全球化转型。

作者简介: 包佳鑫(1996—),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语笔译、外国语言文化。

二、跨文化能力

跨文化能力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效沟通和互动的能力，它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尤为重要。交际双方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差异对交际的顺利展开形成一定的阻力，这就要求交际双方在具备普通交际能力的基础上还应具备额外的能力，即“跨文化能力”，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容忍度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

跨文化能力是翻译能力的重要要素之一，被纳入翻译能力模型(Tomozeiu, Kumpulainen, 2016)。专业翻译人员在不同文化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中介，理解并适应文化差异，最终实现准确的翻译和交流。翻译活动中，具有跨文化能力的译者表现出高水平的跨文化知识、技能、态度和灵活性(Tomozeiu, Koskinen, D'Arcangelo, 2016)，这种能力不仅涉及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还包括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翻译的最终产物是能够在特定情况和使用语境中适当发挥作用的文本，翻译过程即“跨文化交流的过程”(Schäffner, 1996)。语用学视角的翻译理论将翻译视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其核心便是通过动态适应语境、传递意图和平衡文化差异，实现功能等效。

刘宓庆强调，翻译人员需具备双语能力、文化敏感度以及批判思维(2007)。而在今时之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能力更应纳入翻译工作的核心要求。一方面，深入理解文化差异帮助翻译人员准确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使译文既符合专业标准，又适应不同文化语境；另一方面，跨文化能力使得译者在国际交流中形成独特优势，有效解决多元文化场景中的理解障碍，提高沟通效率，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翻译教育要注重语言技能与文化认知的同步培养，使从业者既具备精准的语言转换能力，又能灵活调整文化差异，实现跨语言信息传递的真实性和实际传播效果。

三、国家翻译能力

任文等人认为，国家翻译能力属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定实施翻译相关规划和政策法规、掌控翻译相关资源、开展翻译实践、提供翻译服务、处理翻译问题、发布翻译产品、提升传播效果，并通过翻译教育与翻译研究、语种人才储备、技术产品研发等手段进一步发展翻译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包括翻译管理能力、翻译实践能力、翻译传播能力和翻译发展能力等四个子能力。开展翻译相关活动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机构，只要相关活动以某种方式体现了国家利益，就应被纳入考量(2021)。而杨枫认为，任文、李娟娟关于“国家翻译能力”的定义多有繁复，可简化如下：国家翻译能力以国家为主体或目的，指涉国家翻译规划、国家翻译教育、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技术和国家翻译传播等综合复杂的国家翻译行为能力(2021)。

其中，推进国家翻译能力建设不可忽略翻译研究中必须面对的国家意识。国家意识是公民基于对国家历史、文化、民族以及政治制度的科学认知而逐渐形成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体现于思想情感层面与理性实践，既包含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和形象的正确认识，也包括对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的认同，以及对国家责任和使命的自觉担当。这种意识强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要求公民在认同国家的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贡献力量。国家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通过教育、文化传承和社会实践不断深化，以实现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和谐统一。国家翻译能力的建构必须接受国家意识的约束，特别是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时，必须以几千年来积累的“治”道文化为核心，传播推广中国文化中体现的“治道精神”和经验，推动建立全球治理体系，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同时，翻译实践产生的产品要通过其传播效力才能体现其应有价值，具体包含翻译产品媒介能力、译入译出产品影响力和国内语言互译产品影响力。早在20世纪90年代，译介学便开始关注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媒介作用，尤其是文学翻译的传播、接受与文化影响，融合了比较文学、翻译学、传播学等多重视角。国家翻译传播能力突出翻译活动产品的公共性、接受性和影响力，对国家及其语言的声望和话语权有巨大影响，翻译实践类活动最终通过媒介传播能力、产品影响力等体现翻译产品的价值(任, 赵, 2023)。

总之，国家意识与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同属国家翻译的核心能力，是当下国家翻译能力框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国家意识与跨文化能力培养

翻译学本身的主体意识往往指的是学者个体的学术旨趣和学科的性质和学理结构,但却忽视了翻译研究中必须面对的国家意识。翻译学试图通过学科的理论建构和翻译实践实现国家特定跨语际和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目的,其天生的意识形态品格决定了其国家观念要远远大于其学科观念。

2022年,“上外”跨文化研究中心发布的《外语教育中的跨文化能力参考框架》中,首次将“情感态度”与“认知理解”和“行为技能”并列,作为“跨文化能力”的三大核心维度之一。“情感态度”这一维度涵盖了文化意识、国家认同和全球视野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意识强调学生应具备探索中外文化的兴趣,并能够敏锐感知和理解文化差异;国家认同旨在引导学生在接触外国文化的过程中,通过中外文化的比较与反思,深入理解并认同中国文化的价值,从而形成正确的身份认同;全球视野则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全球公民意识,为其未来参与全球治理奠定基础。这一框架的提出,为外语教育中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更加全面和系统的指导。

在国家翻译能力建设的框架下,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应高度重视国家意识的塑造。这一培养过程应以树立国家意识为核心出发点,要求翻译工作者首先坚定文化自信,再在此基础上深入关注中外语言、文化与话语体系的差异;同时,要从译文受众的角度出发,努力实现话语同步与话语等效的目标。具体而言,翻译教育中的跨文化能力培养应以扎实的汉语功底为根基,强化对中华文化叙事体系的系统性掌握。通过历史叙事、发展叙事与现实叙事的文化认知体系,帮助译者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核。通过对母语文化的深度把握,译者更能敏锐地识别出文化差异,从而实现话语等效的创造性转化。研究表明,母语文化素养与跨文化效能感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通过语言与文化的紧密结合能够显著提升译者对文化差异的认知能力(Duysabayeva, 2022)。以国家意识为导向的培养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译者的专业素养,实现在全球化语境中话语同步与等效的目标,也能为国家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有力支撑。

另外,目前的翻译教育评价体系仍多聚焦与语言转换效率与文本忠实度,虽在文化对比、政治术语处理等环节隐含国家意识元素,但缺乏系统性的显性指标。为此,翻译教育的跨文化能力培养需突破传统评价中文化维度的模糊性,重视建立双文化认知的评估机制,考察对本国文化核心符号系统与目标语文化语境知识的对称性掌握,包括两国的历史典故阐释、术语转换、价值隐喻再现等内容,可通过文化符号配对测验与跨文化语境判断进行量化。在培养过程中,必须强调源语文化内涵理解的准确性与目标语文化适配的合理性,可通过双向文化注释报告与平行文本对比分析报告进行考察;同时,针对文化调试能力,则需关注文化冲突识别的敏感度与文化信息重构策略的多样性,通过危机情境翻译模拟等进行考察。最终,实现将隐性文化认知转化为可观测量化的绩效评估体系,推动翻译能力评价从语言本位向文化赋能的方向转换。

五、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与跨文化能力培养

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是国家翻译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地位在新时代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中日益凸显(任,赵,2023)。这一能力以国家立场为基础,通过翻译实践将本国话语转化为国际受众可理解的内容,并借助有效传播媒介实现跨国界传递与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其功能已超越传统语言服务范畴,成为提升国家话语权、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支柱。当前,“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正是破解跨文化认知壁垒、实现价值共鸣的关键支撑。

翻译的本质是通过符号转换实现意义的跨文化再生,尽管翻译活动的主体、内容与媒介随时代演变不断拓展,但其核心始终围绕不同语言符号系统的转换与重构展开。这种转换不仅是语言表层的形式对应,更涉及文化内涵的深度阐释。当前我国翻译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结构性挑战。中译外领域高水平人才断层现象明显,部分译者缺乏国际传播意识,在实践中易被简化为“文字转换工具”,仍难承担文化阐释与价值传播的深层职能。

提升翻译传播效能需强化跨学科融合培养路径。翻译教育应打破单一语言训练的局限,通过传播学、国际关系学、传媒技术学等相关能力素养整合,实现文化认知、阐释与传播效能的系统性提升。传播学素养帮助译者把握受众认知框架,通过理论应用优化传播效果;国际关系知识助力解码复杂政治话语,降低

文化误读概率；深入应用多模态翻译技术，增强信息在不同媒介中的传播精度。跨学科融合培养模式能够系统提升译者的文化阐释能力，促使译者从被动转换者转变为主动传播者。

另外，翻译人才培养还需实施分类推进策略。针对非通用语种，需构建语言及其区域研究的特色课程，加强对目标语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的深度认知；在涉外法律、能源合作等专业领域，应深化行业话语的翻译训练。同时，通过国际交流项目、跨国实践平台等渠道，增加译者的跨文化实践经验，如提供国际会议协作翻译或海外文化项目机会，帮助译者直观理解文化差异，提升传播策略的应用与调整能力。采用以上分层分类的培养机制，可逐步缓解人才断层问题，为国家翻译能力建设提供可持续支撑。

六、结语

本文将国家翻译能力的理论框架首次系统引入翻译教育领域，为理解跨文化能力培养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分析国家意识、对外翻译传播能力与跨文化能力之间的关系可知，翻译教育不能仅停留在语言技能训练层面，而应转向培养文化解读与价值传播的综合能力。当翻译活动从个人行为升级为国家战略时，教育体系需要强化对国家文化内核的理解。国家翻译能力的视角为翻译教育打开了新思路，帮助教育者重新定位培养目标，也为政策制定者评估翻译教育成效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后续翻译教育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可从以下角度进行进一步探索：其一，国家翻译能力指标体系与跨文化能力测评工具的对接研究。当前国家翻译能力评估多侧重语种覆盖与翻译产量，未来需开发包含文化传播效度、价值传递准确度等维度的复合型评价工具。其二，数字技术赋能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机制研究。随着神经机器翻译技术的普及，如何构建人机协同的文化阐释模型，将成为翻译教育革新的关键课题。其三，非通用语种区域国别研究与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融合路径。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语境中，需探索特色化培养方案以应对复杂的地缘文化挑战。

翻译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文明对话的使者。在国家翻译能力建设视域下，跨文化能力培养已超越单纯的教学改革范畴，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工程。唯有将国家意识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起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协同发展的新型育人体系，方能培育出深谙中华文化精髓、精通国际传播规律的新时代翻译人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 [1] 蓝红军.国家翻译能力的理论建构:价值与目标[J].中国翻译,2021,42(4):20-25.
- [2] 杨枫.国家翻译能力建构的国家意识与国家传播[J].中国翻译,2021,42(4):15-19.
- [3] 陈京钰,黄友义.构建国家对外话语体系中的对外翻译及国际传播—黄友义先生访谈录[J].中国翻译,2024,45(2):117-122.
- [4] TOMOZEIU D, KUMPULAINEN M. Operationalis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for translation pedagogy.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2016,10(3):268-284.
- [5] TOMOZEIU D, KOSKINEN K, D'ARCANGELO A. Teach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translator training.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2016,10(3):251-267.
- [6] 刘宓庆.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 [7] 任文,李娟娟.国家翻译能力研究:概念、要素、意义.[J].中国翻译,2021,42(4):5-14+191.
- [8] 任文,赵田园.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研究: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上海翻译,2023,(2):1-7+95.
- [9] DUYSABAYEVA D. Formation of Linguo-Culturological Competence of Future Native Language Specialis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Review*,2022,5(4):97-101.

Cultivat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Translation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al Translation Capacity Framework

Bao Jiabi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globally,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translation edu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ational translation capac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s between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capacity, and highlights its pivotal role in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a's discourse. Currently, translation education in China still exhibits a phenomenon of strong language skills coupled with relatively weak cultural cognition, urgently requiring the improvement of an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cultivation system from a national strategic perspective. This study proposes curriculum reform, pedagogical inno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o strength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from mere linguistic converters to cultural communicators. The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reform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translation talent that aligns with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Keyword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cultivation; national translation capacity;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capacit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21

“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在中小学课程落实的困境及其破解

刘涵¹

(¹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74)

摘要: “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作为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旨在通过重构师生角色、优化教学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然而,在中小学课程实践中,该理念面临传统教育观念束缚、教学资源不均、教师能力不足及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差异等多重困境。本文系统剖析其内涵,探讨“以学生为中心”对教育的新要求,并针对困境提出破解路径,即通过更新教育观念、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策略,推动该理念实质性落地,为深化课程改革、实现学生个性化成长提供参考。

关键词: 以学生为中心; 中小学; 教育观念; 资源配置; 自主学习能力

一、引言

中国的传统教育长期以“教师主导、知识灌输、应试导向”为核心,这种模式虽在效率上具有优势,但易忽视学生个体差异与创新能力。在当今时代,教育领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强调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1]教育理念逐渐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

“以学生为中心”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必然结果,该理念有助于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化,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育质量,还可缓解“一刀切”教育模式带来的内卷压力,为不同特质学生提供多样化成长路径,进而为国家的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内涵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重点在于将学生置于教育教学活动的核心地位,全方位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需求,教学目的是促进学生学习、增进学生参与和提升学习效果。^[2]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源于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的观念^[3],其相关概念衍生众多,例如“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等等。美国作为这一理念的重要发源地,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众多高校便陆续开展“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Centered, SC)改革,围绕学生发展、学习效果、学习过程构建教学模式。赵炬明指出,美国高校依据脑科学、认知科学和学习科学原理,以课程设计为核心,考虑学生学习特点与困难,设计促进有效学习的课程,实现从传统“三中心”(教师、教材、教室)向“新三中心”(学生发展、学生学习、学习效果)的转变。^[4]

国内对“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研究与实践近年来呈蓬勃发展之势。一方面,诸多学者从理论层面剖析该理念内涵,其核心是实现从“教”到“学”、从“传授模式”向“学习模式”的转变,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学校课程应尊重、服务、启迪学生,促使教育回归自然过程。^[5]另一方面,在实践探索中,课堂教学也在尝试落实该理念。例如课堂模式上尝试缩小规模,开展“小班课”教学,增进师生交流,并开展翻转课堂,为学生创设自由学习环境,发挥学生主动性。^[6]

“以学生为中心”促使教师全方位重塑教学实践,一切围绕学生成长展开,以此契合新时代人才培养

¹ 作者简介:刘涵(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教师发展与学生培养。

需求,助力学生成为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终身学习者。

三、“以学生为中心”教学实践现状

(一) 教学模式革新

在“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驱动下,众多新兴教学模式应运而生,它们从不同维度重塑教学流程,致力于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与学习潜能。

协作学习模式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强调通过小组分工、互动交流与资源共享,促进学生在共同目标下主动建构知识,提升合作能力。^[7]它作为一种常见且有效的策略,广泛应用于各学科教学。以高中语文《红楼梦》节选为例,教师可以将学生划分成“组间水平相似,组内各有所长”的小组,小组全员参与,分工明确,成员分别负责收集作品的创作背景资料、深入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命运走向、探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艺术手法。在课堂上,小组间交流分享成果,彼此质疑补充,教师穿插引导。这种模式促使学生主动挖掘知识、锻炼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课堂氛围由传统的教师单向讲授转变为多边互动,知识在交流中被学生内化吸收,是“学生为中心”的深刻体现。

项目式学习也为学生搭建了自主探索的有效路径^[8],它强调通过真实情境中的复杂问题或挑战来驱动学习,^[9]学生以小组协作的形式,整合知识技能,进行探究、设计、实践并产出最终成果,从而深化知识的理解并发展核心素养。设计《猎人海力布》篇目的教学设计时,教师可以尝试以《猎人海力布》为核心展开项目式学习,以“创造性改写,完成故事新编”为项目目标,分步骤推进:第一步,小组分工研究民间故事文体特征,分析原文情节逻辑与主题内核;第二步,小组合作按照学习任务单的指示尝试运用“情节重构法”,充分考虑如何在创新中保留原著的精神内核,结合修辞手法完成新编;第三步,组内进行作品的润色完善,逐个审核语言表达与逻辑连贯性,组间互提修改建议。在整个过程中,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导者,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讨论状态,当学生陷入困境时,教师适时给予启发式的引导,而小组合作完成的最佳作品教师可帮助投稿校报或文学平台,增强学生学习的成就感与激情,进而更有力地推动他们深入探索文学创作。

(二) 角色定位转变

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实践中,师生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转变,这是推动教学模式革新、实现教育理念落地的关键环节。

教育场域中,教师角色范式正经历从知识权威型向学习促进者的转型。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作为知识垄断者,通过单向知识传递主导着课堂教学进程,学习者处于被动接收的地位。^[10]现代教育理念驱动下,教师职能重构,更多地承担起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职责。面对学生遇到复杂问题的情况,教师不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巧妙设问,引导学生回顾已学知识、查阅资料、尝试不同方法去解决,让学生在探索中逐渐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角色嬗变实质反映了建构主义学习观对教学关系的重塑,凸显教师的协作者身份。

学习者身份相应地由客体变为主体,转变为自发学习者的角色。基于自我决定理论(SDT)^[11],内在学习动机的激活促使学习者从“要我学”到“我要学”,从客观要求转向主动探究,这种主体性觉醒不仅体现为知识获取方式的转变,更标志着学生核心素养的系统性培育。

三、“以学习为中心”落实面临的问题剖析

(一) 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

传统教育观念在教育领域扎根已久,对“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实施形成了阻碍。在传统观念里,教师被视为知识的输出者,课堂教学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学生习惯被动聆听、记录,这种“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与主动探索需求。^[12]

传统单一的成绩评价体系也是传统教育观念的突出体现。传统教育模式下,考试成绩被当作衡量学生学习成果与教师教学质量的核心标准,^[13]使得教学活动围绕考试内容展开,教师侧重知识的死记硬背与应试技巧传授,学生为了追求高分而疯狂刷题,无暇顾及自身兴趣的挖掘与综合素质的提升。学生的全面发展让路于单一的分数目标,“以学生为中心”所倡导的个性化、多元化发展路径被严重挤压,极大地制约了该理念在教育实践中的落实。

（二）教学资源配置不均

教学资源配置不均是“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实施过程中的一大瓶颈，涵盖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等多个关键领域，给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带来严峻挑战。

首先，在硬件设施方面，城乡差距极为显著。^[14]城市学校往往配备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智能教学设备一应俱全，如互动式电子白板、高清投影仪，能便捷呈现多元教学素材，让抽象知识具象化，为学生营造沉浸式学习情境。同时，实验设施精良、更新及时，满足学生实操探究需求。反观农村学校，教室多媒体设备陈旧落后，实验室资源稀缺，基础设施不健全，学生缺乏亲自动手实践机会，理论学习与实践严重脱节，极大限制知识理解深度与应用能力培养。

其次，师资力量的失衡同样突出。^[14]城市凭借优厚待遇、良好发展机遇吸引大量高学历、经验丰富教师，且培训交流次数频繁，教师能紧跟学科前沿动态。相反，偏远农村地区资金不足，缺乏骨干教师，教师学历层次整体偏低，教学任务繁重，教学多依赖传统教材与讲授法，无力开展个性化、创新性教学，致使城乡学生受教育质量差距显著。

（三）教师能力的挑战

“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落地对教师能力提出了全方位的新要求，许多教师在观念转变、教学方法革新以及教育技术应用等诸多方面遭遇困境，亟待突破。

观念转变是首要难关。传统教育模式下，教师长期内化“知识权威”身份认同，形成以讲授为主导的模式。当教学范式转向“以学生为中心”时，教师需解构目前的身份角色，重构为“学习促进者”角色。然而，对之前身份的内化导致部分教师陷入权威焦虑：一方面，学生自主探索与讨论中的不确定性易触发教师对课堂失控的担忧；另一方面，教师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评估不足，倾向于通过干预维持秩序。这种矛盾本质是教育主体从“控制”到“赋权”的认知冲突，需通过批判性反思与渐进式实践逐步消解冲突。

其次，教学方法革新也是重大难题。教学方法革新不是单一技术问题，而是重构教学设计的复杂工程。传统讲授法以知识传递为特征，教师需通过预设内容与课堂流程推进课堂进度，而新兴教学模式，如项目式学习、协作探究，则要求教师转向生成性的教学设计，需要教师预判学生学习的困难并设计脚手架工具，因此，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有较高要求，不少教师因畏难而止步于方法尝试。

最后，教育技术应用更是必须应对的挑战。信息时代，线上教学平台、智能教学工具层出不穷，要求未来教师熟练运用新技术以拓展教学边界、丰富学习体验。但现实中，新技术难度更高，需要教师打破教学的“舒适区”，许多教师尤其是中老年教师学习新技术困难，学校也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系统支持与培训，技术短板限制了“以学生为中心”教学借助科技力量的深度推进。

（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差异

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中，学习者自主性差异构成影响教学效能的关键变量。

自主学习能力强学生通常怀揣着强烈的内在动机，具备稳定的认知内驱力，能够通过设定目标、自我监控与反思调整实现知识建构，有条不紊推进学习进程。而自主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学习需要外部压力驱动，缺乏内在动力，表现为面对稍有难度的任务就畏难放弃，知识学习停留在浅表层，同时此类学生往往缺乏规划，拖延频发，效率低下，难以应对综合性学习挑战。可见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差异影响“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亟需教师精准识别、因材施教，助力每位学生在学习上稳健前行。

四、破解路径

（一）理念先行：更新并引导教育观念

更新教育观念是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基石，需要多管齐下，从宣传推广、培训交流到建立激励机制，全方位推动教育者观念转变。

首先，教育宣传应“先声夺人”。教育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利用教育研讨会、线上教育平台等渠道，广泛传播“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内涵、理论基础与实践成效，通过现场观摩、线上直播等形式展示各地优秀教学案例，让教育工作者直观感受新教学模式的魅力，促使其反思传统教学局限，激发观念转变动力。

其次，教师培训与激励应“掷地有声”。学校可以采用理论讲座、案例研讨、模拟课堂等培训方式提升教师理论认知与实践技能。同时，学校内部可以改进激励机制，对积极践行新理念、教学成效显著的教师给予表彰奖励，在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绩效奖金分配等予以倾斜，为观念更新落地提供保障，逐步扭

转传统观念主导的局面，让“以学生为中心”在校园真正落实。

（二）保障资源：优化教学资源配置

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是实现“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的关键支撑，需从硬件设施、师资队伍等方面协同发力。

首先，在硬件设施改善上，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教育资源薄弱地区的投入倾斜，可以进一步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及偏远地区学校的多媒体教室建设、实验设备更新等，缩小城乡硬件鸿沟，为学生营造公平优质学习环境。

其次，师资队伍优化方面，则需要拓宽教师培训渠道，构建线上线下的立体培训网络。线上可以搭建全国性教师教育云平台，汇聚海量前沿课程，如教育技术实操、特级教师教学案例等，供教师自主选学。线下则可以组织专家团队开展培训讲座，精准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让每位教师都有能力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理念。

（三）教师层面：提升专业能力

为切实推动“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落地，全方位提升教师能力至关重要。教学反思是教师自主成长的内驱力。^[15]现代教育网络学习资源丰富，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因此，教师应紧跟教育发展趋势，养成课后反思的习惯与终身学习的心态，在反思中积累经验，获得专业成长与不可替代性。

首先，教师的课堂反思应做到记录成功之处，如巧妙引导学生突破难点的策略、激发学生兴趣的课堂活动设计，为后续教学积累经验。其次，正视败笔之处，教师课后需分析课堂问题，如学生参与度不高的原因，是问题设置不合理还是引导不到位，思考改进方案。同时，教师也要捕捉教学的机智瞬间，如灵活应对课堂突发状况的处理方式，珍视学生的见解，将学生独特观点、新颖思路融入教学设计，持续优化教学，以反思促成长，并保持“终身学习”心态，更新教学策略，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注入动力，赋能教育质量提升。

（四）学生层面：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的核心任务之一，需借助多元策略精准发力，助力学生成长为独立、高效的学习者。

首先，学习策略指导至关重要。教师应依据学科特性与学习阶段，系统传授学习策略。如语文学习古诗词鉴赏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知人论世法来探究创作背景，从意象、意境、情感表达等维度赏析诗歌，助力学生理解。此外，教师可以定期组织学习经验分享会，鼓励学生交流心得，教师点评优化，让学生学习的“策略库”不断充实，学习更得心应手。

其次，学习活动应考虑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应设计有梯度且指向明确的学习活动，并且学习活动要符合学生学科学段特点和心智发展规律，难度适宜。^[16]比如学习任务与目标有阶梯性，各层目标明确、难度递进，难度低的任务个人尝试解决，难度高的任务小组合作解决，使每位学生都能在学习中收获成就感，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并为个性化成长筑牢根基。

六、结语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落地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程，关乎教育的本质与未来人才培养走向。在迈向现代化的教育进程中，学生必须处于教育的核心，才能真正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理念，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变革。未来，各方协同努力有望逐步破解难题，推动教育向更贴合学生成长需求、更具活力与创新力的方向迈进，为社会进步筑牢人才根基。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教育部办公厅. 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 [EB/OL]. (2023-05-26)[2025-05-13].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j_kcjcgh/202306/t20230601_1062380.html.
- [2] 沈晓雨. 基于学习的教师教学发展: 美国研究型大学教师发展模式探析[J]. 比较教育研究, 2024, 46(08): 79-88.
- [3] 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 [4] 赵炬明.论新三中心:概念与历史——美国 SC 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之一[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6, (03):35-56.
- [5] 李嘉曾.“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启示[J].中国大学教学, 2008, (04):54-56.
- [6] 潘春辉.“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引领下的课堂教学变革探究[J].大庆社会科学,2018,(02):140-141.
- [7] 殷开颜.协作学习模式在高中数学复习教学中的应用策略[J].数学学习与研究,2025,(06):66-69.
- [8] 史喆, 单美贤, 郝川艳, 等.项目式协作学习环境中的情感感知影响因素研究[J].数字教育, 2024, 10(03):8-14.
- [9] 郝莉,冯晓云,郭永春,等.促进深层学习的项目式课程教学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J/OL].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13[2025-05-13].<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026.G4.20250506.1524.010.html>.
- [10] 王维.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理论与实施策略[J].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40(S1):76-78.
- [11] Deci E L, Ryan R M.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 macro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development, and Health[J]. Canadian Psychology / Psychologie Canadienne, 2008, 49(3): 182-185.
- [12] 张勇斌,张亚洲,齐元胜,等.“以学生为中心”混合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包装工程,2020,41(S1):119-123.
- [13] 陈传歆.学习任务群视域下高中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J].新教育,2024(34):20-22.
- [14] 唐金武,何祥.新时代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历史演进、内涵、问题及实现路径[J].河北职业教育, 2024, 8(04):5-10.
- [15] Hatton N, Smith D. Reflection in teacher education: Towards defi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995, 11(1): 33-49.
- [16] 纪顺.“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视域下的古诗文教学——以陶渊明诗文专题教学为例[J].语文建设,2024(11):31-35.

The Dilemmas and Solutions of Implementing the “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

Philosophy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a

Liu Han¹

¹*School of Edu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form in the new era, the “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 philosophy aims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y reconstructing the rol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optimizing teaching models. However, in the practic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a, this philosophy faces multiple dilemmas such as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concept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insufficient teacher capabil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connotation, explores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 and proposes solutions to the dilemmas, namely,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updating educational concepts,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nhanc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and fostering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ies, to promote the substan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hilosophy,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deepening curriculum reform and achieving personalized growth of students.

Key words: Student-Centere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ducational concept; Resource allocation;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25

Rasch 模型在国内语言测评领域应用现状及展望

刘强¹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 沙坪坝 400031)

摘要: Rasch 模型作为项目反应理论的经典模型, 因结果可信度高、解释力强, 在语言测试领域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基于文献分析法, 以中国知网 (CNKI) 2003—2023 年间 130 篇核心文献为样本, 借助 Citespace 工具探究 Rasch 模型在国内语言测评领域的应用现状、问题与未来方向。研究发现: Rasch 模型的应用集中于信效度验证、评分一致性分析及分数等值研究, 且多聚焦高等教育领域 (占比 70%)。现存问题包括基础教育阶段应用不足 (仅占 23%)、信效度验证方法单一化等。未来应推动 Rasch 模型在基础教育常态化测评中的应用, 结合多模态效度验证方法, 如访谈、认知诊断等, 并探索其与计算机自适应语言测试, 如 AI 命题与评估的融合路径。

关键词: Rasch 模型; 语言测评; 信效度; 分数等值; 计算机自适应测试

一、引言

在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背景下, 各国更加重视英语教育。语言测试是推动语言教育取得更高质量的关键手段之一, 语言测试不仅是为了检测语言教育的质量或语言学习者的学习成效, 同时也在学习过程中提供形成性评价, 为语言学习者提供反馈, 促进其学习。

George Rasch (丹麦数学家) 针对其 CTT (Classical Test Theory) 经典测量理论的不足, 于是构思出了单参数 IRT (Item Response Theory) 模型, 即 Rasch 理论。Rasch 模型区别于其他模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Rasch 模型需要所得到的数据与自身模型想相符合。只有数据与模型符合时才能有良好的吻合度 (model-data fit) 才能得到有意义且相对客观的量尺。此处的拟合度分为两个方面, 被试者拟合度 (person fit) 和项目拟合度 (item fit)。关于拟合度的计算, 是由被试在每道题的真实反应 (观察值), 和模型自身计算得到的期望值进行对比, 两者残差越大即越不吻合。其次, 在 Rasch 模型中, 本模型假设题目难度与被试能力相匹配。

自 Rasch 模型由陈国富等人首先在国内进行了模型的参数研究 (陈国富, 1987) 以来, 该模型就广泛应用于各大学科研究领域之中, 如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领域。其中, 外国语言文学占比最大, 且主要以语言测评应用研究为主。由此, 作者将对分析 Rasch 模型在国内语言测评领域研究现状, 总结特点及其趋势, 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研究方向与建议。

二、研究问题与方法

(一) 研究问题

¹ 基金项目: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SISU2024XK120)

作者简介: 刘强 (2000—),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语言教育、语言测试;

Rasch 模型作为语言测试的重要辅助工具,其对 Rasch 模型的拟合程度可对试题的信度、效度、以及评分信度等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研究分析并梳理国内 Rasch 模型相关文献,以期解决以下研究问题:

1. 近年来国内 Rasch 模型在语言测试领域的研究总体发文趋势如何?
2. 研究现状如何?存在什么问题?未来研究方向是什么?

(二) 研究方法

1. 文献收集

为回答以上问题,本研究在 CNKI (中国知网) 进行检索,以“Rasch”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373 篇期刊文献,由于 Rasch 模型在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所应用,故本研究作者按引用率排序剔除与语言测试不相关文献后剩余 130 篇文献。

2. 数据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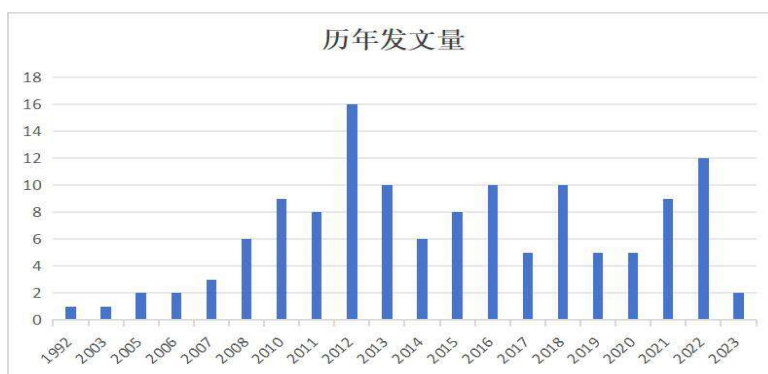
为探究第一个问题,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对 130 篇文献进行分析,分析设置年份为(2003-2023),通过其历年发文量探求 Rasch 模型在语言测试领域的总体发文趋势。为探究第二个问题,本研究将通过 citespace 分析这 130 篇文献,产出其关键词中心度图、关键词共现图、关键词聚类图和关键词时间线图,并对其观察与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 总体发文趋势

如图 1,通过对其文献分析,关于 Rasch 模型自系统性的引入国内以来(罗冠中,1992),真正开始应用在国内语言测试领域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后。最早的应用在 Rasch 模型开始于四六级考试等值应用研究(朱正才,杨惠中,杨浩然,2003),随后国内学者纷纷开始注意到此模型

图 1



的应用,从本世纪初及其后十年,该模型在语言测试界研究发文量呈现上升趋势。随后发文量总体呈现波动中下降的趋势,说明对 Rasch 在语言测试领域应用的研究热点有所下降。如图 2,关键词中心度前五名由高到低分别是:信度、效度、效度验证、概化理论和口试。可知,Rasch 模式在语言测试中,主要集中于信效度验证等领域,特别是在主观测试口试中。

图 2

频次	中心度	年份	关键词
12	0.16	2008	信度
11	0.14	2010	效度
11	0.13	2010	效度验证
6	0.03	2008	概化理论
4	0.09	2016	口试
4	0	2016	语言测试
3	0.08	2013	质量分析
3	0.04	2007	评分量表
3	0.03	2010	偏差分析
3	0	2013	评分效度

(二) 研究现状

通过对其文献分析,从关键词时间线图(图4)国内将 Rasch 应用于语言测试领域最开始始于四六级考试,从关键词聚类图(图3)中最突出的关键词主要有:效度验证、效度、信度、口试、评分量表、概化理论等,由此可知 Rasch 在语言测评领域研究最大的特点主要是进行信效度验证。在关键词聚类分析(图3)中, Q 值=0.803, S 值=0.949,说明其分析结果具有有效性。分析结果显示,有效聚类主要有四类,即:#0 效度、#1 效度验证、#2 大学英语、#3 评分信度和#7 多面 Rasch 分析,由于#1 与#2 基本属于一类研究,故总聚类主要有四类:#0 效度、#2 大学英语、#3 评分信度和#7 多面 Rasch 分析。在#2 大学英语关键词聚类下,分级考试、等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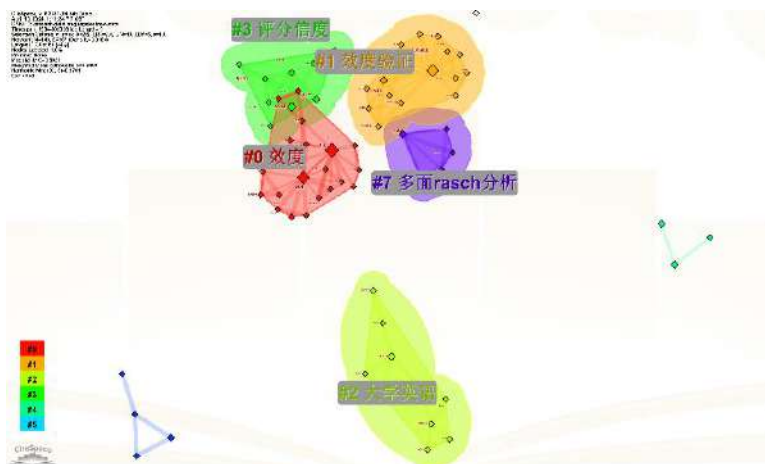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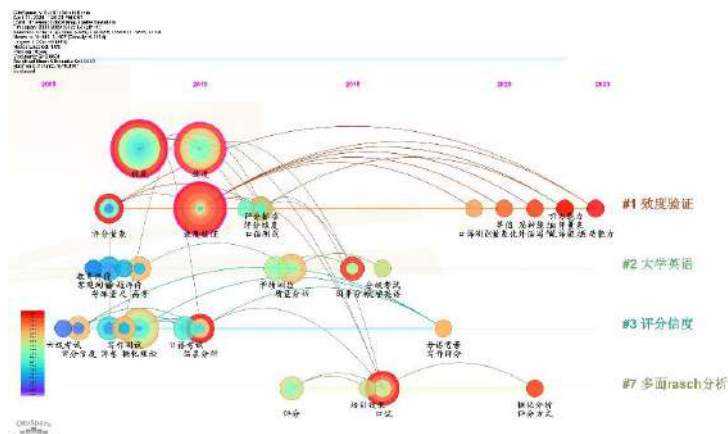


图 4



距两尺、分数等值等相关关键词较为突出,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中,关于分数等值研究也是 Rasch 模型应用的一大热点。结以上信息,本研究认为 Rasch 模型应用在语言测试领域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测试工具、量表、考生的信度研究;测试工具效度研究;分数等值研究三个方面。

1. 信度研究。

语言测试的信度主要指的是某一测试结果的可靠程度,即某一语言测试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被试的语言能力水平。而影响测试信度的因素较多。首先,对于测试工具本身来说主要是受到被试样本量和区分度的影响,被试样本量是否具有代表性、被试样本量是否足够多、试题区分度是否大,信度与这些维度呈正相关。其次,在组织测试过程中,测试环境,如考场温度、噪音、光线;监考人员是否和善等这些

因素都会影响考生答题情况,进一步影响测试效度。最后,在测试后评分员的宽严程度、前后一致性也会影响测试信度。

(1) 测试工具的信度研究

国内对于测试工具的信度研究主要涉及在对于语言测试题和量表的信度研究。对于试题研究,如(2011,王立非)探讨了全国国际商务英语考试(二级)能力量表的设计,以2009年的二级考试数据为依据,对考试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运用多层次 Rasch 模型,测量了试卷各题目的难度,以检验该考试的区分度和权威性。统计结果显示,该考试的信度、效度以及难度都达到了测试学的要求,具有较好的稳定性,适用于大规模考试推广。对于量表研究,如(杨建原,曾薇,2012)以贵州师范大学共90个大一新生在症状自评量表上的数据为实例,讨论 Rasch 等级模型在设计 and 修订等级量表中的应用,以及如何应用 Rasch 等级模型的某些参数如选项频率、平均测量值、临界值、概率曲线、选项拟合指数等来对等级量表的选项分类数目、选项标签进行直观的分析 and 检验,从而获得高质量量表。(史剑雄,王佳旻,2022)聚焦构建汉语作为二语的诊断性写作测试评分量表。多面 Rasch 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评分量表能有效地区分学生的写作能力;评分员内在一致性良好;量表的不同维度的难度存在显著差异;各维度的分值设置合理,分数使用不存在无序性。整体而言,评分量表的质量是令人满意的,通过访谈也得到了积极的反馈。总之,Rasch 模型不仅量化了测试工具的稳定性,更通过参数动态反馈机制,解决了传统信度检验中“一刀切”的局限性。其多维度拟合分析(如题目难度、考生能力、评分标准)为大规模考试的标准化推广提供了数据驱动的决策依据,尤其在跨区域、跨群体测试中展现出独特的适配性。

(2) 评分信度研究

语言测试信度极大的受到评分人员的影响,包括评分人员对于评分标准的解读,评分人员的宽严程度以及前后一致性。如(温倩,2019)对商务谈判口译行为测试进行效度验证,对于评分人员信度部分采用了多层次 Rasch 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评分员表现出良好的评分员间一致性。(吴雪峰,2018)探索构建写作评分标准的一般规律,尝试设计英语写作测试评分标准模型,结果表明:评分标准区分度和效度较好,评分员与评分标准间存在显著偏性交作用;个别分数段的使用存在非拟合现象。Rasch 模型突破了传统“评分员培训”的经验主义范式,通过残差分析和偏差指数(如 Infit/Outfit),将主观评分行为转化为可量化、可干预的客观指标。这不仅为动态监控评分质量提供了实时工具,更推动了评分标准从“静态描述”向“动态校准”的范式转型。

2. 效度研究

语言测试的效度主要指的是一种相关性,即测试与预期测试的目标是否达成一致,换句话说即该测试是否考察到命题人预期考察到的内容与能力(Lado,1961)。测试界认为的效度主要包括结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同期效度(concurrent validity)、预测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和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Rasch 模型主要是对同期效度和预测效度进行检验,即测试结果与外在标准的一致性,也称标准参照效度。相关研究也主要分为语言测试题效度、量表效度和评分效度研究。

(1) 语言测试题的效度研究

对于语言测试题的效度研究的核心思想是,该测试题是否考察到应该开叉的能力,或者该语言测试题是否有利于语言的学习。如:运用 Rasch 模型对概要写作作为一项综合技能考试进行效度验证,结果表明评分量表能够较好地地区分考生的能力,但仍需进一步改进;评分单项中语言使用(LU)难度最大,原文信息使用(SU)难度最小(李久亮,2022)。Rasch 模型通过概率模型(如题目特征曲线)将抽象的“效度”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拟合度”指标,为测试题的构念效度验证提供了数学框架。其核心贡献在于将效度研究从“相关性统计”提升至“因果机制分析”,例如通过题目难度参数识别能力培养的瓶颈点。但当前研究对“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和“社会效度”(如测试对教学的反拨效应)的关注不足,导致效度验证偏重技术理性,忽视教育生态的整体性。

(2) 量表效度研究

对于语言测试界的量表效度主要集中于该量表是否能反映学生的真实语言水平。如:采用多层次 Rasch 模型对配对口语测评分量表进行效度验证,研究发现总评分量表与互动能力评分量表可以有效的区分不同口语能力和互动能力的考生(邹润,2023)。Rasch 模型通过“分离度指数”(separation index)和“信噪比”(person/item reliability),实现了量表效度从“整体评价”到“微观诊断”的跨越。其核心优势在于通过概率模型揭示量表的隐性结构(如维度权重、选项阈值),为个性化反馈提供了数据基础。

(3) 评分效度研究

评分效度即对于测试结果能否有效的说明考生的真实语言水平。如：（杨志强，许吟雪，2018）用多层面 Rasch 模型，通过分析 PRETCO 口试的评分结果以探究其评分效度。研究发现 PRETCO 口试评分效度较高，其评分结果能够有效区分考生的口语水平，评分员评分的自身一致性总体较好。研究同时发现 PRETCO 口试评分存在以下问题：评分员的宽严度差别显著，个别评分员的内部一致性较差；少数评分员和考生的交互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评分员和四项任务之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Rasch 模型通过交互效应分析（如 Facet 交互项），将评分效度从“静态一致性”扩展至“动态情境适应性”，为高复杂度评分任务（如口译、写作）的效度验证提供了方法论创新。其突破性在于将评分效度与任务设计、评分员认知特征联动分析，推动了效度研究从“结果验证”到“过程优化”的转型。

3. 分数等值研究

Rasch 模型的一大特点在于可以将考生能力与分数放在同一量尺，这样的特点对于国内大规模考试（如 CET4, CET6, TEM-4TEM8 等）的分数等值换算具有重要意义，像此类大规模通过性考试，如若直接将原始分数作为参考，那每年的通过率将会起伏很大，因此为保障考试公平性，将分数与能力对等，通过等值运算得出考生报告分。如：（朱正才，2005）对现有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分数等值模式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一个基于锚题设计和两参数 IRT 模型的解决方案。（朱正才，杨惠中，杨浩然，2003）Rasch 模型在 CET 考试分数等值中的应用，描述了 Rasch 模型在中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分数等值系统中的应用情况，并使用真实考试数据进行了 Rasch 模型背景下的分数等值实验，对分数等值过程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详尽的分析和探讨。Rasch 模型在分数等值中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题目无关”的能力量尺（ θ 值），使不同批次、不同形式的考试成绩具备可比性。其方法论革命性体现在将等值从“统计调整”升级为“测量理论驱动”的标准化流程，尤其在高风险考试（如高考、职业认证）中保障了选拔公平性。

四、存在问题

（一）Rasch 模型在基础教育语言测试应用不足

在本研究 130 篇文献中，将 Rasch 应用于基础教育阶段语言测试的文献只有 30 余篇。占总发文数量的 23%。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则有 90 余篇，占总文献数量的 70%。Rasch 应用在大学英语较多而基础教育阶段语言测试较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 信效度验证需求不同。高等教育对其测试工具和评分人员的信效度验证需求更多，而基础教育语言测试主要集中在大规模高风险考试为主，教师对其测试工具和人员的信效度检验要求较低。2) 测试题型不同。基础教育阶段除写作外，基本是客观测试为主，而大学英语测试有其更多的主观测试，如：口译测试、口语测试等，这就需要多层面 Rasch 模型对其信效度验证。并且，现有研究多聚焦高利害考试（如 CET、TEM），对校本测评的关注不足，且缺乏长期追踪数据验证工具信度的时效性。

（二）信效度验证方法单一

对于 Rasch 模型应用于语言测试领域而言，对其信效度的分析多只是对其结果与模型的拟合程度进行探讨。这既是 Rasch 模型的特点、优点，同时也是其缺点。特别是对于效度验证而言，效度的核心是是否考察到应考察的内容与能力。这对于终结性评价确实是一种有参考意义的分析方法，但是对于过程性评价而言，测试评价的目的不是测试，而在于促进被试的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单一的 Rasch 模型分析来试卷的信效度是不充分的。总之，现有研究多依赖横截面数据，未能结合认知心理学方法（如眼动追踪、决策过程建模）深入解析评分偏差的认知根源，限制了模型的解释深度。

总体而言，Rasch 模型在国内语言测评领域的应用呈现“高教主导、基教薄弱”的失衡格局。这一现状可能源于基础教育阶段对测评科学性的重视不足，以及客观题主导的测试形式与 Rasch 模型适配性较低。此外，过度依赖模型拟合度检验而忽视多维度效度证据，进一步限制了其在形成性评价中的应用潜力。

五、未来展望

（一）基础教育阶段测试模型应用常态化

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大规模考试，如四六级、专四专八、中高考。而对于校本命题，基础教育阶段语言类教师通常对于考试测评领域专业知识是缺乏的，但是仍然需要学校英语命题工作，因此命题质量得不到保障，对于测试试题的难度与学生匹配度的把握、试题区分度、测试信效度方面没有统一的检测方法。而 Rasch 模型由于其自身特性，则可以对上述要素进行检验，对校本、班本测试的信效度也能进行分析，

提升校本命题质量。

(二) 测试效度多种方法结合验证

效度的核心思想在于测试是否测试了预期考察的内容与能力。而 Rasch 模型多只是作为工具对测试结果与能力匹配度进行分析。但是某些能力并不能通过一次测试就能完全测出,如:阅读能力考察的推理判断能力等,这些能力的运用具有开放性,并不是一次测试结果就能证实,我们还应该考虑访谈、有声思维、观察法多种方法相结合。

(三) 模型与计算机自适应语言学习相结合

Rasch 模型作为一种基于概率的潜在特质测量模型,在心理测量与教育评估领域具有深厚理论基础,其与人工智能及计算机领域的结合将在数据处理、模型优化和应用场景扩展等方面开启新的可能性。在技术融合层面,Rasch 模型的参数估计过程可通过深度学习框架实现加速与优化,例如将项目难度、被试能力等参数的联合估计转化为神经网络权重的学习问题,利用反向传播算法处理大规模测试数据,同时结合贝叶斯方法增强模型对稀疏数据的适应性。在应用场景拓展方面,Rasch 模型可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结合,构建智能测评系统,通过分析学习者对开放式问题的文本响应,动态校准认知能力与题目特征的关系;在自适应学习系统中,模型可嵌入强化学习框架,根据实时交互数据动态调整题目推送策略,实现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优化。此外,在计算机视觉领域,Rasch 模型可辅助评估图像标注任务的难度层级,为 AI 训练数据的质量控制提供量化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融合需突破传统 Rasch 模型的线性假设限制,通过引入非线性扩展模型或与深度生成模型结合,处理复杂的高维交互数据。同时,在可解释性层面,需平衡 AI 黑箱特性与测量模型的透明性要求,开发可视化工具揭示 AI-Rasch 混合模型的决策逻辑。未来,随着边缘计算与联邦学习的发展,分布式 Rasch 模型可能实现跨设备、跨平台的协同能力评估,在保护数据隐私的前提下提升模型的泛化能力,为教育公平、人才选拔等社会议题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 [1]陈富国,李伟明.Rasch 模型及其参数的近似估计[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02):75-81.
- [2]罗冠中.Rasch 模型及其发展[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2(02):40-43.
- [3]朱正才,杨惠中,杨浩然.Rasch 模型在 CET 考试分数等值中的应用[J].现代外语,2003(01):69-75.
- [4]王立非,江进林.全国商务英语考试的设计与信效度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06):35-40.
- [5]杨建原,曾薇.Rasch 模型在等级量表设计中的应用[J].中国考试,2012(05):12-18. [6]史剑雄,王佳旻.诊断性写作测试评分量表的构建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22(03):114-123.
- [7]温倩.多面 Rasch 模型的商务谈判口译行为测试效度验证[J].中国外语,2019,16(03):73-82.
- [8]吴雪峰.英语概要写作评分量表研制的实证研究[J].中国外语教育,2018,11(02):57-66+86.
- [9]Lado.R. L language Tes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Use of Foreign L language Testing. London: Longman, 1961.
- [10]李久亮.基于多层面 Rasch 模型的概要写作效度验证[J].外语测试与教学,2022(03):38-48.
- [11]邹润.基于 Rasch 模型的配对口语测试评分量表的效度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46(05):20-29.
- [12]杨志强,许吟雪,全冬.PRETCO 口试评分效度研究[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8,34(02):121-128.
- [13]胡壮麟.ChatGPT 谈外语教学[J].中国外语,2023,20(03):1+12-15.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23.03.003.
- [14]何莲珍,张洁.多层面 Rasch 模型下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口语考试(CET-SET)信度研究[J].现代外语,2008(04):388-398+437.
- [15]吕晓轩,任伟.基于 Rasch 模型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笔译自评量表效度研究[J].外语教学,2022,43(01):57-61+94.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the Rasch Model in Language Assessment in China

Qiang Liu

¹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As a classical model within Item Response Theory (IRT), the Rasch model has gain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assessment due to its high reliability and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This study adopts a literature analysis approach, using 130 core articles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 published between 2003 and 2023, and employs CiteSpace to examine the current status, existing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Rasch model application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of language testing.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asch model applications are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the validation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rating consistency analysis, and score equating, with approximately 70% of studies concentrating on higher education contexts. However, its us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remains limited (only 23%), and the methods for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assessment are relatively homogeneou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romote the routine use of Rasch modeling in basic education assessments, integrate multimodal validity verification methods—such as interviews and cognitive diagnostic assessment—and explore its convergence with computer-adaptive language testing technologies, including AI-assisted test item generation and automated evaluation.

Keywords: Rasch model; language assessmen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core equating; computer-adaptive testing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26

基于认知冲突的地理综合思维试题考查特点

纪钧腾¹

(阜阳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37)

摘要:《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指出综合思维为四大地理核心素养之一。新高考要求落实学生的综合思维和认知能力培养。论文以2019-2023年地理高考试题全国卷I主观题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基于认知冲突的地理综合思维试题考查特点分析。结果表明:地理综合思维是高考试题的考查重点;考查方向以认知冲突和要素地方综合为主;试题情境以生产情境和生活情境为主,注重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考查注重图表文字相结合。

关键词: 认知冲突; 综合思维; 地理高考题; 考查特点

一、引言

认知冲突是学生个体已有认知无法解决现在问题时的心理与现实的结合,沟通原有认识和理性思维^[1]。《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确定综合思维为四大核心素养之一,综合思维作为学习地理的重要思想和方法论,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客观、动态地认识和理解地理环境,以及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2]。

国内外学界对认知冲突和地理综合思维的培养与思考展开了大量研究。袁孝亭详细阐释了地理素养的综合性,将综合思维视为地理学科的核心科学方法和关键能力之一,突显了其重要地位^[3]。王建芹等基于“地理视角矩阵图”,通过综合的领域、空间表述和动态观察世界的方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综合思维在分析、理解地理过程、地理规律以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所起到的作用^[4]。陈红对综合思维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分,提出综合思维是地理学的奠基性思维方法,并将其划分为要素综合、地方综合、时空综合三种类型^[5]。《美国国家地理标准(1994)》重视尺度和人类活动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强调培养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问题解决能力^[6]。《英国国家地理课程标准(1996.9-2009.9)》依托对学生的能力要求划分八等级和三阶段,这八个等级在实践探索方面都重视培养学生的综合思想,体现了英国地理教育对学生地理综合思维的培养^[7]。Karem通过设计教学实验,探讨了认知冲突策略对纠正二年级学生地理错误观念的影响,指出认知冲突教学策略对改正学生地理错误观念具有明显的正效应^[8]。日本学者伊藤高路通过设立矛盾性情境,让学生在分析问题时产生认知矛盾,调动学生学习热情,这有助于促进学生深入思考地理问题,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批判性思维^[9]。总体来看,已有相关研究均体现了地理教育在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地理综合思维、思辨能力和转化解决认知方面的重视。地理综合思维培养与认知冲突逐渐成为地理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关系

(一) 认知冲突的概念与内涵

认知冲突是学生个体已有认知无法解决现在问题时的心理与现实的结合,沟通原有认识和理性思维^[1]。

¹基金项目: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2023jyxm0543);阜阳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工程项目(2022SJYZX06)

作者简介:纪钧腾(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理学科教育

试题命题经常利用冲突思维,通过自然地理环境或人类社会中的冲突现象,来测试考生的知识调动与运用能力,分析材料并获取信息,最终得以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认知冲突,有助于提高教师对学生地理学习冲突思想的把控能力,有助于教师有效开展教学活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另外,绝大部分中学地理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能够认识到学生在学习中存在错误认知,但缺乏系统理性认识,同时不太熟悉针对性的地理教学方案。研究认知冲突为中学地理教师运用地理认知冲突开展教学提供了方法策略^[10]。

(二) 综合思维的概念与内涵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确定综合思维为四大核心素养之一。人们在认识和研究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时,需具备地理学科综合思维,即人们利用综合的观点和方法认识地理环境的思维品质和能力^[2]。

地理综合思维是地理学家对人类所生存的地球表层系统进行观察、思考的重要思维方式,地理学家通常关注地方的综合、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及尺度间的相互依赖性^[11]。综合思维强调在考虑问题时将各个相关因子作为系统来把握。综合思维还涉及整体观念、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地理学集合自然科学和人文历史,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综合思维素养^[12]。经过初中学习的积累,高中生具备一定的地理知识储备,地理认知实践探究能力较强,对地理事物问题探究兴趣高。新高考对于综合思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同时也体现了地理综合思维中的地理要素综合、时空综合以及地方综合^[13]。提升综合思维素养,使其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是地理学科肩负的重要任务。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教师对地理综合思维内涵与外延的深刻理解与把握,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和持续发展的过程^[14]。

综合思维可分为要素综合、时空综合和地方综合三个维度。要素综合,其核心在于全面审视物质、能量以及各要素的集成。这种综合思维强调地理要素间的动态联系,将它们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系统。时空综合,则是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视角,对地理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它旨在揭示地理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规律,以便人类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这些规律。地方综合则聚焦于某一特定区域。它关注该区域的自然与人文因素如何影响该区域,以及该区域内各部分如何相互依赖,并与其他区域产生互动。这种综合思维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区域特性及其与其他区域的关联。

(三) 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关系

依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在认知发展过程中,个体对环境的适应依赖于同化和调适。当个体面临新的情境时,会让已有结构试图同化新情境。如果成功同化,便得到平衡。如果原有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情境,会发生认知冲突,个体便会调适原有认知结构,甚至重建新的认知结构,以达到新的更高平衡^[15]。

一方面,认知冲突能够激发学生的综合思维。当学生遇到认知冲突时,他们会感到困惑和不解,这会促使他们运用综合思维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他们会尝试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去思考问题,寻找问题答案。另一方面,综合思维也能够帮助学生解决认知冲突。当他们利用其去剖析问题时,可以更快地把握内涵及规律,从而找到解决认知冲突的方法。他们会将新知识与原有知识或经验进行整合和重构,形成更加全面和准确的认识。总之,正确运用和转化认知冲突是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综合思维的有效途径。教师应该在教学中注重创设真实情境、设置问题引导、组织小组讨论和培养批判性思维等方面下功夫,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如果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中精准地把握并巧妙地转化学生的认知冲突,这将极大地促进学生对地理知识的综合思维能力的发展。然而,如果教师未能恰当地运用认知冲突,则可能会误导学生,导致他们产生不恰当的知识迁移和错误的认知结构。具体来说,学生可能会将原有的错误观念或经验与新知识进行错误地联系和整合,形成错误的认识。这种错误的认识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还会影响他们对地理学科的积极主动性和好奇心。

新高考改革和课程改革确实为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尤其在突破传统育人模式、科学选拔人才和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改革背景下的高考和课程改革,要求师生们必须快速适应新的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高考作为高中学生复习备考的指向标,其命题方向和命题规律对师生准确把握备考方向、培养综合思维、激发思维活力具有重要意义。新高考对死记硬背的书本知识的直接考查逐渐减少,而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这意味着师生需要转变教学观念,革新教学学习方式,激发思维潜力,培养综合能力。

认知矛盾对于理解新高考的要求和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高考中这种思想经常出现,通过对近五年全国卷试题的统计分析,归纳高考试题对于认知冲突的考查特点,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教学建议。

具体来说, 高考对于认知冲突的考查特点可以从题型、视角、形式等多个方面展开。通过对这些特点的分析,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高考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要求, 从而提出针对性地教学建议。

总之, 新课程改革和新高考为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要求师生们必须快速适应新的要求和挑战。通过对高考命题方向和命题规律的研究, 以及对冲突思想的分析, 为未来的教育教学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三、高考题对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统计分析

选取 2019-2023 年高考试题全国 1 卷的主观题为研究对象, 进行高考题对于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特点分析。从试题情境、考查形式、考查方向、考查水平四方面分析。试题情境分为学术、生活和生产。考查形式分为图文或文字。考查方向分为知识认知冲突、能力认知冲突、要素综合、地方综合和时空综合, 即为认知冲突的两个维度和综合思维的三个维度。考查水平, 分为 1、2、3、4, 难度依次递增。考查水平 1 是指初步了解认识基本概念, 考查水平 2 是指熟练掌握基本概念及关系, 考查水平 3 是有一定的举一反三、联系生产生活的能力, 考查水平 4 是指能够熟练运用到实践中。2019-2023 年高考试题全国 I 卷, 主观题第 12 题和第 13 题均为必答题, 第 14 和第 15 题均为选做题, 两道题任选一道回答即可, 一般为旅游地理和环境保护的内容^[10]。

(一) 2019 年高考地理全国卷 I 主观题对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统计

2019 年高考地理全国卷 I 主观题对于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如下: 第 12 题设置生产情境, 利用某国汽车产业的背景, 考查区域产业化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和要素综合, 考查水平为 3。第 13 题设置学术情境, 利用非洲板块及印度洋板块北移造成地中海以及里海产生一系列变化的学术背景, 重点探究了试题如何考查地形对水文的影响, 以及学生是否具备运用地理环境整体性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要素综合和时空综合, 考查水平为 4。第 14 题设置生活情境, 利用安仁古镇旅游业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深入分析了旅游开发方面的知识点, 并着重考查了学生提取信息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和要素综合, 考查水平为 2。第 15 题设置生活情境, 利用 19 世纪中期某国人工运河和清淤工程的背景, 考查水体污染的知识, 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和要素综合, 考查水平为 3。

表 1 2019 年高考地理全国卷 I 主观题对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统计

题号	试题情境	考查形式	考查方向	考查水平
12	生产情境	图+文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综合	3
13	学术情境	图+文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时空	4
14	生活情境	文字	知识认知冲突+要素综合	2
15	生活情境	图+文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综合	3

(二) 2020 年高考地理全国卷 I 主观题对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统计

2020 年高考地理全国卷 I 主观题对于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如下: 第 12 题设置生产情境, 利用欧洲西部栽种葡萄的背景, 引导学生树立因地制宜开展农业生产的观念, 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和要素综合, 考查水平为 3。第 13 题设置学术情境, 利用某地玄武岩形成的不同地形单元, 图文结合考查岩石圈的物质循环和地貌形成的相关知识, 考查学生通过阅读和分析地质剖面图, 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要素综合和时空综合, 考查水平为 4。第 14 题设置生活情境, 利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 考查旅游资源的评价, 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和要素综合, 考查水平为 2。第 15 题设置生活情境, 利用青藏高原某典型区域高原鼠兔的现状, 考查生物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和要素综合, 考查水平为 3。

表 2 2020 年高考地理全国卷 I 主观题对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统计

题号	试题情境	考查形式	考查方向	考查水平
12	生产情境	图+文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综合	3
13	学术情境	图+文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时空	4
14	生活情境	文字	知识认知冲突+要素综合	2
15	生活情境	图+文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综合	3

(三) 2021 年高考地理全国卷 I 主观题对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统计

2021 年高考地理全国卷 I 主观题对于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如下：第 12 题设置生产情境，以英国某区域的农业发展为例，考查了农业区位、湿地开发利用及存在问题，旨在考查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及迁移运用能力，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要素综合和时空综合，考查水平为 3。第 13 题设置学术情境，以我国祁连山为例，考查外力作用和地质作用等相关知识，考查学生综合思维和区域认知素养，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和要素综合，考查水平为 4。第 14 题设置生活情境，以江西兴国县开通铁路为例，考查交通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旅游资源开发具备的条件及旅游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考查学生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和地理实践力素养，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要素综合和地方综合，考查水平为 3。第 15 题设置生活情境，以新疆吉木乃县的拉斯特河谷为例，考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和要素综合，考查水平为 3。

表 3 2021 年高考地理全国卷 I 主观题对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统计

题号	试题情境	考查形式	考查方向	考查水平
12	生产情境	图+文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时空	3
13	学术情境	图+文	知识认知冲突+要素综合	2
14	生活情境	图+文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地方	3
15	生活情境	图+文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综合	3

(四) 2022 年高考地理全国卷 I 主观题对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统计

2022 年高考地理全国卷 I 主观题对于综合思维的考查如下：第 12 题设置生产情境，以某国生产活动为背景，结合其农业、工业、地形等多方面的介绍，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要素综合和地方综合，考查水平为 3。第 13 题设置学术情境，图文结合，以大洋洲国家曾经历的沙尘暴为导入，考查沙尘暴和天气系统等相关知识，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和要素综合，考查水平为 3。第 14 题设置生活情境，以陕西凤堰古梯田为案例材料，深入探讨了旅游资源保护措施的考查点，并着重检验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区域认知能力和地理实践能力，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和要素综合，考查水平为 3。第 15 题设置生产情境，以多氯联苯为案例，探讨生态保护，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和要素综合，考查水平为 3。

表 4 2022 年高考地理全国卷 I 主观题对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统计

题号	试题情境	考查形式	考查方向	考查水平
12	生产情境	图+文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地方	3
13	学术情境	图+文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综合	3
14	生活情境	文字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综合	3
15	生产情境	文字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综合	3

(五) 2023 年高考地理全国卷 I 主观题对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统计

2023 年高考地理全国卷 I 主观题对于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如下：第 12 题在试题设计上巧妙构建了一个生产情境，以埃塞俄比亚灌溉农机推广和发展为具体材料，旨在引导学生运用辩证的眼光全面分析

农业发展问题。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的能力,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要素综合和地方综合,考查水平为2。第13题设置学术情境,以青藏高原风蚀退化为材料,考查学生读图析图能力,运用所学解释地理现象的能力,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和要素综合,考查水平为4。第14题设置生活情境,以甘肃平凉市养牛产业为例,设计“窑洞养牛”的研学情境,探究旅游资源的开发,将五育融入旅游资源开发,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和要素综合,考查水平为3。第15题设置学术情境,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关两山论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材料,旨在考查学生对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考查方向为认知冲突、要素综合和地方综合,考查水平为4。

表5 2023年高考地理全国卷I主观题对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统计

题号	试题情境	考查形式	考查方向	考查水平
12	生产情境	图+文	知识认知冲突+要素地方	2
13	学术情境	图+文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综合	4
14	生活情境	图+文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综合	3
15	学术情境	文字	能力认知冲突+要素地方	4

四、高考题对认知冲突与综合思维的考查特点分析

(一) 地理综合思维始终是高考试题的考查重点

2019-2023年的地理高考全国I卷主观题侧重对于认知冲突和综合思维的考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分值多且占比高。未来基于认知冲突的综合思维考查预计会更加频繁、分值更高、占比更大。高中地理教学应该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基于认知冲突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高考和新课改的要求,培养出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二) 考查方向以能力认知冲突和要素地方综合为主

考查方向主要集中在能力认知冲突、要素综合和地方综合。能力认知冲突的考查要求考生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理现象和问题时,能够跳出常规思维模式,识别并解析地理概念、原理之间的潜在冲突或悖论,从而深化对地理规律的理解和应用。要素和地方综合的考查旨在引导考生从综合、系统视角去审视地理问题,理解各地理要素如何在地方尺度上共同塑造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这不仅要求考生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还需具备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能力。时间综合的考查侧重于培养考生对地理现象随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的理解与分析能力,有助于培养考生从动态、多维的视角去把握地理世界的本质。

如2023年全国新课标I卷的第15题,通过阅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相关材料,说明“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蕴含的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原理。本题的设计精妙地反映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深刻体现了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与传统生态环境保护实践过程中各要素单独保护、治理的意识相冲突。该题目的认知冲突主要表现为自然环境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认识不足。正确转化该认知冲突,利用所学知识解释地理现象的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

从地理环境整体性原理的角度来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整体性体现。地理环境是由气地水土生等多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组成的整体。这些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正是基于这一原理,将各种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从而确保整个自然环境的稳定与和谐。第二,生态系统连通性。推进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这样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实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第三,连锁反应机制。自然地理的某一因素发生改变,会导致其他要素变化甚至整体改变。因此,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能够有效避免某一要素受到破坏而引发的连锁反应,从而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健康性。第四,生态平衡维护。通过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可以确保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自然界的保护,促成生态平衡的维持和恢复。综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是符合地理环境整体性原理的,有助于实现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 试题情境以生产情境和生活情境为主,注重联系生产生活实际

设问情境以生产和生活活动为主,从客观出发,注重联系实际。试题情境也涉及学术情境,但是考查较少。以生产生活中常见现象问题命题,可以激发学生地理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地理学习积极性;生产生

活化的问题现象,可以便于学生理解掌握;有利于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和地理探究能力,学以致用,联系生产生活,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改变死记硬背和填鸭式学习方法,培养学生地理思辨思维,激活思维活力,培养创新意识。设问情景以生产生活为主,符合区域地理学习要求,有利于学生运用自己的已有知识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学以致用,举一反三,这也符合新时代新高考对于学生的要求。

(四) 考查注重图表文字相结合

试题对于综合思维的考查注重图表文字相结合。通过图表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试题不仅提供了直观具体的区域特征信息,还通过文字解释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于该区域的理解。这种设计方式有以下五个优点。第一,具有直观性。图表能够直观地展示地理现象、地貌特征、气候分布等,有助于学生快速形成对该区域的初步印象。第二,具有具体性。图表中的数据、图形和符号能够具体地反映区域特点,使学生更加清晰地理解问题背景。第三,具有生动性。图文并茂的试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阅读和分析能力。第四,易于理解。辅以文字解释,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图表中的信息,减少误解和混淆。培养学生综合思维。第五,有利于学生问题解答。当学生对考查区域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后,他们就能够更加准确地解答与区域相关的地理问题,提高解题的正确率和效率。

五、结论

通过对于 2019-2023 年地理高考试题全国卷 I 部分主观题的统计分析,得出认知冲突与地理综合思维的关系是合理转化和利用认知冲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地理综合思维,反之则阻碍。地理综合思维始终是高考试题的考查重点,每年几乎都有涉及。试题考查方向以认知冲突、要素综合和地方综合为主,也涉及时空综合,但相对较少。试题材料情境以生产生活情境为主,具有生活化,注重联系实际,考查注重图表文字相结合。

参考文献:

- [1] 陶欣慧. 创建认知冲突情境 提升学科关键能力——以四年级上册《道德与法治》“这些事我来做”一课为例[J]. 江苏教育报, 2023(3):1.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
- [3] 王向东, 袁孝亨. 地理素养的核心构成和主要特点[J]. 课程. 教材. 教法, 2004(12):64-67.
- [4] 王建芹. 谈地理核心素养中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J]. 中学地理教学参考, 2016(5):19-20.
- [5] 陈红, 吴燕坤. 基于学习进阶的地理综合思维能力培养[J]. 中学地理教学参考, 2016(7):28-29.
- [6] Geography Education Standards Project (GESP). Geography for Life: National Geography Standards. [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1994.
- [7] 马丽娟. 基于新高考试题特点的中学生地理综合思维培养策略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8] ABUHILLAIL K. The impact of the “cognitive conflict” strategy in correcting the geographical misconceptions of second intermediate student [J]. In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Research & Development, 2019, 10(1):745-750.
- [9] ITO G. Effects of a conflict map-based teaching strategy on moti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J].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1, 59(1):111-122.
- [10] 罗静. 指向高中生地理认知冲突的教学策略研究——以人教版必修第一册为例[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 2022.
- [11] 美国国家研究院地学、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地球科学与资源局重新发现地理学委员会. 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M]. 黄润华,译.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2:8-32.
- [12] 边碗红. 地理“综合思维”素养培养策略[J]. 地理教学, 2017(3):37-40.
- [13] 薛建荣. 地理专题复习中综合思维的培养策略——以“河流专题为例”[J]. 中学地理教学参考, 2020(11):37-38.
- [14] 姚伟国. 地理综合思维及其培养的实践与思考[J]. 地理教学, 2017(9):21-24.
- [15] 卢晓旭, 袁宗金, 皮亚杰. 认知发展理论在地理教学中的应用[J]. 地理教育, 2010(Z2):101-102.
- [16] 李英婷, 朱青. 地理高考题对综合思维的考查特点及其教学启示——以 2015-2020 年海南卷主观题

为例[J]. 地理教学, 2016(16):58-6

The Exa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ical Comprehensive Thinking Questions Based on Cognitive Conflict

JI junteng

Faculty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China

Abstract: Comprehensive thinking is defined as one of the four core qualities in the Geography Curriculum Standard for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s (2017 Edition, revised in 2020).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ut forward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thinking and cognitive abil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subjective questions of geography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aper I from 2019 to 2023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arries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exa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ical comprehensive thinking based on cognitive confli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thinking of geography is the focus of the examination of the high-test questions; the examination direction is mainly cognitive conflict and local synthesis of factors; the test context is mainly production and life context, focusing on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reality of production and life; the examination focuses on the combination of graph and text.

Keywords: Cognitive conflict; Comprehensive thinking; Geography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questions; Inspection characteristic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27

浙江省应用型本科院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吴滢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杭州 310000)

摘要:近年来,跨境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正推动着传统外贸产业的转型升级。跨境电商行业市场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企业对跨境电商人才的需求持续增加。然而,浙江省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却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如课程体系设计未体现跨境电商复合型人才需求、实践教学体系单一,数字化平台建设落后、产教融合力度不充分、教学质量评估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导致跨境电商人才的供应却相对不足,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迫在眉睫。基于此,本文分析现状,指出当前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借鉴了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案例,努力探索浙江省应用型本科院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路径,希望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缓解跨境电商人才需求压力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 应用型本科院校; 跨境电商; 人才培养; 双主体培养

国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为跨境电商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机遇。据浙江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浙江省跨境电商出口规模达到了2141.3亿元,同比增长了19.1%,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跨境电商成为浙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然而随着跨境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对具备国际贸易、电商运营、外语、市场营销、数据分析、物流管理、图片处理等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浙江省应用型本科院校作为培养跨境电商专业高质量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阵地,承担着为地方经济发展输送专业人才的重任。如何探索一条可持续的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路径,为浙江省跨境电商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进而推动跨境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增长,就成为当前高等教育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浙江省应用型本科院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现状

(一) 专业开设广泛,课程体系需要优化

浙江省应用型本科院校,紧跟市场发展需求,大多开设了跨境电商相关专业,以满足当地企业对跨境电商专业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同时,也构建了包括专业基础课,核心课以及实践课在内的课程体系。但是现存的教材内容普遍滞后于跨境电商实践,理论教学内容严重偏离市场需求,基本都停留在概念介绍上,对跨境电商的运营管理内容涉猎较少。然而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迅速,课程应该及时纳入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海外仓建设、跨境直播等内容。同时,跨境电商专业需要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及跨文化交流能力,课程中要体现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商业规则、贸易政策、国际物流、国际支付等内容,需要加大国际元素的融入,培养学生的全球化视野和综合能力。

(二) 课程设置与行业需求断层,缺乏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

当前,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课程设计未能紧密贴合行业发展动态,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衔接机制不够,缺乏对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的系统性培养,导致学生难以将课堂所学有效转化为实际工作技能。

基金项目: 2024年电子商务研究课题(CCPITCBEC-20241102)

作者简介: 吴滢(1984—),女,硕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贸易经济、数字贸易领域现实问题;

参与学者: 李后彬、陈碧龄、王江杭、高帅

学生很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尽管有一些学生竞赛及跨境电商平台进行模拟,但是距离真实的业务场景较远。课程教学中知识更新之后,如对新兴跨境电商平台的介绍和新营销手段的讲解不足。对于跨境电商平台实际运营、商品选品、物流配送等实践环节的教学课时不足。再加上跨境电商设计跨学科知识,而专业课程设置中各科知识相互独立,缺乏有机融合,学生对跨境电商复杂多变性的行业特性认识不足,且职业素养教育环节薄弱,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形成自主探索意识,创新实践能力培养陷入困境。

(三) 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过程中校企合作力度不够

目前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过程中,校企合作力度不够。部分学校虽然开展各种形式的“实务精英进课堂”,但对实操的训练较少。虽然目前高校也增设了各种跨境电商平台上机模拟练习,如亚马逊、e-bay等,但是实操课程安排训练时间较短,且距离真实的交易环境还相差甚远。学生基本停留在上传资料,上架商品。真实的模拟和成交不大。很多学生为了完成教学考核分而参加课程练习,在思想认识上未放到未来就业选择这样的考虑上。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整合企业资源方面存在短板,未将企业真实业务场景融入教学,导致学生缺乏接触行业实战的机会,实践提升能力受限。

二、浙江省应用型本科院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 课程体系设计未体现跨境电商人才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

现有的跨境电商课程体系,基本上都是聚焦于理论基础、数据分析、国际营销等,基本上是以理论教学为主,课程内容滞后于行业技术迭代。教师往往不具备跨境电商实战工作经验,再加上对企业的跨境电商人才岗位能力需求调研不充分,导致课程教学过程中很少注重到学生的应用能力培养。复合型人才能力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不匹配。专业课程教学中存在为教学而教学,为完成教学大纲设置而教学,教师知识更新缓慢,跨境电商案例及教学资源陈旧,严重滞后于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跨学科教学团队协作机制不健全,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制约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二) 实践教学体系单一,数字化平台建设落后

在跨境电商的实践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过度依赖模拟训练平台开展实践教学,缺乏真实业务场景的实践锻炼,学生在知识迁移和实际问题解决能力培养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数字化平台建设滞后,部分平台的功能受限,学生无法得到充分的模拟锻炼。专业教师行业经验缺乏,实践经验和行业认知不充分,对跨境电商企业的调研不充分,对企业的需求和行业的变化信息捕捉较弱,这在教学中容易形成信息偏差,从而影响到专业教学质量的提升以及学生专业兴趣的培养。

(三) 产教融合力度不充分

在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校企合作虽然签订了合作协议,但是真正的合作点非常有限。部分院校与企业的合作多停留在实习基地挂牌、短期讲座等浅层次的合作商,缺乏长期稳定、深度融合的合作项目。再加上企业参与度不高,对参与学校人才培养过程积极性不足,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实施等方面参与度较低,导致学校的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部分企业也曾到高校开设跨境电商系列课程,但是学生报名人数有限,不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校企合作的模式也没有列入培养计划,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

(四) 教学质量评估体系不完善

对于跨境电商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评估,停留在形成性评价过程,过分重视理论课程的考核,忽略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磋商谈判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沟通能力等。学生实践能力的考察占比太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学生对实训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学分制度与弹性培养体制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选课的积极性。

三、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导向”人才培养模式经验借鉴

近年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双创教育“样板效应”日益显现,被评为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具体经验总结如下:

（一）注重顶层设计，全面健全双创保障体系

一是系统构建双创工作机制。将鼓励扶持学生创业写入学校章程，以培养“新义商”为使命任务，构建富有活力的双创教育工作体系。二是深入推进双创融合发展。围绕学生创业全周期，聚焦导师队伍建设，赛创融合互促、评价机制改革，搭建2个示范性产教联盟、4个产业学院、2个混合所有制学院等专创平台，打造有特色、有深度、可推广的专创融合义乌范式。三是全面健全双创保障体系。出台专项制度20余项，为双创教育有序开展提供制度支撑。以《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为前导课，建设省级在线精品课程《大学生创业与创新教育》和国家级在线精品课程《跨境电商创业》等双创教学资源50余项，形成了“双创通识—专创融合—双创拓展”三级递进式双创课程体系。划拨专项资金，对在校生注册企业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并根据项目类型和经营实况再给予资助，为学生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含“短期、无息、公益”贷款。设立创新创业专项奖学金，对在创新创业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与奖励。

（二）创新人才培养载体，打造多元双创平台

学校推出创业班，实行学分替代，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例如，有些创业班学生利用义乌的商品资源和物流优势，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特色商品，毕业前已经实现了月入数万的收入。打造三大平台，注重产学研创一体化发展。打造国家级众创空间、浙江省首批直播电商基地—创业园，将产品销售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打造“小商品创新设计”创意文化园区—创意园，形成“创意-作品-产品-商品”一体化成果孵化；打造智能制造科创实训基地—科创园，为师生共同参与企业项目研发、技术改造、科创成果转化提供平台。鼓励多元实战，以“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为抓手，创新实施“麦穗”计划，通过“志愿服务—勤工助学—创业实战”大学生成长三部曲，提升学生创业技能。

（三）服务区域级国家战略，助力“乡村振兴”

学校承办台盟中央、团中央、国家人社部组织开展的跨境电商培训班、乡村振兴高级研修班等创业培训项目，将创业知识和技能带到20多个省份。同时，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中欧（西班牙）跨境电子商务培训学院”“马来西亚义乌丝路学院”等国际合作平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提供跨境电商、电商直播等培训2000多人次，国际学生留义创业率达24%，回国创业率逾50%。

四、浙江省应用型本科院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实施路径

（一）对接产业需求优化跨境电商专业课程教学体系

跨境电商企业的岗位能力要求高校培养出复合型人才，既懂专业又懂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立足这些实践能力要求，构建模块化、动态化课程群。增设数据分析、跨境直播、跨境电商法律等拓展课程，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同时可以根据跨境电商专业的运营实际情况，将课程内容进行模块化划分，如平台运营模块、营销推广模块、物流供应链模块等，每个模块设置相应的课程和实践项目，使得课程具有更强的专业对应性和适应性。结合跨境电商实践案例，设计合适的教材及教学资源。采用多种教学方式，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多渠道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使得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和实践进行有效结合。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专业相关的学科竞赛，完成跨境电商店铺的开设和运营模拟，通过平台模拟实训的办法，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增强其创新意识。

（二）明确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多方位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互联网时代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也应当树立互联网思维，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学生培养的全过程，为跨境电商专业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实践教学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加实践课程的比重，如强化跨境电商平台运营的实训，跨境营销实战等，鼓励学生参加与其相关的学科竞赛，通过模拟真实业务场景或与企业合作开展项目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操作技能。开发虚拟仿真、跨境电商实战平台。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跨境电商平台的模拟运营，让学生了解电商平台的操作流程，逐步培养其创业实践能力；通过实际写作掌握外贸函电的写作技巧和沟通技巧。同时，要加强英语口语及写作能力训练，让学生懂得英语在磋商中的应用。再者，组织学生参加专业相关的展览会，扩大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增强学生的专业信心。

（三）深入开展产教融合，建立“企业导师+校内教师”双导师制

深入开展产教融合,加大应用型本科高校和跨境电商企业的合作。构建跨境电商“企业导师+校内教师”“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企业与高校的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提升学生的职场竞争力。可以邀请跨境电商企业导师参与教学活动,分享企业实操案例,保持企业资源共享,使得高校了解企业的需求,关注行业前沿,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同时,可以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开展跨境电商实训营,鼓励同学们报课参加,设置相应的学分或者证书考试,通过多种渠道增强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同时,也可以组织学生参加跨境电商展览会、带领企业去跨境电商企业调研、访学等,开阔学生视野,增强学生专业信心,多方面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 构建多元化评价指标体系

在考核评价体系方面,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课程评价、教学过程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价,实践能力评价、企业评价、同学互评、教师评价等。通过对教学质量的定期评估,可以及时优化教学过程,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水平。建立科学、合理的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学生的专业知识掌握程度、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职业素养等方面。通过评价指标体系,对人才培养过程和效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同时,建立反馈机制,根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方法,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通过以上实施路径,使得应用型本科院校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和优化专业设置,实现跨学科专业体系融合,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考核,提高专业和市场的契合度,提高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质量,帮助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拓展国际市场销售渠道,提高贸易效率,增强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 韦建秀.产教融合在跨境电商创新人才培养中的路径依赖与突破[J].商场现代化,2025,(09):48-50.2025.09.045.
- [2] 刘婷婷.新文科背景下跨境电商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5,8(05):131-133.
- [3] 张倩.跨境电商人才校企“双主体”协同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J].科技经济市场,2024,(01):149-151.
- [4] 汪洋.数字经济时代“外语+跨境电商”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英语广场,2025,(03):79-82.2025.03.031.
- [5] 李浩茹.基于产业学院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商展经济,2024,(11):161-164.2024.11.161.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Wu Yi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Hangzhou, Zhejiang 311599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an emerging business form, cross-border e-commerce i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foreign trade industries. The market scale of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dustry has shown explosive growth, and enterprises' demand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s continues to increase. However, the cultivation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has a series of problems. For example, the curriculum system design does not reflect the need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osite talents,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is singl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is backward,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is imperfect. These problems lead to a relative shortag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 supply, making the cultivation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s extremely urg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alent cultivation, draws on the case of the dual-subject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of Yiwu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ollege, and strives to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It is hoped to make modest contributions to improving the cultivation quality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relieving the pressur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 demand.

Keywords: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 cultivation; Dual-subject cultivation

Doi : 10.70693/jyxb.v1i1.28

治理范式嬗变与黄河的历程

赵光辉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从华夏先民至今, 黄河治理已有数千年。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需求不同, 黄河治理先后经历了水患治理、开发利用与人水和谐三次范式转换。在不同阶段, 黄河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与应采取的对策迥然各异。近年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围绕该问题已形成了新的治理理念与体制、机制。新对策理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顺应了当前阶段治理范式的要求, 具有重要现实作用与长远意义。

关键词: 治理范式; 生态保护; 黄河流域

黄河哺育了华夏先民, 其自身也已融入中华文化。无论我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遗址, 还是夏商周以至唐宋的国都, 多有围绕黄河及其支流分布者。然而, 黄河也有其暴虐的一面。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 不知几多古城为黄河水所淹没, 掩埋于黄土之下。新中国成立后, 几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曾视察黄河指导工作, 反映出黄河治理工作的长期性与复杂性。2019 年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黄河问题两次召开座谈会, 并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列为重大国家战略。鉴往知来。回溯千年治黄史, 细理其脉络与阶段特征, 则当前举措的意义与必要性自现, 而黄河的未来亦能为目光所及。

一、先秦至民国时期的水患治理

黄河流域多为干旱、半干旱地区, 水资源较为贫乏, 加之黄土高原水土易流失, 造就了黄河水少沙多的特点。大量泥沙在下游淤高河床, 使黄河极易发生水患。从先秦以至民国, 黄河下游共决溢一千五百多次, 大的改道即有二十六次。“三年两决口, 百年一次大改道” 是对该时期黄河水患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 我国基本处于前工业化时期, 生产力水平有限, 对黄河的开发利用不多, 黄河治理主要着眼于解决黄河下游水患, 使黄河岁岁安澜。

史载治黄第一人是共工。他用堵的办法治理黄河, 而随后的大禹则“疏川导滞”, 用疏导、分流的办法使黄河安流。这反映出农业社会早期两种不同的治黄思路。然而, 疏导之法虽可防洪, 却无法防止河道移动, 河道两岸精心培育的良田常因此受灾。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堤防, 这是治黄史上的重要进步。堤防虽能稳固河道, 却也相应产生了弊端: 随水势变缓, 黄河泥沙大量沉积于下游河道, 日积月累成为“地上悬河”, 终将有漫溢、改道之患。至西汉后期, 河道淤积问题凸显。贾让提出治河三策, 可总结为改道、分流、固堤, 从中可见治黄理论的进步。东汉明帝时期, 王景采用“宽河行洪”理念治黄, 成效显著。其后魏晋南北朝战乱不断, 人口锐减。黄土高原植被重新繁茂, 水土流失减少。从王景治河算起, 黄河安流达八百余年。

作者简介: 赵光辉,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宋元时期人口增多,开荒、填湖用于耕作,泥沙增多与滞洪能力下降,使黄河水患复重。元代贾鲁采取疏、浚、塞并举的办法,治理黄河较有成效。明清时期人口剧增,黄河水患更加严重。另一方面,明清仰赖大运河调东南物资进北京,而黄河与大运河部分重叠且相互影响,“治黄保漕”的政治任务加剧了黄河治理的迫切性。明朝潘季驯认识到泥沙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性,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黄思路,这是合流攻沙之法在我国的首次实践,也是治黄史上的又一进步。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黄河决口异常频繁。虽工业化初起步,但几未惠及黄河治理。该时期西法传入,为黄河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李仪祉提出上中下游综合治理黄河,并积极开发利用黄河在防洪、灌溉、航运、水电等各方面的功用。综合治理并开发利用黄河的治理理念,反映了黄河治理的时代趋势。然而,囿于社会现实,这些理念无法付诸实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理念才得以应用。1946年,随着黄河重新回归故道,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冀鲁豫与渤海解放区治理黄河。此前中共并无治黄经验,通过向老河工求教治河技术,以及劳模表彰总结治河经验,很快掌握了治黄方法。中共充分发挥自身的宣传动员优势,有序、高效地安排大批沿黄民众修堤、护坝,在“确保临黄、固守金堤、不准开口”方针指导下,创造了该时期黄河不决口的奇迹。

这一时期是漫长的前工业化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加之社会频繁动荡,黄河安澜的梦想无法真正实现。黄河滋养华夏先民的成长,却也留下水患考验其智慧与毅力。该时期探索出了分流、合流、改道等治黄主张,逐渐认识到了泥沙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已开始思考上下游综合治理以根治黄河水患。这些治黄经验,成为下一个时期黄河治理的宝贵思想资源。

二、新中国成立至二十世纪末期的开发利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回安定局面。中华民族赢得了民族独立,富强与现代化成为下一个要完成的历史使命。黄河治理也是该历史使命的一部分,它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互为因果,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成为该时期黄河治理的基本思路。此后,黄河治理从着眼下游水患治理转变为上中下游综合治理,从除害变为兴利与除害兼顾,也从以人力为主,转变为工程技术与人力并用。

1952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1952年水利工作的决定》,指出水利建设在总的方向是“由消极的除害转向积极的兴利”。¹据此,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在《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中提出“我们治理黄河的总方略应该用‘蓄水拦沙’的方法,达到综合性开发的目的”。²具体来说,通过上、中游水土保持与修建水库拦蓄泥沙和水,以减少中游水土流失和下游水患,且能充分发挥黄河在电力、灌溉、航运、给水等方面之利。1955年7月,《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该决议基本采纳了黄委会1952年提出的治黄总方针。³

20世纪50至70年代,黄河治理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众多水利枢纽工程在黄河干、支流陆续修建,代表性的如三门峡水电站;水土保持、河道整治工程也在上中下游同时开展。然而,由于对黄河泥沙问题认识不足,缺点也很快暴露:三门峡水电站投入使用后,由于对泥沙只拦不排,加之中、上游水土保持效果有限,水库的泥沙淤积远超预计,危及关中平原安全。1963年,王化云针对泥沙问题提出了“上拦下排”的治理思路。上拦,是指以水土保持、拦泥工程等手段拦截泥沙,下排,是指水利枢纽开洞排沙,并加强下游河道的排沙能力。双管齐下,成效显著。该治理思路随后被应用于防洪问题。1975年,黄委会针对防洪问题提出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治理方针。上拦,是指中游兴建干支流水利工程以拦蓄洪水;下排,是指下游加固堤防,增辟分洪道;两岸分滞,是指扩容下游滞洪区。在该防洪理念指导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随后得以规划修建,此后成为黄河流域主要的水利枢纽工程。

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作重心回到经济建设。党的十二大提出,到二十世纪末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

¹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的决定》,《新黄河》1952年第4期,第2页。

² 王化云:《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黄河水利委员会编:《王化云治河文集》,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³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综合开发利用黄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仍是治黄工作的重中之重。1997年通过的《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指出：“今后的治黄建设，必须进一步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认真贯彻‘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和‘除害兴利，综合利用，使黄河水沙资源在上中下游都有利于生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⁴

这一时期，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黄河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下游综合治理理念得到实施，黄河岁岁安澜，水利之用得到极大开发。然而，过度开发问题也变得愈加严峻。从1972年起，黄河已出现多年断流现象。进入90年代几乎年年断流，97年断流更达226天。断流的背后，是沿黄地区对黄河水的过度索用。频繁的断流，使河槽萎缩，淤积严重，也破坏了河道及河口地区的生态平衡。水污染是另一重大难题。黄河Ⅰ类和Ⅱ类水质由80年代初的90%以上，降至20世纪末的39%。与此相应的，则是黄河废污水排放量由80年代初的21.7亿立方米，增至20世纪末的42.2亿立方米。1998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135名院士联名，发起“行动起来，拯救黄河”的倡议。由此可见此时治黄形势之严峻。

三、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人水和谐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都获得了飞速发展，经济体量壮大之快令世界注目。然而，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也愈加突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备受争论。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人与自然的的关系迈入了新时代。与发展问题相缠绕，黄河治理亦难局限于治黄部门，而必须与地方政府协同推进。治黄与发展何者优先，治黄部门与地方政府如何统筹协调？人水和谐理念的实践化走向，构成了黄河治理的基本导向。

2004年，黄委会主任李国英提出了“黄河治理的终极目标是‘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黄理念。⁵该理念把黄河赋予生命，并从黄河视角出发审视治黄得失。黄河治理须首先考虑黄河对于经济社会系统的承载力，才能维持黄河健康生命，这也应当成为黄河治理的终极目标。已然解决温饱走向小康的民众渴望青山绿水，“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黄理念反映了时代的呼声，也是人水和谐理念的具象化表达。与该理念几乎同步，相应的治黄实践也愈加重视生态保护，主要举措与成效包括：一、黄委会实施全河水量统一调度，水资源消耗下降，黄河干流自2000年以来未再发生断流，河道萎缩态势初步遏制，总体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二、黄委会自2002年起利用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对重塑下游河道与恢复流域生态作用显著，现已发展为水库群联合调水调沙。

该时期，发展的力量与环保意志相互交叠，生态环境呈现出边修复边破坏的特点。这个特点在黄河治理中也得到了体现。黄河流域201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城镇化率也从28.7%上升到40%。人口增加、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意味着大量的水资源需求与工农业废污水排放，使得黄河治理压力倍增。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80%，远超一般流域40%生态警戒线。缺水问题未根本好转。2018年黄河137个水质断面中，劣Ⅴ类水占比达12.4%，仍明显高于全国6.7%的平均水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迟滞不前，折射出发展模式落后与民生发展不足的问题。沿黄各省区产业“倚能倚重、低质低效问题突出”，而新兴产业竞争力较弱。受发展模式所累，黄河流域城乡居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不足。生态保护迟滞与发展模式落后相嵌合，成为破解治黄难题的最大障碍。

2019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黄河，并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列为重大国家战略。⁶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形成了黄河治理的新理念与相应的体制、机制，具有重要历史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

其一、确立了治黄与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举的战略。治黄难题，其根源往往要从流域经济上找。黄河流域各省区经济严重依赖传统产业，新型产业缺乏竞争力。如能源化工、原材料、农牧业都是污染或耗水大户。与此相应，黄河流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民生发展不足。上述问题无法解决，破解治黄难题

⁴ 《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郑州：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1997年，第190页。

⁵ 李国英：《黄河治理的终极目标是“维持黄河健康生命”》，《人民黄河》2004年第1期，第1页。

⁶ 参见习近平：《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第1版。

只能沦为空谈。“黄河污染表象在水里、问题在流域、根子在岸上”，⁷实际上，黄河缺水问题同样如此。因此，要根除治黄难题，则经济必须要转向高质量发展。二者彼此关联，不可偏废。

其二、明确了以流域生态承载力为刚性约束的原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国家现代化的殷切渴望与对征服自然的自信，使得开发利用成为治理黄河的主要目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水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凸显。发展经济民生与生态承载力并非必然对立，却时有冲突。以谁优先这个问题愈显重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倒逼人类活动向水约束看齐；“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⁸引导流域经济转型升级，上述举措已明白给出了答案。

其三、形成了中央、流域地方政府与黄委会协同推进的治理局面。流域九省区之间互不统属，又与黄委会各有职掌，由中央统筹协调方能从全局出发根本性解决问题。坚持全国“一盘棋”，从九省区各自特点出发，“构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一带五区多点’空间布局”“构建形成黄河流域‘一轴两区五极’的发展动力格局”，⁹各有侧重又密切联系，共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现。

一部黄河治理史，也是一部人类对黄河的改造史。自进入农耕社会，华夏先民或堵或疏、或筑堤防，黄河逐渐脱离其肆意流淌的野性，被固定在河道内，成为人化自然的一部分。从水患治理到开发利用，再到人水和谐，黄河治理范式的每一次革新，其背后的主导力量均为该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与社会需求。人类对自然的变革活动，既可以展现人的本质力量，也能产生否定性的对象性关系。当开发利用黄河超过其承载力，这种否定性力量逐渐展示出其破坏力，而人水和谐则是一种纠正与回归。当前，随着治黄与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举战略的确立，以及以流域生态承载力为刚性约束原则的明确，经济发展与生态承载力的关系被理顺，相信“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这个美好愿望将会很快实现。¹⁰

参考文献：

- [1]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的决定》，《新黄河》1952年第4期，第2页。
- [2] 王化云：《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黄河水利委员会编：《王化云治河文集》，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 [4] 《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郑州：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1997年，第190页。
- [5] 李国英：《黄河治理的终极目标是“维持黄河健康生命”》，《人民黄河》2004年第1期，第1页。
- [6] 习近平：《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第1版。
- [7]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2021年10月8日），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08/content_5641438.htm。
- [8]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2021年10月8日），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08/content_5641438.htm。
- [9]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2021年10月8日），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08/content_5641438.htm。
- [10] 习近平：《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第1版。

⁷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2021年10月8日), 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08/content_5641438.htm。

⁸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2021年10月8日), 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08/content_5641438.htm。

⁹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2021年10月8日), 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08/content_5641438.htm。

¹⁰ 习近平：《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第1版。

The evolution of governance paradigm and the course of the Yellow River

Guanghai Zhao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311121, Zhejiang

Abstract: It has been thousands of years since the Chinese ancestors began to harness the Yellow River. Due to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productivity and social needs, the Yellow River governance has experienced three paradigm shifts: flood contro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human water harmony.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Yellow River harnessing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countermeasures that should be taken. In recent years,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round this problem, new governance concepts, systems and mechanisms have been formed. The new measures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governance paradigm, and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and long-term significance.

Keywords: Governance paradigm; Ecological protection; Yellow River Basin

Doi : doi.org/10.70693/jyxb.v1i1.29

“人民治黄”与革命时期中共的民众动员策略

赵光辉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黄河泛滥数千年, 根治黄河为历代所企望, 而终实现于中国共产党之手。中共总结其要诀为“人民治黄”。在革命时期, 为充分调动民众的治黄热情, 中共治黄机构从思想、组织、利益等多方面入手, 采取了非常多样与灵活的策略, 使民众治黄不仅自觉自愿, 且卓有成效, 这充分彰显了中共的人民本位理念。

关键词: 人民治黄; 民众动员; 人民本位

2019 年,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被列为重大国家战略, 黄河治理与保护自此进入了新阶段。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地位凸显, 黄河的生态功能、水资源功能愈加重要。在黄河治理与保护的诸多方面, 如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性节水, 以及黄河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等方面, 民众参与都能发挥重要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作用。自中国共产党接手黄河治理之初, 既有充分调动民众参与黄河治理的宝贵经验, 且成效斐然。深入发掘这些宝贵经验, 以有益于黄河治理与保护新阶段, 此时尤为必要。

在毫无准备与经验的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开始治理黄河。1946 年, 国民党主张于抗战时期改道的新黄河重新由旧河道入海, 也即经由河南、山东入海。经过抗战阶段, 旧河道区域已多为解放区。国民党此举, 实有借黄河水分割解放区的意图。但新黄河漫溢形成“黄泛区”, 也的确给当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中共决定同意接纳黄河从旧河道入海, 也由此开始了黄河治理。1946 年, 中共先后成立了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与山东省河务局, 分段治理中下游黄河。在治理之初, 中共几乎毫无经验可言。1947 年, 冀鲁豫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对此评价道: “黄水即流入故道, 我们对黄河没有经验, 究竟水来后情况如何, 不大摸底”。¹于如履薄冰的治黄探索中, “人民治黄”模式逐渐成型。

民众动员, 直接关系到民众参与治黄的意愿, 因此也是“人民治黄”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在革命时期, 民众动员是中共的优势, 这种优势在黄河治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1946 年, 美国记者罗辛格分别参观了国共的治黄工地, 国民政府所属民夫的无精打采与中共所属民夫的积极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将参观见闻发表在了 6 月 1 日的《大美晚报》上。²中共动员的良好效果, 自离不开中共治黄机构的重视与引导。1949 年, 冀鲁豫黄委会在治黄总结中说: “取得了比较成熟的经验, 就是人加工具和技术。科学的组织分工、足够的工具、熟练的技术, 才能发挥高度的劳动强力, 提高效率。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动员与组织, 其次是工具, 再次是技术”。³民众动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刚接手黄河治理的中共而言, 机械动力颇显匮乏, 几乎全靠人力。而最主要的, 就是依靠大量的民夫。这些民夫基本上是由沿黄河区域的民众抽调而成, 对他们而言, 参加治黄劳动只是一项支差任务。

¹ 王化云: 《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1947 年), 《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 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 1-GL1-1947-0005Y, 第 4 页。

² 参见 L·罗辛格: 《治黄区域巡礼》, 原载《大美晚报》1946 年 6 月 1 日, 《群众》, 1946 年第 11 卷第 8 期。

³ 《治黄工作总结》(1948 年), 《1947、1948 年王化云主任代冀鲁豫区党委拟的关于治黄工作向中央局的报告和黄河工作总结》, 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 1-3-1947-0002Y, 第 8 页。

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理与激励，也即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动员，考验着中共治黄机构的智慧。

一、尽力解决治黄民夫的各类生活问题

治黄民夫的各类生活问题，包括家庭生产、饮食起居、身心感受等，中共治黄机构都一一发文，交代相关部门负责协调解决。1.民夫家庭内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农事繁忙季节，民夫往往无法兼顾治黄劳动与家庭生产。为此，治黄机构规定：“凡赴工民夫，其家中麦收锄苗，概由各该村组织代收代锄，使其安心做工”。⁴这样，民夫没有了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治黄劳动中。2.民夫治黄期间的健康问题。为保障治黄民夫的健康，在饮食起居上都做了要求：“在生活的改良上，吃饭、休息、工作具有一定的时间（足够），各分、小队长掌握。如有病号及时医治”。⁵3.使民夫获得公平感。中共治黄机构认为，民夫的公平感获得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够保证民工有饱满旺盛的情绪。为此，特别要求注意任务分配中的公平性，“一是村里派差与生产是否公平”“二是我们分工要公平”“三是强迫群众帮工问题。谁努力谁就得多做活，这就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⁶

二、对民夫进行多种形式的教育

民夫并无专业的治黄知识，这就需要治黄机构适时加以引导和教育。这些教育形式是多样而贴近实际的，如“利用每日上下工的时间进行集体教育，并发起自我检讨”“利用检工时进行个别教育，或利用休息时间进行教育，当时指出优缺点，一致改正或发扬”。这些教育内容很少是理论性的，主要通过民夫的亲历实践进行教育，因此他们也更有体悟。如果说上述的集体教育和个别教育还属于批评教育，那么寓教于乐的形式则如春风化雨，为民夫所喜闻乐见，如“教育材料有治黄莲花乐，每小队一本。识字的单发一本，使其明了后扩大宣传，其他还有治黄宣传材料等”。⁷类似的教育形式还有教材、快报、地方戏等，在民夫休息时诵读或演出，既舒缓了疲累，又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三、借助组织力量，产生动员效力

1938年黄河改道夺淮入海后，原有河道即成旧河道，荒废达八年之久。与此相应，国民政府的治黄机构也被废弃。黄河重归故道的主张被接纳后，中共只得另组新的治黄机构。与原有治黄机构相比，中共新组建的治黄机构已大有不同，它表现为典型的分权制特征：部门少、专业化程度低，因此有利于集中同一层级的决策权，也因各层级机构的权责统一而保证了其完成任务的动力。中共治黄机构成立后，开始积极建立党组织和工会。据1949年的《山东省黄河河务局三年工作报告》称：“在各县工程队内普遍地建立党的组织，并建立了全河的河工会。现有会员八五五人。其他公船工人和造船工人的公会亦正在筹备建立中”。⁸党组织和工会的普遍建立，极大地提升了治黄成效。由于党员和大批的会员的积极带头，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四、发起各级劳动竞赛，并通过奖惩加以引导

⁴ 《关于国民党推翻菏泽协议后动员全民修堤浚河的布告》（1946年6月8日），《渤海行署、山东局一九四六年关于加强黄河修防工作的指示、训令、通知》，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7Y，第4页。

⁵ 《东阿修防段复堤工程总结》（1946年8月22日），《东阿修防段一九四六年修堤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9Y，第28-29页。

⁶ 王化云：《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1947年），《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7-0005Y，第23页。

⁷ 《东阿修防段复堤工程总结》（1946年8月22日），《东阿修防段一九四六年修堤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9Y，第19页。

⁸ 《山东省黄河河务局三年工作报告》（1949年7月18日），《山东局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治黄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9-0055Y，第34页。

在革命时期的治黄现场，劳动竞赛非常普遍，“发动区与区、组与组、村与村、个人与个人、挑夫与挑夫、砌工与砌工之间的竞赛，并自动订立竞赛的条件，由于号召了竞赛，鼓动情绪”。事实上，对于劳动竞赛的效果，中共是有预期的，“竞赛收获能把群众的情绪轰动起来，把工程修的快和好，并能创造出带头的劳动英雄模范”。既然是竞赛，就会有奖惩。治黄劳动竞赛的奖惩，主要体现在树立典型人物上。对于模范典型人物，“我们主动的采取接近和团结的方式，并尊敬和提高地位，开会时请他来参加或有事时和他讨论等，结果永久能起到带头作用”。⁹而对于非模范典型人物，一般要求其注意言论和行为。如有破坏行为者，则会发动群众进行批评教育或斗争。

有组织地逐级选举劳模，常作为劳动竞赛的后续措施配合使用。以1947年召开的安澜大会为例。为庆祝黄河顺利回归旧河道，中共冀鲁豫黄委会决定召开安澜大会，以表彰先进，交流经验。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1.逐级召开安澜大会，选举治黄劳动模范。选举先从县里开始，“原则上各县在复堤、防汛、整险、抢险、献石、造船各种不同之英雄中选出四十五至五十人，参加县段安澜大会”；然后是更高一级的修防处，“每县段选出英模代表十人至十五人，参加修防处安澜大会”；最后是冀鲁豫黄委会，“各处由到会各种英模中，选十人至十五人到本会参加安澜大会”。2.各级安澜大会开始之前须先召开总结会议，“除汇报各段总结情况外，各部门尚可进行小会，研究总结工作”。3.在安澜大会期间布置陈列室，“藉以展览成绩，交流经验，互相学习”。4.设立英雄碑，将劳模“附以简略事迹，以便镌刻于英雄碑之上”。¹⁰通过设置上述议程，既启发和提高了群众来年复堤、防汛的情绪和信心，又交流了治黄经验，可谓一举两得。

五、发动基层群众，建立群众性治黄组织

这里以群众性防汛组织为例。黄河大堤蜿蜒千里，处处皆可能出险。根据黄河决口的历次经验，一般的是从堤上出漏子。防守疏忽，或者没有防守，造成了大祸。大水漫堤，以及从险工决口的情况，是很少的。因此，要想保证黄河不决口，必须依靠群众力量，“500多公里长的堤线和千百道坝埝，要做到不溃决，决不是依靠少数的人所能完成的，必须依靠广大的群众。只有把广大的群众发动起来，不溃决才有保证”。¹¹国民政府原有的治黄机构远未做到这一点，“过去国民党防汛，是由汛兵负责。由于他们是官僚机关，不检查督促，虽有汛兵，不起作用。故而常常造成水害”。中共则利用自身的民众动员优势，逐渐建立起一套群众性的防汛组织和制度，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据1947年冀鲁豫黄委会的总结报告称：“我们今年组织了群众性的防汛，这一套防汛的组织和办法，较为严密与周到，故濮阳县出了三次漏子，均能及时堵上，这一点濮县做的还很好”。¹²

中共所建立的群众性防汛组织，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明确了领导干部负责制。“在某一个县的河段，防汛工作做不起来，抢救不力，因而溃决，危及万千人民的生命财产，这就是一个县的党委和政府（包括修防段）的责任。不但在政治上负责，同时还要负法律上的责任。依此类推，我们这一级及地专级、区级也是如此”。因此，与防汛相关的各级负责干部更有动力做好民众动员工作。第二是治黄机构与地方政府紧密配合。群众性防汛组织的日常运转，主要依靠沿黄河区域民众的参与，这就需要所在地政府的协同配合。“具体的做法，应该由县政府协同段，统一布置到区，说明任务及办法，然后由区指定较强干部为副指挥长，协同段里派下去的干部，深入到村，动手去做”。¹³应该说，中共地方政府的紧密配合，使得中共的民众动员具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⁹ 《东阿修防段复堤工程总结》（1946年8月22日），《东阿修防段一九四六年修堤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9Y，第9、27、28页。

¹⁰ 《关于召开复堤防汛等工作的总结暨立功表模大会的决定》（1947年9月17日），《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召开安澜大会的决定、通知及会议记录》，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7-0006Y，第3页。

¹¹ 王化云：《王化云治河文集》，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7年，第8页。

¹² 王化云：《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1947年），《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7-0005Y，第32-33页。

¹³ 《对于今年防汛工作的初步意见》，《人民黄河》1949年创刊号，第40、39页。

六、结合群众利益，达成动员效果

在中共治黄早期，民夫劳动采用征工制，干多干少劳动报酬一样。这种工资制度具有支差性质，群众劳动不积极，效率较低。后来改为包工制，民夫的劳动积极性大为提高。两种制度的优劣是比较明显的，“包工的办法，较征工为优。因为包工完全是群众自愿，而且与他们的利益相结合。故包工群众的自动性、积极性就比征工好”。¹⁴ 碓工的态度转变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碓工是具有一定技术的工种。因为治黄早期实行无差别工资，“因此碓工情绪普遍低落，寿张反映：‘十里无歌声’，要求挖土不愿打碓。会技术的老碓工有的不上堤，有的上堤又走了，青年碓工也不再学技术，碓打的也不好”。后来提高了待遇，“按技术分为四等发给工资”。碓工的劳动态度随即发生转变，“老碓工上了堤，青年碓工请老师，夜里练习”。¹⁵

结合群众利益，逐渐成为中共治黄机构在定策时的重要考量。以护堤委员会的创设为例。黄河大堤需有专人看护，种植柳、苇也有助于保护大堤，中共治黄机构巧妙地将二者结合了起来。1949年，冀鲁豫黄委会要求建立护堤委员会，“护堤委员会由村干及护堤积极分子组成，会下设护堤小组，分设植柳和护堤”。为了鼓励附近民众积极参与黄河护堤，黄委会将堤旁留地的收益交给护堤民众，“堤旁留地，可种植柳、苇，谁种归谁，树苗自筹，堤上的草归他收割”。与此相应，护堤民众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种植及收割，要服从河防机关的指导。平水沟浪窝、看堤、看树、看草”。事实上，堤旁留地种植柳、苇，本身即可固土护堤，上述规定可收双效之功。此外，黄委会所种柳树，其部分收益也归护堤民众所有，“我们所植之柳，仍归公有，看柳人可按规定砍伐软柳枝”。¹⁶

“人民本位”理念是中共强大动员能力的要诀所在。1947年3月，国民党对中共的战略进攻渐趋颓势，此时的蒋介石开始认真对待中共的优势。他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说：“切不可再像过去一样，只重形式不问实际，只要农民、工人来入党，而不求切实的效果，这样一定不能发生作用。我们一定要学习共产党的长处，要有宗教家传道的精神，真正到农村里面去，真正为民众服务，改善他们的生活，增进他们的福利，和他们达成一片，以取得他们的信仰”。¹⁷ 国共两党对民众的态度差异，在根本上取决于两党的理念差异。中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人民本位”理念是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它要求中共须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立场和出发点。在革命时期的治黄现场，“人民本位”理念也充分展现了它的作用。1949年11月，黄河水利委员会首任主任王化云在《三年来的治黄斗争》中总结道：“我们从治黄开始，就紧紧地依靠了群众，明确了人民治河的路线，因之广大群众在治黄斗争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大批复堤、抢险、防汛的英雄，保证了任务的完成”。¹⁸

参考文献：

- [1] 王化云：《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1947年），《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7-0005Y，第4页。
- [2] L·罗辛格：《治黄区域巡礼》，原载《大美晚报》1946年6月1日，《群众》，1946年第11卷第8期。
- [3] 《治黄工作总结》（1948年），《1947、1948年王化云主任代冀鲁豫区党委拟的关于治黄工作向中央局的报告和黄河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3-1947-0002Y，第8页。
- [4] 《关于国民党推翻菏泽协议后动员全民修堤浚河的布告》（1946年6月8日），《渤海行署、山东局一九四六年关于加强黄河修防工作的指示、训令、通知》，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7Y，第4页。

¹⁴ 《治黄会议总结》（1949年），《一九四八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九年的任务》，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8-0023Y，第19页。

¹⁵ 《一九四九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二零年的任务》（1949年），《平原省河务局一九四九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一九五零年的任务》，1-GL1-1949-0124Y，第5-6页。

¹⁶ 《治黄会议总结》（1949年），《一九四八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九年的任务》，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8-0023Y，第20、21页。

¹⁷ 《最近一年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报告》（1947年3月21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二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年，第53页。

¹⁸ 王化云：《王化云治河文集》，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 [5] 《东阿修防段复堤工程总结》（1946年8月22日），《东阿修防段一九四六年修堤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9Y，第28-29页。
- [6] 王化云：《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1947年），《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7-0005Y，第23页。
- [7] 《东阿修防段复堤工程总结》（1946年8月22日），《东阿修防段一九四六年修堤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9Y，第19页。
- [8] 《山东省黄河河务局三年工作报告》（1949年7月18日），《山东局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治黄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9-0055Y，第34页。
- [9] 《东阿修防段复堤工程总结》（1946年8月22日），《东阿修防段一九四六年修堤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2-1946-0009Y，第9、27、28页。
- [10] 《关于召开复堤防汛等工作的总结暨立功表模大会的决定》（1947年9月17日），《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召开安澜大会的决定、通知及会议记录》，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7-0006Y，第3页。
- [11] 王化云：《王化云治河文集》，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7年，第8页。
- [12] 王化云：《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1947年），《冀鲁豫黄委会一九四七年治黄工作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7-0005Y，第32-33页。
- [13] 《对于今年防汛工作的初步意见》，《人民黄河》1949年创刊号，第40、39页。
- [14] 《治黄会议总结》（1949年），《一九四八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九年的任务》，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8-0023Y，第19页。
- [15] 《一九四九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五零年的任务》（1949年），《平原省河务局一九四九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一九五零年的任务》，1-GL1-1949-0124Y，第5-6页。
- [16] 《治黄会议总结》（1949年），《一九四八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九年的任务》，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1-GL1-1948-0023Y，第20、21页。

"People's Manage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CPC's Mass Mobilization Strategies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Guanghai Zhao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Zhejiang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s flooding plagued China for millennia, with successive dynasties aspiring to tame it - a feat ultimately achiev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CPC summarized its approach as "People's Manage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to fully mobiliz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iver management, the CPC's governance agencies implemented diverse and flexible strategies encompassing ideological, organizational and material dimensions. These measures ensured voluntary yet highly effective public engagement in river governance, fully demonstrating the CPC's people-centered governance philosophy.

Keywords: People's Manage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mass mobilization;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1.31

合理的“不合理”情节——谈动画《我失去了身体》的叙事特点

李毅¹

(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戏剧性故事讲究“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情理”是故事内部构建的一种叙事逻辑。本文的“不合理”情节指的是偏离影片故事的内部情理(非现实世界情理), 容易令观众觉得突兀的情节。一些动画作品却故意使用这种“不合理”情节, 改变叙事策略, 剑走偏锋得到特殊叙事效果, 法国动画《我失去了身体》便是一例, 本文尝试结合“不合理”情节的象征意义、将其前置与影片整体叙事结构的关系两方面, 对该片叙事特点进行考察。

关键词: 动画编剧; “不合理”情节; 表现主义; 象征

正文:

文艺作品的作者讲到不合常情常识的事时, 常常会跳出来插话说“信不信由你!”, 除了这种方式, 让观众易于接受“不合理”情节的方法还有一种——将其前置到作品开头!

几乎所有的叙事艺术形式都讲究“契约精神”, 游戏最为明显, 玩之前约定的“规则”, 无论多荒谬, 玩家接受了才能开始游戏, 游戏进行中这些规则不可变更, 否则玩家会感觉被愚弄。小说、漫画、影视等叙事作品也都有这种“契约”, 故事开场段落透露作品类型、基调、主题的只鳞片爪, 之后情节段落无论怎么在“意料之外”, 也必须控制在契约规定的“情理之中”, 正所谓“提笔定全局”。

需要注意, 故事“情理”不一定是现实世界的逻辑, 故事可以构建一套自己的情理规则(世界观)。如德国童话《吹牛大王历险记》满是荒唐情节, 却契合作品本身的荒诞情理。本文所谓的“不合理”情节, 指的是与其发生时间线之前的情节遵循的情理格格不入, 易令观众错愕的情节。将“不合理”情节放在故事开场, 会将人们习惯的故事“单链情理”变为“双链情理”, 使得基于“单链情理”而言“不合理”的情节, 在“双链情理”中不再突兀, 此为谓“合理的‘不合理’情节”, 法国动画《我失去了身体》就使用了双链情理: 现实+超现实。

《我失去了身体》是法国导演杰赫米·克拉潘(Jérémy Clapin)2019年的动画电影, 改编自纪尧姆·洛朗(Guillaume Laurant)小说《快乐的手》, 法国 Xilam 公司制作, 网飞出品, 获得 2019 年第 72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单元最佳长片, 2020 年第 47 届动画安妮奖最佳独立动画长片、最佳编剧等多个国际大奖。综观影片内容, 《我失去了身体》一片有三条故事线:

基础线——寻找身体(超现实情理): 主人公是男主角劳伍菲尔断下的右手。它从医院出逃, 一路历险穿越城市寻找身体;

副线——幸福童年及其终结(现实情理): 主人公为童年劳伍菲尔, 出生于中产家庭, 基于父母各自的期望, 他想成为宇航员+音乐家, 他也爱用磁带录音机记录生活。但一场车祸让他变成孤儿, 中断了梦想追逐。

¹ 作者简介: 李毅(1978—),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动画民族风格的当代化。

主线——对爱情憧憬的破灭（现实情理）：主人公为青年劳伍菲尔，他活得浑浑噩噩，在偶遇女孩加布丽尔后，他似乎找到了生活目标，但加布丽尔了解到劳伍菲尔为她叔叔工作只是处心积虑要接近她后，拒绝了他的表白。落寞的劳伍菲尔醉酒滋事，第二天因为在运行中的木材切割机上“捉苍蝇”发生断手事故。

三条线因为使用不同形貌的主人公（残肢、童年、成年），副线又另使用黑白效果，所以用平行蒙太奇间杂在一起并不会混淆。但《我失去了身体》影片开头的三场戏，并非简单地是以上三条故事线各自的开头。影片中的**主线和副线，其实都是做为基础线主角“断手”的主观回忆呈现出来的**，所以影片就开始于主人公右手与身体分离独立成为主角的那一刻。为方便展开分析叙述，此处为开头三场戏情节内容标上序号：

A.（序幕）苍蝇飞舞在事故现场，断手与劳伍菲尔被发现倒在地上；

B.（序幕）童年的劳伍菲尔在父亲的指导下多次试图抓住苍蝇，均以失败告终，铺垫“抓苍蝇”是“掌握命运”的象征；

C.（正片）断手利用多种道具从诊所楼窗出逃，跳向对面的天线，但“失手”坠落……（见图1）



图1：《我失去了身体》中开头三场戏部分截图

以下分两方面展开分析“不合理”情节通过“前置”手段合理化的必要条件，并探讨除“前置”之外，“不合理”情节是否还存在其他合理化手法。

一、“不合理”情节的象征意义是其“合理”存在的基石

假设将全片三条故事线按劳伍菲尔成长时间顺序重剪成单线排列，则C处“断手复活”这一“不合理”情节发生在影片约2/3处，观众会因为忽增的新情理破坏预期，感觉被戏弄——因为这一情节时间线之前的故事情理全是现实主义的，并没有对断手能“活”有铺垫（即使之前有大量右手主体构图、主观视角）。动画将这一“不合理”情节前置到作品开头，除了通过荒诞趣味的画面吸引观众，同时告知观众：本片现实情理之外，还存在一条“超现实”情理。

类似的开场设计也许可以追溯到卡夫卡1915年的文学作品《变形记》，小说一开头主人公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甲虫！而文中所有人在意的居然都只是变形给工作、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人去寻找变形的原因。相比解释“不合理”情节发生的外在原因，作者更有兴趣展示将“不合理”情节这张试纸探入貌似“合理”的现实后发生的可视变化。**设计“不合理”情节是表现主义常用的通过扭曲现实来凸写精神世界的一种手法，它使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具象化。**《变形记》中肉体的变形象征了人被物异化后的心理病态，而《我失去了身体》中“断手”指代被切断与“爱和梦想”连接后迷惘无助的劳伍菲尔，“复活”是劳伍菲尔鼓起勇气重启人生（影片结尾处他将儿时车祸失亲录音段落覆盖成自己意在祈福改命的“不可理喻的行为”——跃上塔吊！而跳跃行为又与开头C场景断手逃离医院大楼跃向窗外天线也有对比互文关系，是逃离既定命运，开始新的冒险的标志动作。），“寻找身体”则是他跨越障碍成长，跌跌撞撞地开始寻找人生意义的象征（童年时期宇航员梦想来自父亲期望，音乐家梦想来自母亲，成年后送披萨只是为了口粮，木工职业起因于心仪的女孩，而劳伍菲尔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录音是童年时他主动探索生活意义的行为但因为家庭变故戛然而止，片尾劳伍菲尔重启录音机，正是再度开始寻找自己梦想）。导演杰赫米·克拉潘访谈中明确提到该片主题为“**如何找到自己，以及你如何生存，如何面对天意和命运，如何挣扎**”佐证了这一点。

“断手、复活、寻找身体”只是《我失去了身体》中运用象征手法的冰山一角，片中除了大量使用如“苍蝇、冰屋、手表”等物体象征，空间也具有象征意义，C情节结尾处手从高空坠落垃圾筒，象征童年劳伍菲尔从中产家庭坠入社会底层，而之后他的所有期望几乎都在“高处”：再次给他生活希望的加布丽尔住在35楼；从快递员变为木工学徒后，劳伍菲尔住进了低层的阁楼，但很快他找到了通往对面废弃高楼顶层的路，并

在楼顶玩“过家家”向加布丽尔表达爱意；结尾他从楼顶跃上对面塔吊的冒险，是从一个高处（废楼）向另一个高处（建设）跃进……

将富有重要象征含义的“不合理”情节前置动画影片开头，同样应用于克拉潘导演 2008 年的动画短片《91 公分之外》，作品将精神疾病直接外化为视觉上的“怪病”，开场为一名浮于空中的男子，向心理医生陈述自己患上“身体与视觉图象在水平方向错开 91 公分”病的原因——被陨石撞击！该片用“错位”象征心理疾病症状，“被陨石击中”指代精神压力下人群的发病概率，视觉的荒诞奇观与内容浓郁的人文关怀赋予了该片独特魅力。

可见，将有强烈象征含义的“不合理”情节前置，不仅只是顾及观众的接受心理，更重要的是以出离的“荒诞”吸引观众注意，引导观众思考影片主题。

二. “不合理”情节前置服从于影片整体叙事结构设计

影片的叙事结构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精巧积木，将“不合理”情节前置会打乱情节原有时序，对影片整体叙事结构设计有何影响呢？

文学作品《变形记》是笔直的单一线性叙事，但主人公变形前的生活情节会零星浮现在甲虫的思绪中，动画短片《91 公分之外》，将开头事件之前的起因放入其向医生求诊倾述的内容，主体结构依旧是线性叙事。

《我失去了身体》是动画长片，其叙事结构也是立足于“断手”这一特殊主人公寻找身体过程的线性叙事基础线上，但根据场景变化刺激，以回忆效果插叙童年副线和成年主线的内容蒙太奇，三条故事线交错掺杂使用给予观众非线性叙事的观感。动画开头三个场景 A、B、C 与整体结构的关系为：

A 是主线（成年线）与基础线（断手线）间的切割点，是主线的结尾前置，介绍出两条线各自的主人公，展示劳伍菲尔命运最凄惨的时刻，之后主线围绕“为什么”展开，而基础线则回答了“怎么办”；

B 为副线（童年线）中部情节，透露全片“捉命运”主题；

C 情节的“断手复活”是本文的“不合理”情节，在时间上直接延续 A 场景，是基础线的继续展开。

三条故事线中，基础线和主线各自严格遵守时序交错叙述，而童年副线则剪碎后颠倒错乱，抛撒在全片各处。从三层线的剪辑连缀可看出导演拥有超强的收纳能力，故事可切分出清晰的段落章节主题：

苍蝇——序幕（AB）；

初生——断手复活逃出诊所（C）；儿童时期手探索世界；

坠落——手从高楼落入垃圾桶、跌入地下铁；童年劳伍菲尔沦为孤儿；成年劳伍菲尔的底层劳动生活；

转机——劳伍菲尔和加布丽尔相遇，感受到久违的温暖，开始向往“家”；断手在河沟见到天鹅，在桥下报纸卷中歌宿；

逃离——打算搬家的劳伍菲尔整理童年物品，触到翻车事故录音带；断手逃离盲人家；劳伍菲尔向寄养家庭道别；

新生——断手遇见婴儿；劳伍菲尔搬到新住处，与加布丽尔关系升温；

冲刺——断手执伞飞过车流，靠近目的地；劳伍菲尔终于向加布丽尔表白但被拒绝；

死亡气息——被苍蝇叮着的山羊缓缓走向公路中央；断手跌入破窗硬着陆失去知觉；宿醉的劳伍菲尔回到木工作坊打开切割机；

……

可以看出，以 AC 开端的基础线内容设计绝非是随意的，断手将劳伍菲尔之前的人生历程完整地重走一遍，但断手勇敢、机智、主动、目标明确，这是劳伍菲尔在追求加布丽尔的过程中才体现出来的隐藏品质，其余时间小伙子只是个浑浑噩噩的马大哈，有此基础，影片结尾设计劳伍菲尔的洗心革面才不至于沦为乱洒鸡汤（也另有理解为断手对于身体是有着母爱一般感情的“她”，本片导演在访谈中也曾说到剧本写作时对断手使用的称谓为“Rosalie”这样一个女性称谓，但并不能据此否定断手为劳伍菲尔的一个“分身”）。而断手在影片的后段找到了身体，故事主线和基础线合二为一，却并没有发生观众预期的神话结尾——经过千难

险阻找到身体的断手重新与身体结合，恢复成健康整体。如果有这样的神迹和开头的断手复活呼应，不仅只是徒然增加了“不合理”情节，同时会毁掉故事中另一条现实情理。影片结尾断手没有被身体发现，只是悄悄地引导加布丽尔通过录音去了解身体已经做出的疯狂改命冒险，并未逾越它在主题表达中其实应是一种主观存在物的界限。

如果将《我失去了身体》按时序重新排列的线性叙事版本比做无伴奏独唱，三故事线版本则是多声部的复调阿卡贝拉，美观丰富地诠释了影片主题。在动画长片中，“不合理”情节的前置绝不是一次孤立简单的剪贴动作，而是导演从整体出发精心设计故事结构的结果。

三. “前置”之外的其它“合理化”手段

将“不合理”情节前置以获取“合理化”效果的方法，需要将“不合理”情节从时间轴上剪下来，影片整体叙事结构可能需要重新设计，如果影片是在中部才出现“不合理”情节，也有让观众易于接受该情节的方法。

1. 在影片或相关章节段落开头增加与“不合理”呼应的铺垫情节。

在影片开头新生出“不合理”情节的照应情节，增加铺垫以减少后文的唐突，也是使用“丑话说在前面”的游戏规则思路。如英国 BBC 动画短片《怪兽古肥猯》（2009），虽然是童话故事，动画艺术家在处理原著绘本“老鼠真遇到了自己随口编造出来的怪物”这一充满童趣的“不合理”情节时，在原有故事外面又套了一个“松鼠妈妈讲故事”的外壳。现实基调的日本动画《东京教父》（2003），开场安排教堂组织流浪人群合唱圣子颂，为片中“弃婴能带来神迹好运”这一相对奇幻设计埋下伏笔。

2. 对情节的“不合理”进行模糊化处理

同年上映的叙述流落荒岛男子半生故事的动画《红海龟》，写实基调进展到 1/3 处，忽然出现了“红海龟化女子”的奇幻情节，是否为大师败笔也引起较大争议。如果将该变形情节前置，或在影片开头增加海龟化人传说铺垫介绍，恐怕都会破坏整体朴素的单线叙事风格。也许应模糊化处理“幻变”这一不合理情节，如改为海滩上红海龟尸体失踪，男主在寻找时发现晕倒的红发女子，因为海边女子有可能是红海龟所化，也可能是另一起海难中扶着龟甲漂浮来的幸存者，这应该好过生硬地在主角身旁直接从海龟化为套在龟壳中的美女。

另一例为日本动画《若能与你共乘海浪之上》，前半段现实基调表现一段被死亡中断的美丽恋情后，在影片中部忽然出现“唱歌让溺亡者在水中显影”这一灵异事件，除了影片之前对“水”与“歌”的足够铺垫外，主要得益于这一“不合理”情节出现时被当作女子极度思念意外逝去的恋人而产生的精神错觉（虽然之后经过重重验证并非错觉），铺垫及模糊化处理让“不合理”情节得以较柔和地被观众接受。

四. 结语

《我失去了身体》在片头使用的前置“不合理”情节手法，是引燃观众观影兴趣的奇招，收获了漂亮的“凤头”开场效果，还有部分影片故意在结尾才安排“不合理”情节，藉此增加“豹尾”力度，如电影《末代皇帝》中藏在龙椅下笼子里几十年依旧活着的“蝨坚强”、《我不是药神》尾声为囚车送行患者群中出现回生的亡者，这些直击主题、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不合理”情节显著增强了影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中医里砒霜之类的毒药，如果用得恰当亦可成为奇效灵丹，“不合理”情节也一样，他们并不总是编剧的敌人。

参考文献：

- [1] KEVIN Jacobsen, Jeremy Clapin 导演访谈[EB/OL].Goldderby,2019-12,
<https://www.goldderby.com/article/2019/jeremy-clapin-i-lost-my-body-director-animated-netflix-video-interview-transcript/>。

- [2] 于宗睿,卡夫卡《变形记》中的表现主义手法[J].中原文学,2025 (01);
[3] 向文心,《我失去了身体》双线并行下的类型动画[J].电影文学, 2020 (18);
[4] 张琛,魔幻现实主义视域下动画电影《我失去了身体》研究[J].大众文艺, 2023 (14)
[5] 韦思捷, 电影《最后的告别》中的多线叙事与隐喻构建[J].电影文学, 2025 (08)

Reasonable "Unreasonable" Plot

——The Narrative Features of the Animation "I Lost My Body"

Liyi

Liyi,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Dramatic storytelling emphasizes the "unexpected yet plausible," where "plausibility" refers to the internal narrative logic constructed within the story. In this paper, "implausible" plot points refer to those that deviate from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film's narrative (not the logic of the real world), which may easily strike the audience as abrupt. However, some animated works deliberately employ such "implausible" plot points, altering narrative strategies to achieve unique storytelling effects through unconventional means. The French animated film *I Lost My Body* serv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film's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by analyzing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its "implausible" plot poi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overarching narrative structure, particularly through their placement within the film.

Keywords: Animation Screenwriting; "Implausible" Plot Points; Expressionism; Symbolism.

<https://doi.org/10.70693/jyxb.v1i1.36>

基础教育阶段的民间美术美育策略研究——以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为例

朱蒙晰¹ 张鹏²

(¹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 湖北 咸宁 437000, ²湖北科技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湖北 咸宁 437000)

摘要: 本文聚焦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 深入探究咸宁民间美术融入中小学课堂的实践。通过实地调研、案例分析等方法, 详细剖析学校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现状, 揭示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 旨在为民间美术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有效开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助力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

关键词: 民间美术; 基础教育; 文化传承; 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

一. 引言

咸宁民间美术作为地域文化的璀璨明珠, 蕴含着当地人民千年来的智慧与情感。通山木雕以其精湛的技艺, 将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栩栩如生地呈现于建筑装饰之上, 其细腻的刀法、丰富的构图, 成为当地古建筑不可或缺的艺术瑰宝^[1]。赤壁竹雕则巧妙利用竹子的天然特性, 经艺人雕琢, 化为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的生活器具与艺术摆件, 清新雅致的风格独具魅力^[2]。崇阳提琴戏脸谱, 以夸张的造型、鲜明的色彩, 为戏曲表演增添独特韵味, 生动诠释人物性格与命运^[3]。咸宁的鄂南雕花剪纸, 其以“雕剪结合、以雕为主”的独特技法与灵秀雅致的南方美学特征, 成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4]。

然而,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冲击下, 咸宁民间美术面临严峻挑战。传承人老龄化, 通山木雕技艺传承人数量锐减, 且平均年龄偏高, 许多珍贵技艺面临失传风险; 市场受众日益萎缩, 传统民间美术作品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5]。在此背景下, 中小学教育成为挽救与传承咸宁民间美术的重要阵地^[6]。将其引入课堂, 既能丰富学校美术教育资源, 提升学生艺术素养, 又能激发学生对本土文化的热爱, 增强文化自信, 为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活力。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凭借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积极的探索精神, 在咸宁民间美术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成为本研究极具价值的样本。

本研究旨在深度剖析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在咸宁民间美术教学中的实践过程, 全面梳理其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师资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与不足, 提炼出具有推广价值的教学策略与改进方案。针对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美育发展, 研究成果将为其进一步优化民间美术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推动民间美术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普及与深化, 并提供有益借鉴, 促进中小学学生的文化自信信念提升。

二. 咸宁民间美术的内涵与教育价值

2.1 咸宁民间美术的内涵

咸宁民间美术植根于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通山木雕作为当地民间美术的杰出代表, 广泛应用于祠堂、古民居等建筑。在对通山地区多处古建筑的考察中发现, 木雕装饰在建筑中的使用率较高。以某典型古民居为例, 其门窗、梁柱上的木雕作品达数百处, 雕刻内容丰富多样, 木雕工艺考究, 匠人需依据木材纹路, 运用浮雕、透雕、圆雕等多种技法, 精心雕琢, 使作品兼具艺术美感与文化内涵。

¹ 基金项目: 2023 年咸安区基础教育科研课题《咸宁民间美术在中小学课堂中的运用——以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为例》, 项目编号: XAJCYKT202311

作者简介: 朱蒙晰, (1993.05—) 本科, 美术教师, 研究方向: 民间美术教学, 艺术传播

² 通讯作者: 张鹏, (1991.05—)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 传统村落、景观设计、旅游规划

咸宁是著名的“楠竹之乡”，竹种植面积达 170 余万亩，竹产业及竹艺术品产业是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其中竹雕技艺依托当地丰富的竹资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竹雕作品题材广泛，山水风光、花鸟鱼虫皆可入画。在竹雕工作室调研时了解到，当地艺人擅长根据竹子的形状、纹理设计创作，通过巧妙的构思与精湛的雕刻技法，将平凡的竹子转化为精美的艺术品。透雕、浮雕、镂空雕等技法的运用，营造虚实相生，清幽高雅的意境，成为传播咸宁文化的重要载体。

崇阳提琴戏脸谱是当地戏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色彩认知。脸谱以绘画装饰人物面部，通过红、白、黑等颜色分布，产生强烈对比，以不同色彩表达不同人物的性格，红脸象征忠义，白脸表示奸诈，黑脸寓意刚正。脸谱造型夸张，通过对五官的变形处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提琴戏演出旺季，脸谱绘制会激发相关手工艺人的经济活力，脸谱制作技艺也在传承中不断发展。

鄂南雕花剪纸是咸宁市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术技艺，其以“雕剪结合、以雕为主”的独特技法与灵秀雅致的南方美学特征，成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雕刻画面多以咸宁市传统文化场景进行展示，题材涵盖民俗生活（如婚丧嫁娶、农耕场景）、吉祥如意（如龙凤呈祥、连年有余），现代创作则融入红色文化（如建党百年主题）、地方特色（如隐水洞、赤壁之战），形成“传统为本、创新为翼”的创作路径。成为宣传咸宁文旅的“活名片”

2.2 咸宁民间美术的教育价值

咸宁民间美术在中小学教育中具有多元教育价值。

在审美教育方面，学生在学习通山木雕纹样过程中，仔细观察线条的疏密变化、图案的对称与均衡，从而培养对形式美的敏锐感知能力。在临摹木雕纹样的实践中，学生逐渐掌握线条的表现力与构图的基本原则，提升审美鉴赏水平。

在文化传承层面，通过学习赤壁竹雕工艺，学生深入了解当地竹文化的发展脉络，知晓竹子在咸宁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在课程中，学生不仅学习雕刻技法，还了解到竹产品与当地生态环境、民俗风情的紧密联系，文化传承意识得以强化。

在创新思维培养上，崇阳提琴戏脸谱为学生丰富灵感源泉。学生以脸谱元素为基础，进行现代创意设计，如将脸谱形象与动漫角色相结合，创作出新颖独特的艺术作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激发创新思维。

在德育教育方面，通山木雕中诸多蕴含传统道德观念的题材，如“二十四孝”故事，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课堂讲解与讨论中，学生深入理解孝道等传统美德的内涵，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进品德修养提升。

三. 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将咸宁民间美术融入课堂教学的现状

3.1 案例地分析

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坐落于咸宁市，占地面积广阔，校园环境优美。学校教学设施先进，拥有专业美术工作室，配备齐全的雕刻工具、剪纸材料等设备器材，为民间美术教学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学校师资力量较为雄厚，专职美术教师中部分教师具备民间美术相关专业背景。

3.2 教学实践现状

（1）课程设置

小学阶段注重基础与兴趣培养。以剪纸教学为例，一年级开设“对称剪纸——小蝴蝶”课程，通过系统教学，大部分学生能熟练掌握对称剪纸技巧，独立完成蝴蝶剪纸作品。二年级开展“团花剪纸——吉祥纹样”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了解传统吉祥纹样的寓意与文化内涵，学生在创作中积极运用所学纹样，多数学生能够创作出包含多种传统纹样的团花作品，对剪纸艺术的理解与创作能力显著提升（图 1）。初中阶段则侧重于技能提升与文化探究。八年级开设“赤壁竹雕基础”课程，多数学生能够利用竹子废料制作出简易书签、杯垫等作品，部分学生还能在作品中融入个人创意，展现出对竹雕工艺的深入理解与掌握。

（2）学生参与情况

艺术课程是我校固定的美育教育必修课程，通过教师工作坊模式，分年级、分类型，按照学生兴趣自愿报名参加。通过对相关学生进行访谈得知，大部分学生对民间美术课程表现出浓厚兴趣。学校积极开展课外民间美术社团活动，吸引众多学生参与。每年举办的民间美术作品展览，成为学生展示才华的重要平

台，参展作品数量众多，涵盖剪纸、竹雕、木雕等多种形式，参与学生占比高，营造出浓厚的校园艺术氛围。



图 1：剪纸展览与竹编课堂

3.3 取得的成效

学生积极参与美术竞赛、展演是提升其艺术兴趣的积极促进方式。通过教师指导，我校中小学学生积极参与湖北省及咸宁市各项艺术作品竞赛，取得良好成绩，均通过学校公众号第一时间发表信息，强化“学校—学生—教师—家长—社会”五位一体的整体荣誉感。学生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获得中国书画比赛一等奖，市中小学音体美课例、案例二等奖，第三届小小书画家比赛优秀奖等多项成果，学生作品多次在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中心展览，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凭借在民间美术教育方面的突出成果，吸引周边学校前来交流学习，校际合作不断加强，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社会影响力与文化辐射力。

四. 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运用咸宁民间美术教学存在的问题

4.1 课程体系不完善

小学与初中民间美术课程衔接存在明显不足。小学阶段侧重于基础技法的初步学习，课程内容相对简单、单一；而初中阶段则直接进入较为复杂的创作与文化探究，缺乏过渡性课程。这导致小学毕业学生掌握的基本技巧在初中课程中难以有效衔接运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断层感，影响学习效果。

4.2 师资力量不足

校内美术教师虽具备一定专业素养，但接受过系统民间美术培训的比例较低，且培训时长有限。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专业知识的欠缺导致教学质量受到影响。如在“崇阳石雕”课程中，部分教师由于自身对石雕工具使用方法、雕刻技巧等掌握不够精准，无法给予学生准确、有效的指导，致使许多学生未能正确掌握相关技能。

4.3 教学资源匮乏

学校现有的民间美术教材多为通用性教材，缺乏针对咸宁本土民间美术特色的专业教材。在通山木雕教学中，使用的教材内容与本地木雕风格、工艺特点等存在较大差异，无法满足学生对本土民间美术深入学习的需求，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诸多困惑。同时，学校教学资源库建设滞后，数字化资源占比较少，且更新不及时。在信息时代，丰富、及时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对于学生学习至关重要，而学校目前的资源状况难以满足教学需求，限制了教学效果的提升。

4.4 评价体系不健全

学校民间美术教学评价标准不够明确、细致，在作品评价中，对于“创新性”“文化内涵体现”等关键指标，不同教师理解存在偏差，导致评价结果缺乏客观性与公正性。此外，评价结果未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有效结合，未能对学生形成足够的激励作用，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

五. 优化咸宁民间美术在中小学课堂运用的策略

5.1 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

制定科学合理、螺旋上升的课程目标。小学阶段从培养学生对民间艺术的感知与兴趣入手，逐步引导

学生掌握基础技法；初中阶段则在巩固技法的基础上，注重学生对文化内涵的深入理解与创意表达。设计专门的衔接课程，如在小学高年级开设“民间美术元素融合”课程，将剪纸、木雕、竹雕等不同民间美术形式的元素进行整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探索不同艺术形式的关联与融合，为初中阶段的深入学习做好铺垫。建立动态、多元的课程评价机制，全面跟踪学生学习过程，及时反馈学生学习情况，促进学生不断进步。

5.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实施“双师培养计划”，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教师到民间美术工坊进行实践学习，深入了解民间美术工艺制作流程、技艺精髓，提升教师实践能力。同时，邀请民间艺人到学校开展教学方法培训，帮助教师掌握更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建立校际教师协作共同体，加强与高校、其他学校的交流合作，共同探讨教学问题，分享教学经验。

5.3 丰富教学资源

联合民间艺人、高校专家以及一线教师，编写具有咸宁本土特色的校本教材。教材内容涵盖咸宁民间美术的历史渊源、工艺技法、文化内涵等方面，并结合教学实际，设置丰富的案例与实践项目。与当地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机构合作，建立“数字文物库”，将馆藏民间美术珍品进行数字化处理，通过3D建模等技术，让学生能够更直观、全面地了解民间美术作品，拓宽学生视野。

5.4 完善评价体系

制定详细、量化的评价指标，明确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与评价标准。如在剪纸作品评价中，创新性、技法熟练度、文化内涵体现等指标分别设定相应分值，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公正。将评价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设立“民间文化小传人”等荣誉称号，对在民间美术学习中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表彰，并与升学、评优等挂钩，充分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

六. 结论

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在咸宁民间美术教学实践中已取得一定成果，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激发了学生对民间美术的兴趣，提升了学生艺术素养与文化传承意识，在区域内产生了一定示范效应。然而，在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学资源与评价体系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制约了民间美术教学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实施构建完善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丰富教学资源、完善评价体系等优化策略，有望解决现存问题，构建科学、系统、高效的民间美术教育体系。

未来，建议学校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地区学校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民间美术教育发展；积极探索民间美术教育与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发展的结合点，实现民间美术在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多重价值。期待通过各方努力，让咸宁民间美术在中小学课堂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创新精神的新时代人才贡献力量，推动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齐铁军. 通山木雕技艺传承与创新研究[J]. 文化月刊, 2024, (02): 38-40.

- [2] 朱庆刚.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湖北竹产业高质量发展[J]. 党政干部论坛, 2024, (07):36-38.
- [3] 吕翠翠, 段婷婷. 崇阳提琴戏的文化遗产与当代表演艺术的融合研究[J]. 戏剧之家, 2025, (01):19-21.
- [4] 贾佳, 王佳妮. 荆楚文化遗产视域下鄂东南雕花剪纸艺术的传承与研究[J]. 黑龙江画报, 2024, (20):32-34.
- [5] 刘立云, 贺云翱. 传统技艺类非遗传承发展的三重价值[J]. 人民论坛, 2022, (24):123-125.
- [6] 明成满, 赵辉. 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一体化研究[J]. 基础教育, 2021, 18(04):52-61.

Research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Strategies of Folk Art in the Basic Education Stage: A Case Study of Bei Dabang Experimental School in Zi Shan Lake

Zhu Mengxi¹, Zhang Peng²

¹ Zishan Hubei Dabang Experimental School, Xianning, China

²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ning, Hubei,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ubei Dabang Experimental School in Zishan and delves deeply into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folk art into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s in Xianning. Through on-site research, cas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chool in terms of curriculum setting, teaching methods, etc. is conducted to reveal the achiev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and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folk art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and to assist i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Folk art; Basic educ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Bei Dabang Experimental School in Zi Shan Lake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1.37

高职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构建及画像研究——以广东 4 所民办高职为例

明伟¹ 姚镇城²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 惠州 516057,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商务学院, 广东惠州 516025)

摘要: 当前社会对大学生就业问题持续给予高度关注, 其中“慢就业”现象尤其引人瞩目。本研究抽样选取 4 所高职院校大学生作为调查样本, 通过对其职业管理能力、专业发展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环境竞争能力等维度的深入分析, 描绘出高职大学生“慢就业”群体画像。基于调研数据和构建的群体画像,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主观、客观和社会等因素, 以解析高职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的成因。最终, 本研究从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与价值观、提高毕业生与就业岗位匹配度、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等三个层面, 提出了应对高职大学生“慢就业”问题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 高职教育; 慢就业; 群体画像; 原因分析; 路径分析

就业不仅是最大的民生, 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基石, 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然而, 伴随着经济和教育的迅猛发展, 高校扩招政策的推行使得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 2024 届高校毕业生更是高达 1179 万人, 其中高职毕业生占据了总数的 46.6%, 这一趋势既是我国综合国力和教育水平提升的象征, 同时也给高职毕业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

1. “慢就业”概念界定

目前, 学术界对于“慢就业”尚未作出统一的定义, 一般认为, “慢就业”是指大学生在毕业时未能找到符合自身预期的就业目标, 因而选择主动延长求职准备期, 利用更多时间来提升自身技能、积累经验或拓展视野, 以期更好地匹配就业需求的状态^[1]。对于高职毕业生自身来说, 就业已不再只考虑是否有求职结果, 考虑更多的是理性认识自我, 并针对自身存在的不足, 在可预期的时间范围内做出合理的选择(如: 备考专插本、提升职业技能等)。据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在 2023 年就业创业情况调研获悉, 38.0% 的受访者选择了“慢就业”, 其中 32.0% 是为了继续深造^[2], 因此, 要根据具体情况辩证看待“慢就业”这一现象, 对于积极的“慢就业”要加强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而对于消极的“慢就业”, 则需要分析其成因, 正确认识和有效应对“慢就业”现象, 对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2. 高职大学生“慢就业”群体画像

2.1 主观因素: 就业观念仍倾向于体制内工作, 且缺乏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基金项目: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教育工作分会/全国轻工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4 年度课题 (QGJY2024075); 惠州市 2024 年职业院校教育科学研究课题《基于 CIPP 模型的物流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作者简介: 明伟, (1985-), 男, 助理研究员, 本科, 研究方向: 高校思想政治。
姚镇城 (1984-), 男,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物流系统方法论。

随着 00 后成为就业主力军,其职业价值观呈现显著代际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首先,部分高职毕业生就业期望值较高。据本课题 4 所院校调查显示,77.6%的高职大学生慢就业群体将薪资预期设定在 4000 元/月以上,明显高于区域就业市场 3000-3500 元的主流薪酬区间,且普遍存在对工作地域(81.7%倾向省会城市)、企业规模(66.3%选择上市公司)等要素的刚性要求,这种与间的错位,客观上延长了求职周期。其次,看重体制内岗位。受社会传统观念、家庭期望等多重因素影响,“考公考编”持续升温,众多大学生将“考公考编”视为首选。然而,体制内工作岗位报考人数多,而录用名额有限,且竞争非常激烈,据本课题 4 所院校调查显示,无论是直接就业毕业生,还是“慢就业”毕业生,体制内工作岗位仍是就业的“首选”,如图 1 所示,在“僧多粥少”的背景下,部分学生为了保留应届毕业生的身份优势,以期在未来有更多选择机会,选择了“慢就业”这一策略。最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较为缺乏。据本课题 4 所院校调查显示,虽然高职院校大多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但每周仅安排 1 课时,如此有限的课时工作量,仅能勉强完成理论讲授,学生大多难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去设计职业生涯规划方案,教师更无暇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深入探讨,这导致高职大学生不仅在职业目标与发展路径缺乏清晰且明确的认识与规划,更无法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的能力与素质。而一旦进入毕业季,部分高职毕业生由于缺乏明确的职业规划,常常会感到迷茫和被动,进而容易加入到“慢就业”的群体中,同时,这种缺乏主动性和前瞻性的态,无疑会增加高职大学生顺利就业的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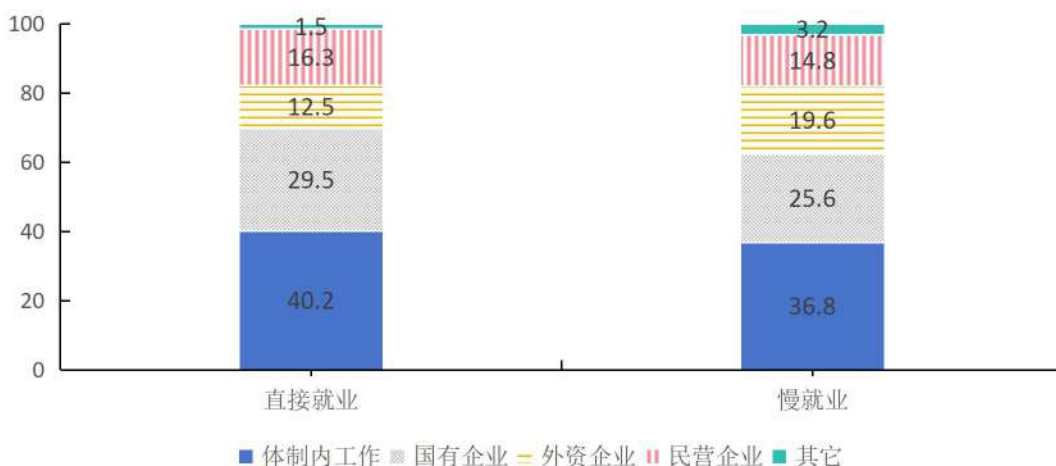


图 1 高职毕业生不同就业状态岗位调查 (%)

2.2 客观因素：产销匹配错位

产销匹配错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不协调^[3]。高职院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具备高素质技能的人才,然而,部分民办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未能与市场需求的变动保持同步。随着产业结构的迅速升级和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这些院校的专业调整未能及时跟进,从而导致培养出的学生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例如,一些传统专业如公共管理、法律事务等领域的毕业生供过于求,而新兴专业如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毕业生则供不应求。由于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与市场需求不相吻合,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与所学专业相符的工作,这增加了就业难度,延长了求职周期。部分学生为了找到合适的工作,不得不降低就业期望,甚至选择“慢就业”。其次,课程内容与实际技能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即便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基本相符,课程内容也可能与实际技能需求不一致。高职院校的课程体系往往偏重理论知识,而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较弱,这导致学生毕业后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和工作经验,难以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例如,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虽然掌握了编程理论,但在实际项目开发中缺乏经验,无法快速适应企业的工作节奏。企业因此难以招聘到符合要求的高职毕业生,导致招聘成本增加。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进行培训,以使新员工能够快速适应工作岗位,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也

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效率^[4]。

2.3 就业因素：协同育人度较弱

协同育人弱化主要表现在：一是校企合作深度不足。虽然高职院校普遍开展了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深度和广度仍有待提高。部分校企合作仅停留在“一纸协议”，如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但缺乏深度的课程共建、师资共享和项目合作。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高，导致校企合作的效果不理想。由于校企合作深度不足，学生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就业能力不足。部分学生在毕业后难以适应企业的工作要求，需要较长时间的培训才能胜任工作岗位。二是师资结构存在显著的不合理性。在部分民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中，双师型教师所占比例偏低，缺乏同时具备深厚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经验的教师。这种状况导致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的结合困难，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结果，企业对教师的专业能力产生了质疑，认为其培养的学生在技能掌握方面难以满足行业标准。

3. 高职大学生就业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整理有关文献，并结合高职大学生就业实际，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构成进行综合分析，初步形成了职业管理能力等 4 个一级指标和自我展现能力等 27 个二级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评价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合成权重	排序
职业管理能力 A ₁	0.244	自我展现能力 B ₁	0.174	2
		职业规划能力 B ₂	0.035	10
		敬业精神 B ₃	0.035	11
专业发展能力 A ₂	0.244	专业知识理解运用 B ₄	0.043	7
		学习能力 B ₅	0.058	6
		问题解决能力 B ₆	0.028	12
		实践能力 B ₇	0.085	4
		创新能力 B ₈	0.020	15
		逻辑思维能力 B ₉	0.010	18
社会适应能力 A ₃	0.413	沟通表达能力 B ₁₀	0.040	9
		团队合作能力 B ₁₁	0.066	5
		人际交往能力 B ₁₂	0.183	1
		适应能力 B ₁₃	0.099	3
环境竞争能力 A ₄	0.099	抗压应变能力 B ₁₄	0.025	13
		学校办学层次 B ₁₅	0.041	8
		学校声望和知名度 B ₁₆	0.017	16
		学校就业指导服务 B ₁₇	0.011	17
		家庭关系网络资源 B ₁₈	0.024	14
		父母的职业背景和家庭收入 B ₁₉	0.006	19

3.1 研究对象的确立

本研究选取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等 4 所地方高校的 500 名在校生和毕业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星发放网络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477 份，剔除作答时间在 60 秒以下、答题选项均为同一选项的无效问卷 69 份，有效率 85.5%。

3.2 结果呈现

1. 信度分析

为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在发放问卷前进行问卷前测,共有90名大学生参与了测试,结果通过了效度及信度检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问卷发放,其结果运用SPSS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信度分析

量表	克隆巴赫系数	项数
职业管理能力	0.858	6
专业发展能力	0.913	12
社会适应能力	0.896	9
环境竞争能力	0.855	6

2. 效度分析

表3是KMO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表。测量效度最常用的方法为因子分析法,并采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来判断。如表3可知,高职大学生就业能力量表的KMO值为0.94,大于0.8,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对应的P值均为0.000,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量表效度能较好反映调查数据。

表3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40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上次读取的卡方	32 950.225
	自由度	528
	显著性	0.000

4. 对策建议

4.1 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与价值观

随着就业市场供需的不断变化,“慢就业”现象在高职毕业生群体中愈发普遍,已成为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要课题。这一现象的出现,部分源于学生就业观念的偏颇、期望值的不合理以及职业规划能力的欠缺。为更好地应对“慢就业”现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与价值观显得尤为重要,应做到:一是明确职业价值观导向。职业价值观应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国家和社会的需要。高职学生需认识到,不同职业虽分工各异,但都在国家建设中不可或缺,无论岗位大小,只要努力拼搏,都可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贡献。二是调整期望值和增强职业规划。期望值管理对高职学生就业至关重要,过高的期望值易导致就业挫折,过低则可能造成职业发展受限^[5]。学生需基于自身条件和就业市场实际,设定合理期望值。高职学生需结合专业技能、兴趣特长等,客观评估自身实力,同时了解就业市场动态、企业需求和行业薪资水平。期望值应涵盖职业类型、工作地点、薪资待遇等多方面。例如,若期望薪资超出市场水平,可能需重新审视调整。同时,职业规划对高职学生就业和职业发展同样关键。科学规划能助力学生明确目标,合理安排学习和实践。职业规划应包括自我评估、职业探索和目标设定。学生首先需深入了解自身兴趣、性格、技能和价值观,明确优势劣势,然后通过市场调研、企业实习和职业人士访谈等途径,探索不同职业要求和发展前景。

4.2 提高毕业生与就业岗位匹配度

其做法主要有:一是优化专业设置。高职院校应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增加新兴专业的比重,减少传统专业的招生规模。同时,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定期开展市场调研,确保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保持同步。二是改革课程体系。优化课程内容,增加实践教学环节的比重,确保学生在毕业后具备实际操作能力和工作经验。例如,采用项目驱动教学法,让学生在真实项目中学习和应用知识,提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三是加强区域企业深度合作。鼓励学生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就业，通过政策引导和宣传，提高学生对不同地区就业机会的认识。同时，加强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作，通过产教深度融合，不仅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和就业机会，还能促进区域就业市场的平衡发展。

4.3 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

针对协同育人度较弱的问题，为提升高职学生的就业能力和整体培养质量，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深化校企合作^[6]。高职院校应建立长期且稳固的校企合作关系，为学生创造更多实习和实践机会。这不仅让学生提前适应职场环境，了解行业动态和企业需求，还能使企业参与到学校的课程设置与教学过程中，确保教学内容与实际工作需求紧密相连。例如，学校可以和企业联合开展项目式教学，让学生参与到真实的企业项目中，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提升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同时，企业可以为学校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供学生实践操作，使他们能够熟练掌握行业内的最新技术和工具。此外，学校还可以邀请企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参与课堂教学和指导学生实践，分享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见解，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职场情况。二是优化师资队伍。高职院校需要打造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即教师既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学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如鼓励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参与企业的生产、研发和管理等活动，以便教师能够及时了解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和技术应用，将实际工作经验融入到教学中。同时，学校还可以从企业引进一些退休或离职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他们可以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为学生传授实践技能和职场经验。此外，学校应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各类专业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以更好地指导学生成长。协同育人是提升高职学生就业质量和培养适应社会需求人才的关键。通过深化校企合作、优化师资队伍和加强就业指导服务，可以有效解决协同育人度较弱问题，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职场，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7]。

针对高职毕业生“慢就业”现象，需多措并举提升其就业能力。高职毕业生自身应积极提升自我，主动适应社会变化，增强竞争力。政府应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吸纳毕业生，如给予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行业协会和企业要参与人才培养，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助力毕业生融入职场。社会各界需共同努力，营造公平、开放、包容的就业氛围，帮助高职毕业生顺利就业，实现自身价值，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黄少成, 唐雨晴. 高校“慢就业”群体画像、成因及对策[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9): 107-111.
- [2]苏丽锋. 关注“慢就业”现象 助力青年顺利启航[N]. 工人日报, 2024-11-18(07).
- [3]寇蕴, 杨刚, 刘衡升, 等. 首都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缓就业”调查研究[J]. 中国就业, 2025(3): 66-67.
- [4]冯俊达, 鞠斌杰, 李健. 大学生就业观引导路径探究——以民营经济发展的视角[J]. 北京教育(高教), 2025(5): 95-96.
- [5]贾俊奇, 刘家豪, 姚守倩. 破解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缓就业”困境的实践路径探析[J]. 河南教育(高教), 2025(4): 55-56.
- [6]胡若珺. 民办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状分析和应对策略[J]. 中国就业, 2025(3): 68-69.
- [7]丁东海. 慢就业现象成因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高校毕业生的实证调研[J]. 黑龙江科学, 2025, 16(5): 21-23.

Research on Employment Competence Model Construction and Portrai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 Taking 4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Guangdong as Examples

Ming Wei¹ Yao Zhencheng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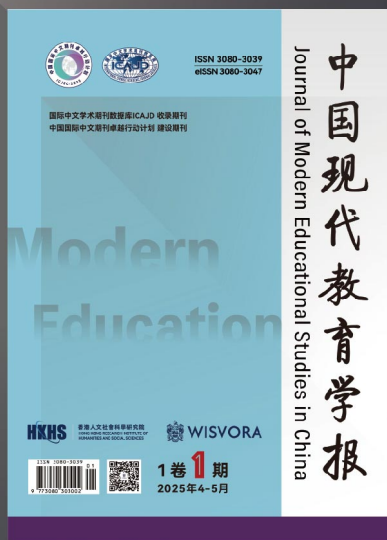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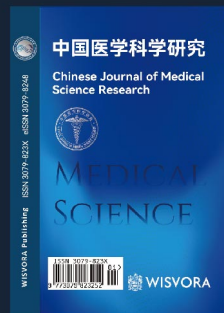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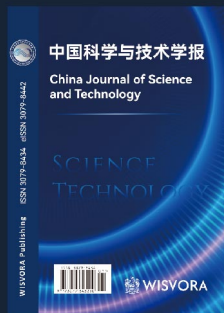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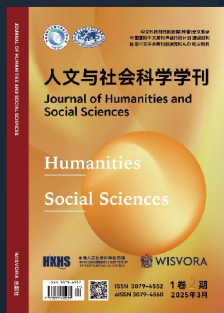
*(Huizhou Economics and Polytechnic College, Huizhou, Guangdong 516057,
City College of Huizhou, Huizhou,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society has been paying continuous and high attention to the employment issues of college students, among which the "slow employment" phenomenon is particularly eye-catching. This study sampled college students from fou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the survey samples. By conducting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ir career management abilit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bility,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competitiveness, this research has depicted the portrait of the "slow employment" group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data and the constructed group portrait, this study further explores the subjective, objective, and social factors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slow employment" phenomenon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Ultimately, the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 "slow employment" issu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ree aspects: establishing correct career and value perspectives, improving the match between graduates and job positions, and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slow employment; group portrait; analysis of causes; path analysis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是一份聚焦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服务教育强国战略的学术期刊。期刊以推动教育学理论发展与教育实践创新为核心使命，重点关注课程改革、教育政策、教学理论、教师发展教育技术等重大议题，致力于在新时代教育变革背景下，探索更加科学、高效、人本的教育路径。

印刷出版 ISSN 3080-3039

电子出版 ISSN 3080-3047



学术赠阅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业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